

## 第二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徽州」

### 學員名錄暨研習心得報告

序號	姓名	學校院系	分組
1	楊 勇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生	A
2	杜勇濤	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A
3	黃之棟	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A
4	黃忠鑫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博士生	A
5	李 侃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A
6	連啓元	臺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A
7	沈雅文	中央大學中文所博士生	A
8	楊曉宜	臺灣大學歷史所博士生	A
9	遊逸飛	臺灣大學歷史所博士生	A
10	曾齡儀	紐約市立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A
11	曾龍生	廈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博士生	A
12	查 忻	臺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B
13	杜樹海	廈門大學人類學與民族學助理教授	B
14	李典蓉	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院講師	B
15	梁仁志	安徽師範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副教授	B
16	廖宜方	中研院史語所助研究員	B
17	林勝彩	中研院文哲所博士後	B
18	潘 佳	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博士生	B
19	唐蕙韻	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B
20	王紹欣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博士後	B
21	張湖東	清華大學經濟學研究所博士生	B
22	張學謙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B

23	段志強	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C
24	李仁淵	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研究所博士生	C
25	李義瓊	中山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C
26	史甄陶	中研院文哲所博士後	C
27	涂豐恩	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博士生	C
28	王士銘	新竹清華大學歷史所博士生	C
29	吳佩林	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後	C
30	楊正顯	中研院文哲所院級博士後	C
31	張長虹	上海大學美術學院史論系副教授	C
32	朱晴晴	湖南省吉首大學講師	C
33	陳書毅	金門大學建築系講師	D
34	郭忠豪	紐約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D
35	黃庭頌	臺灣大學中文所博士生	D
36	李佩蓁	臺灣大學歷史所博士生	D
37	李天祥	臺灣大學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	D
38	劉芳正	黃山學院思政部講師	D
39	張小坡	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D
40	趙思淵	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博士生	D
41	朱開宇	臺灣大學歷史所博士生	D

- ◆ 活動日期：2012 年 8 月 16 至 27 日
- ◆ 研習地點：上海、徽州
- ◆ 計畫主持人：黃進興、葛兆光、李孝悌、王振忠
- ◆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
- ◆ 共同主辦單位：中國宋慶齡基金會
- ◆ 承辦單位：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

No. 01 楊 勇（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生）

## 遙遠的迴響

### ——徽州營研習報告

六年前，在我剛上武漢大學念本科的時候，便對明清史充滿了濃厚的興趣。那時候，我的班主任徐斌老師，便是武漢大學歷史學院社會經濟史所的一員，他師從的是張建民教授，那一年，他剛好博士畢業。

在四年的學習中，因緣殊勝，我與徐老師的接觸較多，徐老師也經常在學問上對我加以點撥，我對明清史的興趣有增無減。然而，碩士階段，我卻沒能選擇明清史作為我的主攻方向，而是選擇了充滿神秘氣息的先秦秦漢史。在先秦秦漢史的學習中，每當迷惘和困惑的時候，我總會想起豐富多彩的明清社會經濟史，並提醒自己要不斷的關注這一領域。

今年四月，當得知中研院和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將要合辦第二屆歷史文化研習營——徽州營的時候，我果斷地推掉了原本要在同一時間舉行的另一場研習營，迅速的向主辦方遞交了報名申請。令人失望的是，由於名額限制，我未能被錄取。後來，由於某位不知名的同學主動退出，我才得以遞補。當然，這還要感謝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的王振忠教授和金秀英老師對我無私的幫助，也要一併感謝那位主動退出的同學。回想起來，真是一波三折，所以我特別羨慕台灣學員，他們可以不止一次地參加這樣充滿學術興味的研習營，著實很有福氣。

這次研習營的師資陣容非常強大，許多在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領域有著突出成就的學者都是主講老師。另外還有藝術、建築等領域的研究專家主講的課程，也將這次研習營變成了一個多學科研究者交流與對話的平臺。這對於開闊學員的眼界、拓展知識面有著很好的作用。我覺得比較重要的一點是，從學員本身來說，每個學員都來自不同的研究領域，有著不同的教育經歷與知識背景，有的甚至已經是對某一學科有著精深研究的專家和學者。能與這樣的前輩一起共同學習、交

流和探討，本身便是一件樂事。

其實，我個人認為，從做學問的方法上來講，與老師、同學在閒談中的得益可能遠勝於課堂上所得。這次研習營，在課餘閒暇，能與諸多老師一起用餐、散步，在聊天之中往往會有許多意想不到收穫。中國的學問，向來講究言傳身教，見其人讀其文，與不見其人而讀其文，效果是不一樣的，有時候甚至是大不一樣的。再者，文獻與田野相結合的研究方式，也讓我頗有心得。就著材料尋找歷史，沒有現場感，有時候怎麼也不會明白，為什麼歷史會按照這種可能性展開了，而不是其他。當深入徽州進行實地考察后對文獻上所描繪的徽州又有了另一番感悟。尤其是對當地人與自然的關係以及在明清時期為何大量的人外出經商有著了進一步的“同情之理解”。

徽州民間文獻之多，內容之豐富，讓我欣喜同時也让我羨慕。眾所周知，近幾十年來，得益于考古學的發展，在中國大陸，出土了數量可觀的簡牘、帛書，極大地拓展了先秦秦漢史的研究材料。在這些出土的材料中，有日書、占卜記錄、醫書等先秦秦漢時期的民間文獻，但內容遠沒有徽州文獻豐富。在回望先秦秦漢時期的那段歷史的時候，徽州文獻總給我一些觀照，讓我明白，歷史其實可以這麼豐富多彩，先秦秦漢時期那段歷史也可能應該如此，只是隨著時間的流逝，那些能反映這一歷史面貌的材料，已經消失，或者還大量沉睡在地下。我們要探討的課題其實還很多，而每一個課題都可能值得一輩子去努力。我想對於一個研究先秦秦漢時期的人來說，這便是來自徽州營的“遙遠的迴響”。

現在回想起來，有許多地方可能詞不達意。但是徽州營的真諦已經滲入了學員的血液。可以用一句話來總結我的心得，真可謂“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如許。”

最後，我還對這次活動的策劃人、主辦方及承辦單位表示最誠摯的感謝。就一個替補者而言，深知這樣的機會來之不易。唯有在日後的研習中倍加努力，方不負各位師長的辛勞與期待。

## No. 02 杜勇涛（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此次参加徽州营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在 11 天的研习期间，我尽可能多地利用这次机会向与会的老师请教并和同学们交流。在营期结束之后，我感到受益匪浅。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

一，对国内学界有了近距离的接触，从而能够地从比较中理解国内学术与海外汉学各自的特点。首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国内学界对海外汉学的了解之深。许多老师和同学对海外中国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重要观点非常熟悉。而国内学者对史料更广泛的掌握又使得他们对后者具有了独特的批评角度。同时，由于具有更强的背景知识，国内学者对具体史料的理解也更全面一些，更有潜能把一条史料恰当地放置在其本来所处的环境，也更有机会挖掘出其中蕴含的各种意义和信息。于此对应，海外（此处仅就我相对来说更熟悉一些的美国而言）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则显得更在概念的辨析与方法的创新上面用功。这乍看起来似乎给人“国内史料强，国外理论强”的印象。但是事实应该不必如此。仅就现在的状况而言，我本人感到双方在互相接近，互相渗透。中国历史研究到底该不该分别“海内”与“海外”，分与不分各自依据什么前提设定，遵循什么逻辑，应该是值得我们思考和讨论的问题。

二，在很多具体的历史问题和史料解读上，我得以将自己的理解和诸位老师同学进行比较和印证。相同处增强了我的自信，不同处提醒我警惕自己臆断。

三，与国内名家一起进行田野考察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经历。在此过程中我得以了解他们对田野考察的理解和实践方法，并对自己以前初步尝试过的田野考察进行反思和改进。

对于以后两岸历史文化营的举办，我有以下建议：

一， 人数可以再少一点，次数可以再多一点。人数少更有可能选择专门研究某一方向的学者，从而更有利于讨论；次数多可以弥补人数少所带来的不便。

二， 田野考察可以考虑事先拟定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在出发其将这些问题明确地提出，并在考察结束当天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带着问题去考察，应该能使考察的方向性更明确，从而增强效率。

三， 避免去人多的地方；容易走散，也容易变成旅游观光。

总之，我感到此处参加徽州营会对我以后的学术研究有很大影响。再次感谢主办者所付出的辛苦劳动。

### No. 03 黃之棟（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 別再夢徽州！

原以為自己的專業與徽州最遠，沒想到自己卻成為本次會議中獲益最多的學員。

作為一個社會科學的研究者，田野對我來說是個再自然也不過的詞。我們做訪談、搞調查、行有餘力又有經費支持時，還可以深入當地，站在被研究者的情境裡與之對話。雖說田野就是田野，但在社會科學家的理解裡，田野是一個共時性的概念。換言之，這樣的田野是在特定一個時間點、特定一個區塊的社會構成與結構，是一個沒有歷史感的田野構造。

徽州是怎麼成為徽州的？徽州又是怎樣失去徽州的？在去徽州之前，我做夢也想過這個問題，甚至沒聽過這個地名，更壓根沒把「無夢到徽州」裡的徽州與這次去的徽州連在一起。實際到了當地，才知道我的不識徽州，其實來自它早已成為歷史的陳跡，是古書、古籍上的記載，是墨客筆下的山水、記事，甚至只是情感抒發的對象而已。總之，我們早就已經錯過了徽州。

既然如此，那我們又該如何去認識徽州？畢竟，走進徽州，徽州卻早已不再（在）。我想這可能是我此行最大的收穫：親眼目睹了一個在文本與實境間交錯了的徽州。這個發現的過程是一連串的驚喜、雀躍與 culture shock。

在我不算長研究生涯中，我反覆讀過不少文本，但我閱讀的方式不外是抓住文本的要義，刪去自己認為不相關的枝節。如此而已。不過，最讓我訝異的，是在場絕大多數的老師與學員（或是廣義的史學家們），所使用的卻更近似於徵候式的閱讀。他們一字一句的研讀文本，仔細推敲著每個字句的在場與缺場，試圖

理解每一個文本裡時若隱若現的各種視域與古圖中刻劃的那個曾經存在的地域。

在字斟句酌的每一次閱讀與討論裡，每晚的小組討論都各自解讀了文本的可見範疇，也時而確立了徵候的所在。每當討論進入最高潮時，面對同一個文本中，卻可能有全然翻轉的問題設定。這樣的交錯，洩漏了一個新的徽州。

對我這個歷史的門外漢來說，學員們對文本的執著，讓人著實欽佩。他們的奮力不懈，讓我重新認識到了，科學史大家孔恩想要「爬進別人的腦袋裡」的渴望。當然，在三鉅冊文本的泰山壓頂中匍匐前行，還是異常艱辛的。不過至少，同組討論班的成員還是懂得苦中作樂的。記憶中最鮮明的一段，是有關百萬銅錢到底有多重的討論。從這裡，不難看出大夥思考的跳躍與天馬行空。

最後，我不得不說說此行中各種各樣的第一次。第一次認真的想知道各種奇形怪狀的石碑上寫的究竟是什麼；第一次在參訪過後還絞盡腦汁的構思文本與實景到底有著什麼關連；第一次從自己早就中毒過深社會科學腦袋中，頓悟出孔恩的「兩個世界」；但最重要的，我想還是：原來中文裡也有這麼多陌生的單字，這我還真的是第一次遇到…

#### No. 04 黃忠鑫（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博士生）

自 2009 年始，我每年都有機會參加一次不同類型的學術暑期班。今年則有幸在結束學生生涯之前，入選本校與中央研究院聯合舉辦的徽州文化研習營。十余天的聽課、討論與考察，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在我心中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憶。

8 月 17-21 日，光華樓 2801 雲集了十幾位著名學者，圍繞各自正在思考或已經思考成熟的主題，向我們講授傳統徽州的不同方面，涵蓋了文獻、商人、宗族、訴訟、基層社會、建築、思想、藝術、科技、宗教等諸多內容。唐力行和范金民兩位先生都是徽商研究的名家。前者展示了最新研究成果，近代上海徽州人同鄉會及其活動，對近代自治運動提出了獨特的看法；後者則是思索徽商的文化投資現象，具有相當的現實關懷。徽商是徽學研究領域最成熟的主題之一，但兩位先生的講題仍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徽州地方社會是一個宗族社會，其中留存相當數量的村規民約，又產生了不計其數的訴訟案件，這些都是基層社會組織與控制的主要話題。常建華教授介紹了宋明間徽州宗族組織的形成過程，具體闡述了其在學界早已耳熟能詳的“宗族鄉約化”的論點。卞利教授提供了大量的傳統徽州鄉規民約材料，不少內容還有繼續可以深入挖掘的空間。阿風研究員則以扎實的法學功底，將徽州訴訟案例解釋得淋漓盡致。業師王振忠教授展示了大量稀見文獻，讓人大開眼界、拍案叫絕的同時，又對徽州文書的全貌、特別是巨量留存之外，還有類型多樣的特點有了清晰的認識。鄭振滿先生則介紹了田野考察的經驗，強調了民間歷史文獻需要放回具體空間中進行解讀的理念。勞格文先生則為我們展現了法國道教研究的強大功力，儀式的觀察、科儀書的搜集與解讀，都讓人驚歎不已。至於鄭培凱、徐澄琪、龔書章、祝平等先生的演講，既有生動詼諧的故事娓娓道來，又有精美絕倫的圖片觀賞。在開拓視野的同時，我也在思考，徽州何以產生如此眾多的藝術、建築奇葩？或許，正是徽州的勞動密集化（過密化）和商業化，使得某些產業出現了精密的深加工而趨於極致，又使得一些領域與江南等外界文化產生了密切的互相滲透。

22-26 日，進入古徽州的歙縣、休寧、黟縣和婺源進行實地考察。在十個考

察點，儘管先前曾去過五處，但多半是走馬觀花，本次故地重遊，又有新的收穫。而新到的五處，更是意猶未盡，像齊雲山、汪口等，今後如有機會還應該再去。總體而言，在下對此次田野考察有幾點感悟和不成熟的建議。除兩處博物館和宏村外，其餘七個考察點皆有碑刻留存。儘管都是旅遊景點，卻依然有一定的研究價值。鄭振滿老師敏銳地指出許國牌坊上小字的價值、在齊雲山上一路隨行，更是讀了不少有研究價值的碑銘。以至於一位老師感慨，我們在景區滯留時間的長短，是和碑刻發現數量成正比的。實際上，進村尋碑找譜、進行口頭訪問，仍然是田野考察的常規形式。對此，在下斗膽提出幾條建議：第一，由於研習營的專業性質，似不應當受制於旅行團的形式，可以自行結成考察小組，以讀碑採訪為主，觀光為輔，放寬現場讀碑、與村民交談的時間限制，不被導遊催促，這也將有助於晚上密集討論的開展。第二，既然考察點都是徽州最具代表性的地方，似應安排學員自行講解，而不是被某些導遊詞所誤導。只有在進入田野前做好一定的功課，才使得考察成為考察，而不是流於觀光。我在此前閱讀了黃山學院馮劍輝老師（馮老師此次亦擔任現場講解）的《萬安》一書，故而對萬安老街有一定的認識，親臨其地也能做到心中有數、著重留意一些重要事物。而在清華和汪口，這一功課並沒有做好，以至於在考察中出現應接不暇、疲於奔命的狀況。第三，田野考察期間，個人感覺討論最深入的當屬宏村。當時爭論不休的幾個問題，至今歷歷在目，督促自己抽空將宏村汪氏族譜找來好好閱讀一番。這一情況，一方面是因為我和幾位同仁此前來過，主動放棄一些無謂景點，直奔主題；另一方面則因為閱讀材料上宏村家譜較為細緻，而其他考察點的文獻配套並不特別緊密，難以將白天所見與紙本信息對應起來。當然，平心而論，研習營的考察點如有一兩處能夠引發眾人深入思考，激發有心人將粗淺的考察轉化成研究的起點，已是善莫大焉。

當大隊人馬抵達西子湖畔，卻是離別之時。諸位老師、學友在南山路邊依依惜別將近半小時，足見大家已在短短十餘日間積澱了深厚感情。當我坐上汽船，溯江而上，重返徽州之時，滿腦子竟回放的仍是徽州營的種種場景，一股莫名的感動湧上心頭。

## No. 05 李 侃（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初到上海，紧凑的讲习与讨论即刻开始。这次研习营的“全明星”阵容是促使我报名的主要原因。而身在研习营中，不仅能够有机会聆听徽州历史文化研究的专家的讲授，还可以与各位老师们在讨论中切磋，在考察中同行，这样好的学习和交流的机会实在不可多得。王振忠教授、阿风教授引领大家领略了徽州文书的丰富蕴藏和研究价值，唐力行教授、卞利教授、范金民教授和常建华教授深入探讨了徽州社会和文化研究中几个重要的课题。郑振满教授和劳格文教授以他们的研究体验展示了田野调查与民间文献结合的研究方法及其成果。郑培凯教授、徐澄琪教授、龚书章教授、祝平一教授从文学、建筑、艺术和思想的角度解析了徽州文化的不同面向。如果说各位老师的学识与风采与传闻中不相上下，那么研习营的学员们则着实令人惊喜。按照研习营招收学员的标准，我去年才刚刚获得参加学习的资格。同营的很多学友已经是有专著出版的青年学人；即便同为博士生，营员们在讨论与私下交流中所表现出的学养与见解也令我佩服。无论是分析文本的能力、田野考察的经验，还是知识储备与对学术史和学术前沿的了解上，我都与诸多营员学友存在很大差距，在交流中颇为受教，十分感恩。

以下就我在研习营中的几点心得体会择要列出，与诸位同学分享，也供今后的学员参考。

首先是材料方面。徽州地方文献存世丰富，种类繁多，是地方社会文化研究的宝库。例如唐力行教授利用的《徽宁旅沪同乡会档案》，阿风教授利用的徽州诉讼文书，研究乡规民约所利用的碑刻资料，研究士人生活的各种笔记文集，以及研究宗族社会所使用的族谱家规。地方社会的研究，文献的收集与整理的重要性尤为突出。一批新资料的发现，往往能带动新的问题和新的方向。这种资料引导题目的状况，既是发现新材料、启动新课题的动力，也可能使得学术研究的竞争演变为对资料的争夺和占有，从而成为学术发展的障碍。

然后是研究方法方面。此次研习营强调文献解读与田野考察的结合。田野考

察对我而言是崭新的研究路径，现在的我只是初窥门径，而要真正踏足其中还要经过进一步的学习。而在文献解读通往田野考察的路上，我在与老师和营员的交流中感到，地图是十分有效且不可忽视的工具。说地图是工具，还不足以表明其重要性，毋宁说地图是历史研究于文献、田野之外的一个维度，沟通了历史与现实、时间与空间。在历史研究中引入这样一个维度，无疑可以增加研究的准确性与厚度。以我个人的研究为例，在文堂陈氏乡约的研究中，对文堂地理的无知与忽视造成了一则材料的使用错乱，虽不至于影响全局，但如果在研究之初就将地理情况考虑进去，不仅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或许还会有新的发现。

接着说到态度问题。在与各位老师的讨论中间，我强烈的感受到，这些已经功成名就的教授，仍然对各种材料与题目保持好奇与热情。这样一颗鲜活跳动的“赤子之心”大概才是保持学术活力的不二法门。

最后，谈谈“视野”。记得有一位来自台湾的学员谈到很兴奋能和来自各地的同学共桌吃饭，才得以了解每种菜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和做法。类似地，进行地方研究，不仅要了解地区的方方面面，还要了解不同地区的差异，这样地方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才得以呈现出来。对时代和地方的历史想象才是合理的和立体的。

“往者不谏，来者可追。”研习营结束不到一星期，我已经回到美国继续博士阶段的学习，我相信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里我都能从这次研习营的经历中汲取养分、获得激励。再次感谢复旦大学、中研院和蒋经国基金会的老师、授课老师和营员，让我拥有了这样一段值得珍藏和回味的经历。

## No. 06 連啓元（臺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此次研習營的課程規劃，是圍繞在以徽州地域為主，文書閱讀與田野調查之間諸多的討論、磨合與激盪。內容規劃以課程講座與實地考察為面向，前者在上海復旦大學的會議室中，從早上九點到晚上十點，於講座教授講課之後，還需各小組分組討論，再全部綜合討論，前後長達五天。如此密集式的知識學習，從文書、法律、宗族、村規、宗教、建築、藝術等各面向，理解徽州文書與文化的樣貌。後者則轉向戶外，實地進行田野踏查的參與，從歙縣許國牌坊、休寧齊雲山、黟縣宏村、婺源汪口村、歙縣棠樾牌坊群等，實地感受當地的生活文化，並藉由前五天課程的知識理解與建構，進而有更深入的深刻體會。

在歷史研究之中，無論是柯林烏（R. G. Collingwood）思想過程的設身處地，或楊格（G. M. Young）聽到與他對話的時代之聲，都指出了對思想文化理解的一種途徑，也就是所謂「神入」或「移情」的概念（empathy）。縱然，歷史已經逝去，時空的差異也無法讓我們重建當時的歷史現場，進而瞭解當時的歷史；但是，藉由過往的文書記錄，甚至是實地田野踏查，都能對過去的歷史，產生較為深切的理解與同情。在此，或許無需辯駁文書與田野之間的孰輕孰重，文書可以藉由閱讀而理解想像，田野則能實際接觸考察，兩者當合而為一，進而從合理的理解中，建構出相對可能的歷史現場，或是歷史感。

就個人而言，在後半段的五天徽州考察過程中，感受是較為強烈的。早期在涉獵徽州的研究議題時，「徽商」總是一種象徵性的符碼，接著研究開始論述，徽商的如何出現？如何形成群體？如何影響商業活動？甚至是影響近代銀行的成形。但是，一旦進入徽州的地域，看到實際的地理環境，聽著當地「七山半水一分田」、「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歲，往外一丟」等俚語；乃至於為何徽州人樂於興建馬頭牆、小青瓦？何以祠堂、民居、牌坊成為當地三大建築特色？至此親臨，大有感觸。

人總是因應環境而有所改變，主要都是爲了生存，於是徽州人在山地之鄉，田地貧乏，造就了當地外出經商的風氣與文化，順著漂流船循江而下，才知碼頭對商業的重要性。來到徽州的民居，感受到的不是冰冷、清靜的博物館展示，而是活生生的村莊，樸質而常態的村民生活，途中或聽到兒童追逐嬉鬧、雞犬相吠，或老人斜靠藤椅、閉目小憩。有時沒來由的歷史鄉愁，總讓人不時舉起相機，無論是斑駁的馬頭牆，還是充滿思念的牌坊、祠堂，對周遭事物照相紀錄，甚至可以對舊石碑的記載文字，默然駐足良久。

因此，踏查了幾處的徽州民居、祠堂等建築，也欣賞了道教名山齊雲山的風光，讓我在研究或思考上都收穫豐碩，也能更採取多面的角度，去理解所謂的歷史研究。無論湯顯祖是否想到徽州一遊，那句「一生痴絕處，無夢到徽州」，至今總讓我沈吟許久。最後，僅以在研習營期間所寫的一首詩〈再弔齊雲山舊觀〉，作爲對徽州齊雲山的緬懷：

道觀恃崖半山建，香煙憑勢衝霄雲，  
幽洞虛空黃金座，道士輕朗誦道經。

## No. 07 沈雅文（中央大學中文所博士生）

很榮幸能夠參加此次的徽州歷史文化研習營，不僅有豐富密集的課程討論，還有實際的田野考察，讓我們能夠將文獻上、課程中所學到的知識，經由實地考察加以印證，也能夠補充文獻研究中的不足，而非紙上談兵。

不過，在實地考查前必須要有一定的先備知識，才能與同好們在現場「討論文本」，因此，研習的前五天大會安排了一連串的研習課程，分別用十二個主題探討徽州文化：一、「傳統徽商與近代同鄉組織」，唐力行老師以旅滬同鄉會為例，讓我們了解同鄉會真正的功用，以及徽商得以強盛的助力。二、「徽州的文書世界」，王振忠老師將其收集的徽州文書，如數家珍地展示出來，讓我們知道仍有許多文書還有待我們進一步的整理、研究。三、「明清徽州的村規民約與鄉村治理」，卞利老師整理了各式鄉規民約，讓我們能夠了解徽州居民生活的一個側面，也建構了明清時期在地方管理上的大致輪廓，以及當時重視的問題，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規定和執行上可能是有差距的。四、「從徽州訴訟文書看明代的審判制度」，阿風老師從梳理訴訟文書讓我們了解徽州的「健訟」形成之因，徽州宗族對於族產的重視，以及訴訟與官員、國家政策的關係。五、「商為名高，士為厚利：明清徽商與江南文化」，范金民老師重點式地介紹了幾個有名的徽商收藏家，並將士與商之間的關係用「利與名」結合起來，使我們了解徽商對江南文化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六、「徽州宗族組織形成的若干問題」，常建華老師探討了宗族制度化及組織化的問題，與鄉約之間的關係密切，讓我們了解徽州人對於宗族的重視，以及宗族組織的必要性。七、「民間文獻與田野考察」，鄭振滿老師以田野考察的經驗告訴我們田野考察的困難，並需要有相當的學術知識，才能夠真正地落實民間社會文化的研究。八、「湯顯祖與徽州」，鄭培凱老師告訴我們湯顯祖其實沒有到過徽州，不過徽商的大力支持，讓牡丹亭等戲曲能夠到處傳播，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湯顯祖戲曲的發展。九、「徽商、徽墨、徽山水：黃山與新安畫派」：徐澄琪老師詳細介紹了徽僧弘仁與倪瓚的關係，並說明黃山與新安畫派之間的關係。十、「From Terra to Type：文化地理聚落與合院地景原型」，龔書

章老師以建築學角度分析了幾個徽州聚落的安排與空間結構，是具有文化意義的。十一、「江永、戴震與西學：省思新安思想史的可能性」，祝平一老師講解清儒楊光先與西方傳教士之間的矛盾，以及江永、梅文鼎在曆算上的歧見，讓我們了解清代士大夫對於西學的不同看法。十二、「齊雲山與道教」：勞格文老師由實地考察的照片與報告，讓我們了解道教科儀的實際情況。由此十二個主題帶領我們進入徽州文化的世界，並讓我們了解徽州此區域文化的特殊性，並具有投入研究的價值。

田野調查雖能夠印證、補充文獻上的不足，卻也要注意偽造的情形。特別是文革以後，許多文物皆已毀壞，「眼見不能為憑」，還是要多方考察，像是訪問當地耆老等，才不至於誤解。此次在參訪休寧的萬安老街時，大家發現一些廢棄的空房停放著棺木，後來問了當地老人才知道，那是老人們為了自己的身後事而準備的。還有一位家裡原本做藥舖生意的老人，為我們介紹已廢置的藥舖建築，讓我們彷彿走入過去，更加感同身受。

此次的研習營著實獲益匪淺，特別是更加了解閱讀文獻、解析文本的重要性，不過，也了解歷史學者與中文學者研究思路及方法之不同，在探討文學及作者的文化背景時，特別需要學習歷史學者的研究方法，搜集各式文獻加以整理、比對，且不能僅研究士大夫文化，還需配合民間文化，才能更全面地了解研究對象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此外，和不同領域的學者研討學問，能夠了解各領域的研究視角，讓我之後在做研究時，能夠多方思考，增進研究的深度與廣度。

## No. 08 楊曉宜（臺灣大學歷史所博士生）

有幸能參與第二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在此非常感謝主辦單位提供此良好機會，也相當感謝各位用心教學的老師們，以及不斷自我精進的學員們，正因各位師長的提攜與指導，使學生在此研習過程中收獲良多，更開啓了歷史研究的新視野、新方法。除了不斷吸收新知之外，學生在歷史方法論與文獻分析方面，可謂受益匪淺，在此非常感謝諸位與會學者、師長的不吝指教。

本次歷史文化營主要分成兩大部分，一為上海的學習課程，另一為徽州文化實地考察。課程內容的安排相當充實，且富有深意，透過文本解析與實地參訪，使各位學員能充分了解到歷史文獻與田野調查的重要性。本次研習營主要在於帶領學員進入文本的真實世界，若說是「田野調查」，或許我們尚未真正地對每一個人事物地作全面性的調查、紀錄與分析，但至少讓這些長期在圖書館找題材的學員們，擁有此機會能發掘另一研究領域的新面貌，也可使自我的研究範疇更加豐富、多元。

首先，關於徽商與徽州文化方面，本次研習營讓我想到了一个大問題，為何要特別提出「徽文化與徽商」的歷史論點？它們是如何形成？又如何被創造出來？在歷史文本與真實世界之間，又該如何被詮釋？關於以上幾點問題，透過課程的安排與講者豐富的研究成果，我們從徽商的角色進入了徽州人的歷史世界，由此窺測那神祕未知的「徽州」。從徽商組織開始，漸漸了解到徽州人在外地的真實狀況，他們必須離開家鄉出外奮鬥，甚至在上海、杭州等地形成一個龐大團體，再由徽商組織漸演變成同鄉會。而明清時期的徽商勢力相當豐厚，逐漸形成「徽文化」，並留下大量徽州文書，提供日後學者研究的史料基礎。

其中，徽州人的村規民約、法律訴訟等文書資料非常豐富，我們解讀了婺源、祁門等地的原始資料，包含村民之間的約定內容、宗祠的族規家法，以及地方的法律訴訟文書，這些村規民約經過當地士紳、耆老與官府的認證，使其具有法律

效力。在此，也引發了一個問題，究竟在地方社會上，法律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我們解讀了每一個條文，試圖釐清地方法與國家法之間的關係，它們彼此會相互抵觸，也會相互調節，而這些所規範的內容與徽州人的生活、傳統思維密切相關，透過地方社會的法律效力與官府之間的合作關係，徽州人或許在此狀態下能擁有部分自治的權利。如徽州人的處罰方面，許多文獻資料及宗祠規則皆指出，懲治不合群、不法者，則用「棄之」、「生則不入會，死則不入祠」之方式予以警惕，乃因每位族人皆屬於宗族、地緣之共同體，若被排除在外，屬於相當嚴重的處罰，可看出徽州人在法律與內部力量結合的關聯性。

在法律的脈絡中，我們看到了徽州人內部的凝聚力與思維認同感，但為何徽州會出現此文化特色？對此，須重新審視徽州宗族組織的形成，以及地理與人文環境所促成的內部力量。關於宗族方面，課程中羅列許多族譜、家譜、新安志等，以上的文獻史料使我們更加了解到一個宗族的歷史發展，它們被後人所創造、發揚，而此形成背景正與徽商勢力息息相關。對此，我們該思考宗族成立之共同意識為何？或許可分成四大點：宗族成員、撰修族譜、建置祠堂、設立牌坊，藉此凝聚宗族內部的群體意識，以追溯、讚揚、記載先祖的方式，重新喚起族人的宗族精神，因而出現祭祖、族譜修訂、重視名節的形式，由此可知徽州人對於群體與個體之間的協調與認同。

此外，徽州人的宗族結合其法律效力，使地方逐漸產生認同感，而此內部凝聚力甚至會表現在外部結構上，如徽派建築、村落的空間分布等等，皆顯示出徽州宗族的力量與歷史意義。本次研習營結合實地考察的認識，如宏村、汪口村、棠樾牌坊群、許國牌坊等地的參訪，就興建宗祠、牌坊的角度而言，我們看到了當地的歷史發展，其所呈現之意義即公共中心點的確立。而這類的空間結構也結合了人文與自然地理的性質，如宗祠、書院此類建築是村民的精神指標，宗祠負責處理宗族的大事，包含祭祀、處罰、表揚、訂立鄉約等，故多建設在一村的中心點。此外，商家、富貴人家、牌坊的設立，也與當地的發展、傳統相關，具有濃厚的文化地理聚落特色。

再者，結合實地的參訪，或許可重新審視徽商為何到外地謀生？其成長背景與環境為何？我們在歷史文獻與真實環境之間，似乎正在摸索著彼此的聯結關係，這層聯結性呈現了「徽派文化」的發展脈絡。徽州結合了徽商、宗族組織、地方法律、建築與空間等多項因素，進而形成所謂的「徽文化」。徽文化主要由徽州人所引起的一股風潮，甚至影響到江南地區的文化結構，如新安畫派、戲曲、新安理學、思想史、文學風氣等，皆顯示徽州特有的文化風格。或許正因徽商雄厚的財力基礎，使徽州文化能更加發展，許多富商、文人漸興起「收藏鑑賞」之風，促進經濟與文化發展。因此，當我們進入徽州作實地參訪之時，可清楚看到徽州人堅毅、勇敢、節儉、尚文的特質，而此性格影響到徽文化的形成，甚至是整個江南地區的經濟與文化，由此可見明清時期徽商的繁榮盛世。

當我踏進那綿延不絕的巷弄時，彷彿看見了喧鬧的人潮，小小的空間卻堆疊了無數上岸的商品，徽州商人遊歷各地，播下了經濟奇蹟的種子，深深撼動著明清時期的黃金帝國。當舖、商家林立，來往人潮洶湧而至，船伕不斷揮動著槳，似乎正在趕往下個黃金勝地。由多少徽州人血淚交織而成的牌坊，正在訴說著主人翁的悲壯故事，女子與男子不分軒輊，爲了創建屬於他們的徽州世界，情願挨著孤苦，默默徘徊在宗祠與牌坊之間。這就是我所看到的徽州，結合歷史文獻與實地參訪，我們更加了解到地域社會史的研究本質，雖然只能說是霧裡看花，且尚未運用到每個精確的研究視角與方法，但我被引領到另一個「新視界」，一個從未真正執行過的方式。非常感謝主辦單位與各位師長、學友的付出，每個課程、行程的安排可謂不易，能與各位共同參與此次研習營，實爲敝人之幸。

## No. 09 遊逸飛（臺灣大學歷史所博士生）

去年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首度舉辦，主題是巴蜀。當時我便很想參加，然而時間與在蘭州召開的簡牘學研討會衝突，邢義田老師又於會後安排了從蘭州到西安的沿途考察行程，我只好忍痛放棄入川。今年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再度舉辦，主題是徽州。偏偏時間又與在上海召開的中古史青年學者聯誼會衝突，由於良機不宜再失，我遂與主辦單位情商，得李孝悌老師慨允，以不補助機票的形式隨同參加，這是要首先且再三致謝者。

唯徽州不同於古蜀，其名始見於兩宋，留存的文書多成於明清。相對於巴蜀從上古到現代均具有強烈的區域特色，徽州地方史研究的斷代色彩濃烈許多。這次研習營成員亦明顯以明清史研究者為多。因此不管在行前還是研習期間，都有不少人問我：你做上古史，為什麼想要來？事實上我撰寫申請書時，便預設此問題，並加以回答。在此我想先對自己及他人的這種心態略加批判：徽州研習營成員的研究斷代究竟應以明清史為多，還是恰恰相反？前者的意義無須我多言，後者則可牽扯出一個重要問題：徽州史的研究意義僅限於明清史？還是其為整個中國史不可或缺之一角？在出發前，我便相信是後者；這個信念在研習營結束後益發堅定。換言之，徽州史應該成為中國史研究者的必要知識（也許還具有世界史的潛力），上古史研究者參加徽州研習營的正當性不容置疑，不應成為異象。徽州史研究的哪些部分具有中國史的意義？看似宏大不經，卻是參加研習營應思考的問題。

上古史史料稀缺，研究者除了盡可能壓榨史料，尚須馳騁想像力以建立史料之間的橋樑是謂冒險者的樂園。明清史史料豐富，研究者看似不宜過多地馳騁想像，必須時時面臨史料的檢驗；然而史料表面上是束縛，實際上是鑰匙：引領研究者進入事件的細節、行動者的內心、歷史的深層結構。沒有史料支撐，人的想像力總不免於蒼白、粗糙，禁不起進一步的推敲。為何偉大的歷史學者必須書寫當代史？理由恐怕不只經世致用而已。透過徽州史的資

料閱讀，我對一些習以為常的知識與觀念產生了不同以往的看法，雖然疏陋，仍提供營友們一哂。

「同鄉關係」、「地域集團」的概念普遍應用於中國史。然而唐力行先生提供的史料與研究告訴我們：概念只不過是概念。並非兩人有過交集，關係便自然產生；更非籍貫相同、住在一起，一群人就是集團了。徽州商人在外地建立同鄉會，同鄉會必須定期集會，必須得到有力人士支持，必須不斷參與鄉里事務。私意以為，在有意無意之間，在外的徽州人與本地的徽州人之間的關係得以維繫。徽州人在外地，不會迅速為外地人所同化；本地的徽州人，也不會將長久在外的同鄉視為外人。但這樣強固的同鄉意識，卻是透過徽商所建立的網絡而得以塑造，並長久維繫。沒有徽商這樣有力者的地域，是否能在外地發展強固且穩定的同鄉關係甚至地域集團？不能不惹人疑惑。

「同鄉」並非不重要，但要讓地域因素超越其他因素，似乎須有其他條件配合才行。僅根據籍貫、居住地所建構的關係、集團，不無可能只是「假」說；即便仍為事實，也可能需要建立更堅強的論據。

不管是華南學派，還是北方的常建華先生，都更加強調明清宗族的人為建構、地方行政性質。私意以為，如果宗族可看成是一種地方政府為了治理地方，而有意培植的組織。宗族成員雖具有一定的血緣關係，但血緣只不過是「藉口」，是官府塑造人群的方便法門。那明清小政府的觀念就有重新檢討的必要。縣級政府並非放棄治理鄉里的權力，而是培植看似自生、自治，實仍受官府節制的民間組織，授予其一定的權力，以半間接的統治方式達成更佳的治理績效。這樣的政府仍可定義為小政府，但不宜忘記：秦漢的鄉里統治也十分倚賴三老。三老是民間領袖，但得到官方承認。如果秦漢也叫小政府，那明清政府之「小」，似乎就不存在特殊性了。

以上所思未必準確，可能只是個人思考歷程上的一些彎路。唯條條道路通羅馬，沒有昨日之我，怎能有今日之我、他日之我？然而徽州營必為眾多昨

日之我中的一個亮點，可以無疑。再次感謝主辦單位、授課老師與諸位營友。

最後提供一項研習營形式的調整意見，可能很不現實，只是提供參考。

二十年前杜正勝先生創辦歷史研習營，其目的在於將史語所的精深研究成果推廣至各大專院校的年輕教師及博士生，為臺灣培養下一代的史學人才。二十年來，歷史研習營的形式似乎變動不大，大抵均為研究員授課（即演講），並與學員綜合討論。然而近年史語所與各大專院校的交往趨密，許多研究員均在臺灣各大學演講、兼課、收徒，學術交流非常方便且快速。換言之，研究員在歷史營授課，已不再那麼特別，歷史營至今已非史語所與台灣年輕學者、青年學子交流的「主要管道」。而兩岸營與歷史營的授課方式大抵一致，宛如增加田野考察的歷史營。會不會有一天，兩岸營也面臨歷史營的窘境呢？這個問題不免為杞人憂天，而且涉及各種複雜因素，只宜留待主辦者考慮。

我在此只想從一位青年學子的立場指出：如果二十年前，青年學子必須透過研習營的形式，才得以聆聽研究員授課，並透過綜合討論交流。那現在這個形式已經成為各地學術活動的常態，臺灣、大陸皆然。當代青年學子更需要的或許是：與自己素所景仰的學者更親切、直接地交流，不只是課堂，而是飯桌或田野。即使在課堂上，青年學子有時更需要做一位講者，而不是聽眾。只是這位講者所面對的聽眾不是學生，而是學界先進及同儕。青年學子必須有機會較完整且精鍊地提出自己所考慮、所關心的問題，藉以獲得直指核心且恰到好處的針砭。兩岸營學員為博士生以上，每次研習主題又相對集中，實有基礎建立更新穎且理想的研習形式，為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史學打下良好基礎。十分期待再次參加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

## No. 10 曾齡儀（紐約市立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這次的徽州營分為兩部份，首先由各專業老師替學員們在上海復旦大學開授十二堂課，內容非常豐富，包括旅滬徽州同鄉會的發展、徽州文書之簡介、村規民約、訴訟文書與審判制度、宗族組織、江南文人與徽商的關係、黃山與新安畫派、徽派建築、西學與新安思想史的關係等，幾乎涵蓋了徽州的各種面向。在上海聽取了老師們的專業介紹，接著就前往徽州進行實地考察，參訪了宏村、汪口村、棠樾村等，對於當地的自然生態、歷史建築以及人文活動進行了解。

教師們的演講讓我增加了許多關於徽州的知識。唐力行老師提出大徽州與小徽州的觀念，在進行小徽州區域研究的同時，也應該注意徽州與其他地區橫向性的連結，也就是大徽州的概念。王振忠老師介紹了大量的徽州文書，譬如：透過《習業要規》可以了解徽州典當業學徒的生活樣態與價值意識。卞利老師提出徽州因商業活動盛行，特別重視契約文字，連宗族家規都要送官府蓋大印以彰顯法律嚴肅性。但鄉例俗規等民間法與國法之間有時會產生衝突，如何協調與整合便是重要的課題。阿風老師透過其淵博的法律知識，介紹徽州的老人理訟制度，可說是自治與國家制度的結合。若老人理訟仍無法解決爭端時，才會陳告於官。由明代的狀式條例可知，對於牽告多人或是婦女、鄉紳都有所限制。范金民老師探討新安商人仰慕江蘇文人，藉由收藏古玩字畫與贊助文化活動與江南士人進行連結。常建華老師介紹明代徽州宗族祀廟祭祖形態的演變，他認為明代有一個鄉約運動的浪潮，稱之為「宗族鄉約化」或是「宗族組織化」。鄭振滿老師介紹華南學派進行的田野調查，鼓勵學員將「進村找廟、進廟讀碑」的方式應用在徽州的田野考察。

在戲曲方面，鄭培凱老師指出湯顯祖一生從未去過徽州，但湯的戲曲深受徽商喜愛，徽商們都想營造與湯為友之形象。徽商潘之恆是湯的摯友，也是介紹湯顯祖作品進入徽州的重要媒介，他很早即評論牡丹亭的重要性。徐澄琪老師介紹新安畫派的特色，也就是以山水為主、無花鳥人物，以勾勒、乾筆、渴筆、無色

彩作畫，崇尚儉約和寂寥之風，其代表人物是弘仁。鞏書章老師介紹徽派建築以白牆灰瓦、馬頭牆和內天井為特徵。他特別推崇徽建築中灰色空間意識的生活領域感，也就是透過券門、入口石橋等營造內外空間之曖昧性。祝平一老師從楊光先、梅文鼎、江永、戴震與西學的關係，帶領我們探討幾個問題：耶穌會士如何利用曆法知識突破文化與社會邊界，在異文化的中國傳教？中國士人如何挪用西學，協商其文化與社會邊界？在滿人統治的歷史脈絡，文化預設如何介入、影響雙方的互動和衝突？最後是勞格文老師從道教的一些文本談儀式。

上述演講提供我關於徽州的知識，實際的田野考察則讓我到歷史現場，將知識與考察做結合。譬如：我們去宏村看村口、水口、南湖、月沼以及南湖書院，和鞏書章老師講解的徽派建築作一印證，以及范金民等多位老師都提到的「賈而好儒」的徽商特質。我們去汪口村看俞氏宗祠，看到村內孩童在祠堂內玩耍，想到卞利老師提到祠堂是宗族和村民的公共生活空間，在此議事、懲戒、舉辦節慶等。到棠樾村看全中國唯一的女性祠堂「清懿堂」及牌坊群，想到許多老師都提到的徽商離家，妻子守貞盡孝，掌管一家的艱苦與悲悽。

總結來說，雖然我並非徽州研究的專業，但是透過這次研習營，讓我對以前在紐約修習中國史課程時閱讀到的西方文獻，譬如 Craig Clunas 的 *Superfluous Things*, Richard Lufrano 的 *Honorable Merchants* 等與徽商有關的研究有不同的體會，加深我對於中國史理解的寬度與深度。非常感謝能有機會參與此次活動！

## No. 11 曾龙生（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博士生）

徽州营时间虽短，但习得者颇多。笔者家在江西，学在厦大，皆属华南偏隅之地，平时田野地点也多集中于此，未曾远足他乡。虽然因此积累了些许宝贵经验，但此经验毕竟有限。故常思虑走出华南，北上田野。一则由内而外，扩大视野，增加田野经验；二则由外而内，比较江南与华南之异同，发现华南之区域性特点。此次徽州营之行，不管是在复旦听讲，还是在徽州田野，都让我对徽州有了较为广泛而深入的认识。而徽州历史的多样性，让我从更为多样的角度去思考史学研究，思考社会史、经济史与文化史，如何在一个区域史的内在脉络中被打通，以建立有机的联系，最后诉诸一种整体史的追求。如明清徽州商人与苏州文人的关系，予人一种文化与经济的较量或融合，导致一种新的经济伦理或社会群体（“儒商”）的出现；“徽商、徽墨、徽山水”，更清晰地透露出徽州经济与文化间的有机联系。齐云山上留存至今的大量明清碑刻，述说着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地方内部之间密切地互动关系，为我们思考“小徽州”与“大徽州”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切入点。凡此种种，皆予人学术灵感，为笔者在华南的田野调查，提供了一个参照系。

学术研究，稍不留神，便是自说自话。如此则不但学术史脉络难以进入，而且亦无助于历史认识的深化。区域史研究的一个前提假设，在于中国各区域的差异性。因此，唯有对中国各个区域进行独立的研究，发现各区域的内在历史脉络，而后对各区域进行比较研究，才有望对中国有一个更为深入的认识。从此出发，区域史的终极目的不在区域，而在全国。但由区域研究出的国别史，已不仅限于帝王将相或国家制度史，而是一个更为广泛地概念：社会文化变迁。徽州营的田野，让我感觉出徽州作为一个研究区域的潜力。或许能在不久的将来，研究出一个徽州模式，以与明清区域史的其他模式进行比较。当然，区域间的比较研究不易进行，能在某个问题意识上进行比较，此问题意识须具备足够的张力。所以，区域比较的挑战，最终在于是否有好的问题意识。

史学研究中，常感到单一资料的不足证，故须援引文字与口述、图像、实物、仪式等各种资料，让它们互相论证。而若要各种资料互相论证，尚须先落实到一个研究单位上，不管这个研究单位是一个区域、一座山，还是一个人、一件物，然后才可在各种资料间建立有机而紧密的联系。而这不是文献，不是可以在书斋或图书馆中轻易做到的，因此必须走进田野。田野中直接面对各种证据，足以做到互相论证。在此层面可以说，田野也是一种新的历史证据学。自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以来，多种证据法相继问世。但这些证据法，无外乎指出各种资料可以互证，而未指出其何以互证，何以在建立有机联系的基础上互证。田野作为一种整体证据学，似乎提供了一个答案。此次徽州营，让我对此有了更为切身的体验。不管是观看齐云山上的碑刻、道房等实物，还是在婺源汪口等地的访谈，都让我得以得出徽州文献以外的认识。

笔者深知自囿一隅，少与外界进行学术交流，杂志刊物而外，常不知史学学术动态。以上想法，得自徽州营中个人所感所想，终不知其妥当。幸亏此次徽州营中人才济济，老师辈自不必说，学生辈亦不乏成名成家者。笔者置身其中，如入浩瀚江河。与之交流，自知彼此想法之同异，得以取己所需，弃己不取，在区域史研究与田野调查的认识上，增进不少。徽州营于笔者，实为难得之学术交流机会。

2012.9.25

## No. 12 查 忻（臺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長久以來，徽州對我而言，只是家譜中一個遙遠的地名。一方面，在先人遷徙的歷史中，徽州休寧相較於父親的出生地上海，甚至曾祖父的出生地松江而言，總顯得遙遠而陌生。另一方面，自碩士班時代，以臺灣為研究主題，並在博士班後期隨著十七世紀荷蘭人的路境，研究關懷逐漸朝東南亞，甚至向歐陸偏移之後，也很難有機會關注徽州相關的研究發展。但是，作為一個徽州後裔，對於徽州，總還是有股說不出的好奇。

今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以及中國宋慶齡基金會，為了延續前一年在四川成都舉辦「第一屆歷史文化研習營——巴蜀文化」的成果，與上海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合作，展開了「第二屆歷史文化研習營——徽州」的學員招募。聽聞這個消息，對徽學毫無概念的我，毫不猶豫地報名了。承主辦單位的厚愛，有幸能參加十天在上海復旦大學及古徽州地域的研習與考察。

這次的研習營，除了讓我在諸位徽州研究先進講授的課程，以及晚上的討論之中，得以從宗族、文化、宗教、商業，甚至藝術、建築等方面一窺博大精深的徽文化，以及數不盡的徽州文書；也讓我在徽州實地考察的過程中，讓未曾從事田野調查的我，見識如何將文本資料與田野調查相互結合，以及就田野中隨處可見的碑文、牌匾、甚至田裡的作物，仔細研究的方式與精神。這對長期以來只基於檔案、文書等文字資料，將自己閉鎖在研究室的電腦前，自以為可以解釋一切的我而言，是個很好的提醒。

還記得在萬安古鎮的考察行程中，就在快要結束行程時，鄭振滿老師突然看著田裡的作物，與王振宗老師討論起每一塊田種的究竟是甚麼，同時也要在旁邊的我們跟著討論。坦白講，我一個作物都不認得，看著兩位老師與幾位學員說著：「這是稻，那是棉花，那邊那個應該是黃豆」，我瞬間覺得很慚愧。除了稻子以

外，我都不認得；也更不用說，一畝地能產多少斤稻，甚或是需要多久才能收成了。我雖然不是作經濟史的，作物這些東西也向來被我當成農學院才需要知道的學問。但是，這些作物或相關的數據、數字，從來就不是只記錄在檔案資料中，更多時候不就是在我所生活的四週嗎？

此行尚有意想不到的經驗，研習所在的復旦大學，是家祖父當年畢業之處。雖然化學系館已經翻新，但無損於作為孫子的我追念先人在校內求學的經過。其次，在徽州實際考察時，住宿在黃山市屯溪區的飯店中，離族譜所記徽州休寧頗近；而行程中也多次經過休寧，在同行學友師長鼓勵之下，在一次晚餐時間向主辦單位告了個假，按著族譜所記，搭車到休寧縣齊寧街，試著找尋「休寧西門查氏」宗祠的可能所在。雖然在徽文化博物館中，便已知道宗祠應該不復存在了，但仍抱著一絲希望，在古色古香的齊寧街，以及其間的巷弄中，找尋著各種可能。

雖然這個希望在短短不到兩小時的時間內沒有實現，一方面是對歷史文獻的不熟悉，沒有作足文獻的功課；一方面是對田野工作的不熟悉，無法大膽地挨家挨戶訪查。但這樣一次意外的插曲，讓我對自己家族的淵源起了更大的興趣。

因此，對我而言，「第二屆歷史文化研習營——徽州」的研習與考察雖然已經結束了，但對徽州的認識與考察，則剛要開始。期待未來能與這次研習中結識的學員有進一步交流，以更多地瞭解這塊與我淵源甚深之地。

### No. 13 杜树海（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助理教授）

密集的大家授课，热烈的学员讨论，再加上较为舒心的田野经历，这个暑期的“徽州营”必将给我留下长久的回忆。

上海授课阶段引来众多“徽学”行内、行外名家的加盟，给所有学员以学术盛宴的感受。老师们的演讲内容既充实新颖，又幽默风趣，给人以如坐春风之感。学员们讨论时更加激情投入，甚至向部分老师投以甚为尖锐的问题，引来不小轰动。

我本人来自人类学系，可能在徽学研究者或历史研究者看来算是有点“边缘”，处于这种的边缘地位的我，对讲者台湾交通大学龚书章教授的演讲内容印象深刻。因为他本人是从事建筑设计业的，相对其他讲者和学员来说也算是有点边缘了。龚教授演讲内容围绕徽派村落建筑，既用专业知识讲解了村落建筑的布局、结构等等，又用人文学科的视角阐述了它们的象征意蕴，可谓两不偏废。从他的讲座中，我第一次意识到“门”这个我们习以为常的物件会有对内、对外两种不同意蕴。在徽派建筑中，村落中巷道较为狭窄逼人，那么，高大肃穆的门就会对站立其下的路人或客人以压迫感；而建筑内部则给门后留下较大的空间，故门内之人即家户中人则不会感到这种压迫感。从龚教授的演讲内容中，我第一次知道徽派建筑的天井是这么小，据说这是因为当地人“财不外露”的文化观念所致，但是这并不会影响到市内的空气流动，里面有着科学的环流原理。

徽州五日的实地参访，可谓不长也不短，其中大半天的休宁县齐云山考察，令我收获颇丰。我们今日单知道此山乃中国道教四大名山，但它的建构时间其实相当晚近，唐代“洞天福地”的榜单上是找不到齐云山的，一直到明朝嘉靖皇帝在此求子成功，它才声名鹊起。此山主神来玄天上帝，但从我们实地考察过程中可以看出山上供奉神明还有碧霞元君，此乃泰山女神，在民间信仰中一般跟求子有关。故有学员怀疑嘉靖皇帝是不是当时酬错了神。除了碧霞元君，山上尚存佛教信仰的影子。在题名“众妙之门”的山洞里，虽正中安置玄帝塑像，但两边石崖上却有十八罗汉造像，造像旁刻着人们保佑子孙永续的愿望。所以齐云山的神

明谱系并不那么单纯。嘉靖时龙虎山第四十八代张天师裔孙接受皇帝敕封，迁居于此，增强了此地的正统性。但是在劳格文教授提供的相关调查报告中，我们发现后来的齐云山是由来自婺源县北部段莘乡的道士所控制，张天师裔孙一脉变得无影无踪了。也就是当地道教完全地方化了。在这当中，来自他处的道士与地方的赞助人之间的关系值得玩味。道院以赞助人的名字命名，但实际由道士所控制，道士们父子、子孙世代当道士，但他们却必须避免在同一家道院服务。这样的制度实际是象征齐云山的道士只是一种职业，道院及其财产不能为道士世代传授。

徽州在历史学界以“千年文书”曝得大名，通过讲者们展示以及实地参访收藏机构，这确实给我巨大震撼。因为我自己研究的华南少数民族地区，文字的传统较为晚近。这也是我申请此次研习营的原因，即使自己拥有不一样的田野经验，突破自己的地域视野。通过这次研习，在地域的比较与综合研究方法方面，我有了两点初步的想法。第一是“找联系”，在徽州我们看到了历史上“徽墨”“歙砚”生产的遗迹，其实这种生产连同福建的刻书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华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因为自清雍正实行大规模改土归流政策后，文教科举事业便在当地盛大揭幕了，而当地使用的书籍与“文房四宝”正是来自福建与徽州等地区。第二是“比异同”。比如，我们在华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村落时，常常会见到村落集体的防御设施，比如围墙、阻断进村道路（街道）的门楼等等，但是在徽州，我自己并没有发现。或者这正如王振忠老师所讲，徽州人擅长文斗，不擅长武斗。相信这些区别跟不同地方的生态环境、社会文化、族群关系有关，甚至跟当地与王朝国家的关系有关。

在一个地方做研究久了，或多或少都会染上某种“地方中心主义”（不知这是不是研习营上一些讲者所说的“历史的乡愁”？），通过比较，我们会发现在某一地域研究中得到热烈讨论的议题，在另外的地方则显得不那么重要。

杜树海，2012、9、12夜改成于厦门白城

## 徽州行紀

企欲深入瞭解研究的對象，最理想的方法之一，莫過於親自走訪體驗他們的生活背景，關注其習慣與風土人情。徽州，是江南文化的根源之一，亦是中國昔日最大商幫徽商的家鄉。我對這個地方雖沒有任何研究，卻不陌生。我曾沿著新安江的支流，溯源而上，踏著青石古道，翻山越嶺，走進覆蓋在黛瓦之下的村落。中國人的同鄉情結與地域之分相當有趣，徽州人團結是出了名的。儘管徽商風華已然遠去，今日徽州人身上依稀得見當年團結互助的精神。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鄉，隨著時空的變化，故鄉的印象反而益發鮮明美麗，不論真實的面貌究竟為何。薩伊德所謂的「格格不入」，並非僅存於遷移流浪異鄉的族群，只要人在社會裡不斷地在流動，都會產生這樣的情感。在中國，南人在北地，北人居南地，亦復如是，徽州人在異地表露出的那種對故鄉人文的自豪，使我想要進一步去了解文獻中刻畫的徽州，與從現實人物身上所領悟到的文化精神是否相契。

今春得知中研院史語所、蔣經國基金會、宋慶齡基金會與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聯合舉辦徽州研習營，便毫不考慮地報名，最終幸運地被列入學員名單，非常感謝。我對清朝宮廷檔案較為熟悉，民間文書向來是自己的弱項。徽學向以研究民間文書著名，惜原始文書多分藏於研究機關，要通讀並不容易。能有機會與研究與收藏徽州文書的學者交流，實屬難得。

此前，我從未參加過中研院舉辦的研習營，僅能就本次略表感想與意見。首先就研習營的形式而言，學員在行前一個月前就可以閱讀到師長指定的參考論文，即使文獻資料在入住後才拿到，也不至於對研讀毫無頭緒。然而自己實在對徽學毫無基礎，要在短期之內將論文與研讀文獻材料融合並提出意見，非力所能

及。討論時，就有老師提到有的學生問的問題，在提供研讀的文章中已經有過解讀。

研習營採取白天授課、提出問題，夜間分組討論、集體討論的流程；分組討論是每個學員需要盡心準備的重頭戲。每個學員都有自己的專精領域，是以分組的組長作用很關鍵，必須具備協助分配任務與時間、帶動主題討論的能力。最後的集體討論總是非常精采，曾聽做田野的學者說，他們開會或組隊出去調查時，經常會討論問題至凌晨（可見身體強健實為任何績業之根本）。但是研習營與純田野的調查不同，每組的發言時間若控制得不夠精準，就比較像報告而不像回應與討論。這回李孝悌老師在分組討論時給了學員們很多的建議，我個人很受啟發。

至於本次研習營的內容，涉及的主題有徽州的宗族、文書、商會、村規民約、訴訟、祭祀與信仰、田調、戲曲、繪畫、建築、理學等等。阿風、常建華、卞利、王振忠、鄭振滿等諸多師長對徽州文書的解析與調查，填補了自己對徽州文書基礎知識不足的缺憾。鄭振滿老師精采的田調經驗，以及由田野建立對地方宗族的理解，讓我自覺不應僅是坐在檔案館與圖書館思考問題。阿風老師融合典籍與文書，對明代地方司法審判的理解，雖建立於徽州文書，又並非以文書內容是瞻。師長們不吝分享的民間文獻資料，更是可貴。

相較於民間文書，若要在清代中央司法檔案內找尋一案始末，必須旁及其他衙門檔案。清代地方各級衙門固是有全宗檔案，因兵火之故，至今得以留存大量檔案的地方並不多。徽州人於訴訟向來謹慎，習於保存始末證據，因而成就今天的徽學。我在王振忠老師提供的婺源理坑《欽定三府世僕案卷》裡讀到關於徽州府世僕的糾紛，深感雖然各家或各族保存的文書或有偏頗自身者，亦不能掩蓋抄存文書的價值，編輯文書者的觀點與書寫策略更值得研究者去玩味、思考。

由於學員們來自兩岸高校的年輕學者與博士生，彼此之間研究領域又各不相同，課堂與私下的思想交流不斷，得以聆聽到對史料解讀的不同見解。對我而言，能回到學生身分，將心靈倒空，重新積累，所得的收穫不僅止於知識層面。在閱

讀史料的過程裡，更讓我對一些既有的學術觀點產生的新的解讀與思考。既然每個學者的論點都是建立在掌握的史料之上，那來自於不同地方史料的觀點，是否可以適用於其他地方史料的解讀呢？經過這次的研習，個人感覺日後自己引用學術的既成觀點，須得要更小心地論證與思考。最好觀點的建立與所運用的史料密切相關，若對自己的資料不夠熟悉，就不要輕易套用既成學術觀點來論證。

研習之外的采風，與十年前初遊徽州心情相較，這種由師長帶領、學員互相討論交流的情景，更令人心生舊雨新知之喜。但近年來黃山市企圖打造旅遊名城，隨處可見現代化的嶄新街道與建築，城鎮之中，徽州古韻逐漸減淡（或許對當地人而言未必是壞事）。村落雖猶存六七分當年風景，因旅遊經濟之故，人心世情亦有變移。在我眼中，與其在著名村落裡消磨光陰，莫如在萬安水巷內尋覓清靜所在，坐看新安江水流東去，春去秋來，晝夜如一。

最後，以在月沼畔隨手塗寫「戲說」一首，聊充文末。

### 【戲說·宏村】

清澗蜿蜒穿翠屏，車馬輾轉至村前。

幽境早為天下知，橫腰一柵買路錢。

紅塵過客思桃源，數金換得半宿眠。

堂內老翁不勝慨：「憶當年，千方百計出深山。」

## 在田野與文獻之間

——參加“第二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徽州”隨感

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玖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鄆、薛、彭城，過梁楚以歸”而成《史記》，凸顯了中國史學研究中重視“田野”的傳統。政治家寫政治史則凸顯了“現場”對史家治史的重要影響，梁任公以“二十四姓之家譜”諷喻“正史”濃重的政治史色彩，然而從這些“正史”編修者的“出身”來看則又在情理之中，他們幾乎都是政治家，均在政治“現場”摸滾日久，也因此唯有他們才有可能參透複雜政治面相背後的玄機。從這個角度來說，“二十四史”側重政治史反倒是應有之義。我一直對現在的純學者研究政治史憂心忡忡，政治本質與表象相差豈止十萬八千裏？豈是我輩讀書人透過聊聊文本所能參透？由此，我對“走向歷史現場”去探討歷史真相充滿興趣，也充滿期待。

## 二

“第二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徽州”是我第一次追隨眾多“田野”高手去感受“歷史現場”，對我而言只有“震撼”一詞才能形容內心的感受。

震撼之一：歷史文獻可以這樣讀。

作為一名徽學的初學者，我閱讀過些許徽州的地方文獻，也跟隨諸位先生探訪過徽州數次，但從未將“眼前的徽州”與“地方文獻中的徽州”進行對接，其結果是“探訪”與旅遊無異。

眾所周知，對文獻的解讀如果脫離了它所存在的場域，偏差甚至謬誤便不可避免。同時，由於文獻內容往往是零碎的，如果沒有對文獻所反映的歷史場景的整體性感知，用它所拼接起來的圖景往往也是支離破碎的。歷史場景與現實場景存在著延續性，這就為通過“田野”感知歷史場景提供了可能，再將“田野”獲得的對歷史場景的認知與文獻相結合，便有可能構建起一個較為完整的歷史圖景。這樣的圖景才是較為接近歷史真實的。齊雲山和徽州古村落的田野調查，便大大加深了學員們對勞格文教授、龔書章教授關於齊雲山道教和徽州古建築講演

內容的認知。同時，置身於道雲繚繞的齊雲山上看碑刻，毫無閱文獻之感，仿佛和信眾在促膝交談，此情此景使我們對齊雲山道教的認識從想像落實到了空間。我想這也是“華南學派”之所以引人矚目的原因所在吧。

震撼之二：學術會議可以這樣開。

跟隨老師參加過許多學術會議，但就我參加過的大陸的學術會議而言，往往有知識“交流”，但少有知識“激蕩”，大家熱衷於自說自話，對別人的回應也多為“歷史評論新八股”：“觀點新、材料新、方法新，但也存在一些需深入探討的地方”。但“新”在何處未見說明，何處“需深入”不見明示，一場“討論”下來個個昏昏欲睡。但這次在復旦的12場學術討論，學員們對於諸位老師的報告敢於批評，老師們的回應也不再是謙辭般地簡單說明，而是進一步與學員進行論爭，學員之間也互相爭論。如對於鄭振滿老師關於“歷史現場”的解釋、卞利老師關於“鄉村治理”概念的界定等問題的討論等，其結果是大家越討論越起勁，對問題的認識也越來越清楚。或許對一些問題的認識最終很難達成共識，但在方法論和認識論上都獲得了極大的提高！從而真正實現了知識的“激蕩”！

### 三

復旦校園諸位先生的精彩報告、徽商故裏震撼人心的“田野”與討論，時時浮現在我的眼前，“歷史田野”的魅力已深刻感染了我。但與此同時，我也一直在反思“田野”中可能存在的陷阱，畢竟任何一種理論或方法都有其不足之處，唯有全面認識它，才有可能使我們使用這些理論或方法時避免犯錯或少犯錯誤。

“田野”畢竟不同於旅遊，兩者最大的不同當是對兩者主體的知識水平的要求不同。“田野”者必須首先熟悉當地的文獻、了解當地的文化，唯有此才能真正地將“田野中的它”與“地方文獻中的它”對接起來。我想這也是在赴徽州之前李孝悌老師、王振忠老師反復督促我們一定要認真閱讀《閱讀材料》的原因吧。現在在一些年輕的學者中間似乎出現了“輕文獻，重田野”的傾向，即將文獻放在一邊，直接奔赴田野進行所謂的考察。結果是不僅不能通過“田野”深化我們對文獻的認識，甚至對“田野”所釋放的信息的理解也是錯漏百出，這是非常可怕的。

“走向歷史現場”並非表明我們真的可以身臨其境。所謂歷史現場當是指“發生歷史事件的場所及當時的狀況”。歷史場景與現實場景的延續性為我們走

向歷史現場提供了可能性，但畢竟歷史現場“當時的狀況”已不可能復原，而且還會受到周遭環境改變的影響。因此，我們在“田野”時所處的“歷史現場”並非真正的“現場”，而是與“歷史現場”具有一定關聯性或延續性的一個全新的場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一定要藉助文獻，分辨出哪些是“當時的”，哪些是“後來的”，盡量減少“後來層累地造成”的新場景對我們的影響，否則這個“現場”不僅無助於我們“移情”，甚至還會誤導我們。

與此同時，還要特別注意田野“現場”的真實性。這次在休寧萬安老街時，大家都發現了一個保存相當完好的“清代”藥鋪，一些學員認為這就是研究清代醫療史或藥業經營史的一個很好的田野素材。但後來得知那僅僅是拍電影的“道具”，是後來“偽造”的歷史現場。如果以此作為“史料”，其結論可想而知！

鑒於此，從徽州返回北京後，我一直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如何在歷史文獻與田野之間尋找一個平衡。我個人以為這是擺在已經或將要走向田野的史學研究者面前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在文獻指導下田野，通過田野幫助和深化我們對文獻的理解，我想這或許是一個比較可行的途徑，儘管真正做到這一點相當困難，但大家首先應有這樣的認識，唯如此，“田野”作為當代史學研究方法之一潮流才有可能健康地向前發展。

#### 四

這次活動還收獲了很多的感動：

這次活動的組織周到、細致，金秀英老師、張雅芳老師等會務人員忙裏忙外，為大家貼心服務，毫無怨言，令人感動。

各位老師耐心細致的準備工作、充滿睿智的講演和精彩的回應，令人感動。

各位學員認真執著的求知精神，討論及私談中的智慧、思辨和無私，令人感動。

王振忠老師、李孝悌老師等自始至終對我們耐心的指點和諄諄的教導，令人感動。

蔣經國基金會、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宋慶齡基金會貢獻學術、栽培後學的精神，令人感動！

……

當然這次活動最重要的收獲是結識了諸位師友！

## No. 16 廖宜方（中研院史語所助研究員）

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招收的學員以博士生與青年教師為主。因此，和其他研習營成員構造相比，比如歷史研習營或閩南研習營，兩岸研習營的學員在研究經驗上理應比較豐富，知識見解也更深入。但另一方面，由於博士班在學術生涯上是邁向專精研究的階段，因此一般而言，在知識的攝取上比較專注在自己研究的對象；甚至可能特別擅長閱讀某些領域的論著與史料，但對其他領域則相當陌生、甚至無能。如此一來，當研習營提供了五花八門、各種領域與主題的閱讀材料時，學員本身是否真的有能力深入閱讀，亦或淺嚐即止，其實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相形之下，尙處於摸索階段的大學或碩士班學生，由於修課的範圍較廣，是否比較能夠領略、接受不同的刺激？

一般而言，進行研究時，如果受到問題意識的導引，就會比較容易主動觀測相關的現象，尋找問題的答案。如果研習營一開始接受報名時，就要求報名學生提出計劃，說明「我想在這次的旅程和田野調查中，尋找某個問題的答案」？如此一來，學員在行前的準備、在聽講與參訪的過程中，都比較容易凝聚特定的問題，從而開啓個人探測的知識雷達。甚至在繳交心得報告時，也可以試著回答自己當初提出的問題。當這些程序彼此相連時，學員是否可能產生更明確的收獲？

在這次營隊中，我的探查經驗始於復旦大學；在整個旅程中，我更敏感意識到「空間」的意味。到復旦之後、閒步參觀校園，沒多久就發覺：校園的圍牆很多，有些甚至很高；每個單位都以圍牆區隔，甚至連運動場地都以欄網區隔。而且圍牆的開口很少，出入只有一、兩個。所以有時必須繞一大圈，才能進或出。圍牆的設計，可以降低外來者的「穿透性」：身體的穿透和視線的穿透。但對內部的人來說，是否限制了其精神的穿透？此一經驗在我租借了腳踏車騎入上海市區時，又得到驗證。上海的都市規劃以「小區」住宅的方式劃分區域：每個小區外包圍牆，只有少數幾個出入口。依據我在台灣騎自行車的經驗，即使在不熟悉或錯綜複雜的巷道，只要方向正確，就可以抄捷徑、走近路，總是可以找到出路，

通往目標。但這種方式在小區行不通。因為就算方向正確，但該方向可能未設出口，或出口封閉。以致於我在小區裏騎自行車常常碰壁，最後被迫只能騎在馬路上，避免轉入小區的巷弄。上海的「小區」規劃讓我想起中國古代的「里坊制」，以及「合院建築」的「封閉性」，以及萬里長城與網路長城「金盾」。中國真是一個對圍牆、對人口移動、對「穿透性」很敏感的社會。由於此一經驗，我對閱讀材料中有關徽州合院建築的部分，更有感觸。我也請教中國友人以及建築學者對這種「小區」規劃的看法。到了徽州當地之後，發現這種「小區」的都市規劃似乎不像上海那樣佔據主導性的地位。有人提到，「小區」規劃是一種人口布置與控制的手段。上海這樣的大都市，或許尤其需要防範農村人口擁入，特別留意「閒雜人」與「陌生人」的徘徊遊盪與「敵人」的侵入，從而使得小區的都市規劃受到重視。

在宏村的參訪中，我再一次體驗到如何「穿透一個聚落」的障礙。當時因為希望能走遍整個聚落，並多拍照片，以致於當集合時間已經逼近，但我卻離集合地點有一段距離。我不斷參照手中簡單的地圖，不斷透過景點來定出自己的位置，向集合地點快步前進。但這一路都是彎彎曲曲的巷弄！非常容易讓人失去方向感。以前聽人解說台灣鹿港等舊城鎮的巷弄之所以彎曲錯雜，原因之一是為了防範外敵。除非熟悉巷弄去向，否則很容易迷失其中。難怪有人提到歐洲城鎮中教堂建築多拔起於住居之上，從城鎮的任何一地都可以望見教堂高聳的尖塔，每條道路也都匯歸於教堂或市政廳前的公共廣場。相形之下，想要穿越或走出宏村聚落並非易事。

巷弄的彎曲錯雜，恐怕未必出於刻意讓外人迷惑的目標，而是在其聚落成長、擴張的過程中彼此推擠的結果。倒不是每個聚落的內部動線都毫無規則。訪查的行程中也拜訪了幾個沿河的街市。這些商業性的聚落多由一條與河流平行的主要街道構成；較小的巷弄則與主要街道垂直相交。只要順著主要街道，就可以「穿透」整個聚落；只要順著巷弄的階梯和斜坡向下，就可以連接主街、走到河岸。也就是說，即使是外人，也不會迷失。是否這些商業性的渡口與河港，由

於開放性較高，必須接受、容納來自上下游的「閒雜人」、「陌生人」等，讓他們在此住宿、休息和娛樂，從而比較容許外人「穿透」——進入和離開。

以此經驗為出發點，或許可以進一步思考古代地圖的「使用方式」。明清時代的地圖，視覺上常常給人一種彎彎曲曲、不精確的感覺。現代人已經掌握現代的都市規劃，也習慣精確描繪的地圖，那麼古代人又是如何運用地圖來定位？是以地標嗎？或以方向？如果還有機會，或許我該在沒有地圖的指示下，走進宏村，然後設法走出來。

最後，還有一點值得一提。從齊雲山離開時，在搭上纜車之前，我發現車站牆壁上貼了許多古人所繪的齊雲山風景圖。在去徽州之前，看到那些風景圖，總覺得千篇一律，看不出差異，也不覺得現實。但走了齊雲山一趟、親眼所見之後，我才發現那些風景圖是寫實的，而且傳達了當地風景的特色。原來田野調查，不只是去理解歷史的真實：地理的齊雲山，也藉此去理解文本的真實：文字與圖像中的齊雲山。歷史理解的形成，或許即在於去掌握這兩個層次的真實如何產生關係？如果再前進一步，研究者或許可以嘗試：以「擬仿古人製作文本」，作為理解的方式。何謂「擬仿古人製作文本」？用古人的筆法來製作地圖、寫作詩文和描繪風景。甚至拿著古代的地圖出發、走上古道……。

## No. 17 林勝彩（中研院文哲所博士後）

不管在此次研習營的課程裡，或是實地到徽州考察的旅途中，常常可以聽到授課老師或導遊提及徽州當地的俗諺：「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或是明代文學家湯顯祖的詩句：「欲識金銀氣，多從黃白游。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我想，這或多或少可以用來表達自己參加這次文化營的感受。

自己平日較為關注明清學術思想史的研究，同時也正在從事徽州婺源學者江永文集點校整理的工作，所以報名參加「徽州文化研習營」，自始便有很明確的目的性，即想親身到徽州，感受當地的文化風光，實地到江永、戴震等學者曾經生活過的土地走走看看。不過，研習營並沒有一開始便到徽州，而是在「上海」復旦大學上課，由相關教授專家介紹徽州文化的方方面面，舉凡徽商、徽州宗族組織、宗教、思想、文學、建築、徽州文書等等。雖然從密集及內容豐富的課程中，能夠讓學員很迅速地領略徽州文化的特色，不過，選擇在現今大陸「金銀氣」最盛的上海來認識徽州文化，確實也是很有趣的安排。因為等到課程結束後，實地到了徽州，即便現代和明清時期的徽州，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有不小的距離，也能夠讓人強烈地感受到，爲了求生存，明清時期的徽州人選擇到外地打拼的原因。如同在各種歷史文獻材料得來的印象和知識一樣，這是一個山多地少，農業發展不易的地區，徽商的出現，確實有其地理環境上的因素。而徽人多聚族而居的習俗，也顯現強大的宗族組織和文化，在徽人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和影響力。雖然關於徽商和徽州的宗族組織，是大部分人對徽州歷史文化的基本認識，不過，親自到徽州，確實能夠加深這種理解和認識。所以，雖然只是短暫幾天走馬看花的行程，也稱不上什麼嚴格意義上的田野調查，但這種身歷其境的實際感受，是讀再多有關徽州地區文化的介紹性文字所無法得來的。在這次經驗裡，行萬里路確實勝於讀萬卷書。

不過，如同丁令威化鶴歸來，城郭人民，觸目皆新，自己也明白，如同歷史上的徽商已不復存在，此時的徽州，也非明清時期的徽州。對大部分人而言，江

永、戴震等學者在學術思想上的成就，或許也如同仍舊矗立的牌坊，不過是冰冷的歷史遺存，僅具有些許的旅遊和觀光價值。但和大部分的台灣人一樣，不管因為何種歷史或政治的因素，祖先選擇在台灣定居，自己對傳統文化的認識，都是從書本來的。較為文學性地描述，對大陸的歷史和土地，多少懷有一種文化上的鄉愁。所以，不管「無夢到徽州」的詩句做何解釋，自己很高興，第一次到大陸，就是到較為熟悉的徽州，不無誇大地說，這次的徽州之旅，也解了自己的思鄉之苦。在這個意義上，自己很慶幸，也感謝蔣經國基金會及中央研究院能夠提供這個學習的平台，讓自己藉由參加研習營的機會，較為近距離地接觸徽州文化。當然，自己也瞭解到，對徽州文化的認識仍舊是很膚淺不足的，期待在往後的日子，不管是藉由閱讀研究歷史文獻，或再次到徽州實地考察，能讓自己更加接近理解徽州文化。而這次徽州文化研習營的經驗，便是一個美麗的開始。

## 独学而无友，其无惑乎？

短暂紧凑的徽州营学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在十天过程中，每天都有心得，总觉得时间不够，没能在当时梳理记录，只能简短地与同学交流。研习营回来之后，我就感冒了——坚持在不少同学之后，就是靠着研习营的严谨、紧张的气氛坚持了下来。我迟迟没有动笔，感冒连睡三天一直沉浸在研习营的美好回忆里。作为一名复旦的博士生，之所以为此而激动，正因为组织方精心安排、照顾周到，课程安排知识密度高，这是我求学多年来少见的办得如此视野广阔又目的明确的学术活动。这次研习营，是两岸基金会和研究机构精心合作的结果，我诚挚地再次感谢组织各方工作人员的辛劳付出。

在课程阶段，其实一开始不论大陆还是台湾同学，都有些扛不住一天三班的高强度授课，但以我本人而言，真是受益匪浅。我作为一名非历史专业出身的同学，由于研究课题而涉足徽州历史、江南文化史相关领域。五天的课程，不论从师资还是内容，都近乎完备，我每天都学到很多新东西，每天都在努力跟上老师的思路。老师们提供的参考文献都是精心挑选的，很多对我而言就是继续学习的目录。老师们各有专题方向，在授课中，学习到了很多具体的方法，共通的一点就是要重视史料，新旧史料的结合才能发现更多。范金民、郑培凯两位老师讲的部分，我尤其感兴趣，他们分别从宏观的江南文化与徽州商人的关系和汤显祖个案的角度揭示了士人与商人的交融。劳格文教授用细读的方式教我们读道教科仪文献，这也是很难得的机会，因为现在这样纯粹把文献读透的功夫我们很欠缺。此外，郑振满教授就实际经验出发跟我们分享了对史学理论和田野考察相互关系的思考，很受启迪，田野调查的本质是历史研究的需要，是对既有精英历史认识的反思和补充，进而对史学的价值做出新的思考。五天的学习，我们学员之间相互切磋，其实很多都是初次接触。博士并不多闻，大家凑在一起从头学起。我们组员，在讨论环节，各自分工，以自己擅长的部分牵头，相互帮助，很有乐趣。当然，免不了冷场，或者跑题，李孝悌老师就来给我们纠正偏差。后来学员之间慢慢有了争论，这样的争论是非常可贵的，因为彼此的知识背景不同，讨论起来就会带出很庞大的知识系统，对我来说是大开眼界。很多问题以前听说过，但没机会深究，正好互通有无。尤其是关于道教等宗教部分，来自台湾的同学提供了很多鲜活的实例。使我思考，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在我看来，历史和现实没有区别，尤其在中国，现实往往是活着的历史，这种鲜活感在后面的实地考察中尤其

明显。

在考察阶段，五天的行程也是极为丰富，每天不是在车上就是在古镇。这些古镇，都依水而建，显示了与商业运输的密切联系，也因为在水边，往往青山绿水，格外逍遥。尤其是在汪口，婺源的山比徽州北部要高要难走，这些地方，即使现在看来也是极为险阻的，在明清甚至宋元时代，竟然是商业发达之处，文化发达之处，在直观上就有很大的刺激。农业时代，南方商业的主要部分就是茶、盐等，这些山区本是贫瘠之地，反而成为了经济的起点。巨族在山区的大量存在，也是值得思考的。忙碌的考察自有偷闲的时刻，实地体会了新安江上泛舟、婺源的竹排，体验了山民的生活，同学们此时也都不谈学术专开玩笑。

整个活动中，彼此的情谊是最珍贵的。一开始，两岸学生交流不多，都保持着矜持，等到讨论起来，就机锋来往，展现本色了。在考察的途中、在每顿都有梅干菜的饭桌上，大家无所不谈，天文地理、生活习俗都有，以至于我们组的同学先行时忍不住含泪。研习营的节奏十分紧凑，我们组的不少人感冒了，但他们坚持了下来，需要发言的时候还是很严谨地查阅文献、把观点表达出来。有的同学实在不能说话了，就代他发言。许多问题是在车上、路上，相互咨询、讨论才弄明白的。此外，在考察途中，我们得以向授课老师很放松地请教问题。尤其是爬齐云山，因为分几批上山，一路上或与祝平一老师同行，或与黄进兴老师观亭，饶有古风。组织各方的幕后工作者，负责具体事宜的老师们付出了大量的精力。据我所知，中研院史语所的张雅芳老师、复旦文史研究院的金秀英老师、蒋基会的余晓兰老师前后感冒发烧，实在是操劳过度，我们学员往往一时兴起，全靠他们维护秩序。所以非常感谢这些默默付出的老师们。

最后，照例提一些不怎么宝贵的建议，我想主要就是一个：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地区和专业，博士其实都是专门家，研习营的内容也很广泛，希望学员研讨部分以后能够做得更好些。授课老师可提供一些基本知识的清单，和对阅读材料的简要介绍，我们可以更有效地阅读文献，讨论的时候少走弯路，有的放矢。

感谢主办方、协办方、授课老师和工作人员。想念散在天涯的师友们，盼能再叙。

## No. 19 唐蕙韻（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從課程安排就已體會到研習營規劃者力求面面俱到的用心，幾乎包羅關於徽州文化的各種人文景觀，以一時之選的師資企圖為學員進行最精緻而深刻的徽學導覽，而不只是以民間文書為中心的史料解讀。上課的幾天是充實而幸福的。

實地訪查多數來去匆匆，見聞收穫主要是隨機所見，並非出自問題意識的考察。休寧萬安老街和汪口村街令人印象深刻，比起觀光化得厲害形同喬城的世界遺產黟縣宏村，這兩處各自保存著村街和鎮街的形貌原型，還有一息尚存的生活況味為自己不言而喻的歷史潤色，那渡口下貨、街坊生活的歷史場景，即使喧嘩不再，也能在置身其中的當下領略其生活熱烈之一二。很值得珍惜，但一切都正在過去。萬安老街的人都說著，就這一兩個月，這些老路老石頭就都換新了，開發了搞觀光，現在這樣破爛的誰會來呀，你拍這石頭幹什麼呢。歷史是為還原過去還是復興過去式的未來，對史學真諦甚感迷惑的我，常常在歷史文獻的閱讀中，玩味著歷史學者和居民對同一個歷史現場的解讀和觀看方式。

可能個人興趣使然，齊雲山的科儀書和齊雲山的神像們對我而言是好看的。登齊雲山求玄天帝保佑孩子的當地人，五顯靈官都唸不齊全也全然不識了，我卻是沿途興奮的看著一路與南方民間信仰有著呼應的民間神祀與信仰現象，和昨晚讀過的勞老師講義及其科儀書內容有著聯翩意想。我一仍相信齊雲山玄天帝獨特於他處玄天信仰所被強調的求子職能應是嫁接自同山頭中被奉祀甚早、且在他省各處都以助生育兒興香火的碧霞元君信仰而來。雖然李孝悌老師特別舉了嘉靖皇后也向武當山求子及皇室一般不拜民間淫祀等說法，反駁常建華老師支持的碧霞元君說。但從信仰角度看，一心求子至四處求神的信徒，有沒有充份的理性與矜持對抗被稱有靈應的民間淫祀的信仰魅力而不就，是一懷疑(後宮巫術也是很流行的淫祀呀)；又是否因元君非官祀正神而將公開封賜的求子之功轉嫁給了官祀正神玄天帝，而造就了齊雲山獨有的玄天求子信仰？是我又一懷疑。李老師秉史識之見的反駁，倒激起我對此懷疑一探究竟的興趣，且待後日尋覓史料好生考察

一番。勞老師與道士互動的現場是很引人入勝的田野，但不是這樣的營隊可以以團體研習方式體驗的，雖是照片瀏覽，仍給了我些啟發，留在以後發酵。

最可貴的經歷是與兩岸同好仁君的深刻相處與廣泛交流。討論桌上未能節制公共時間的發言有時令人無奈，毫無組織和閱讀準備而一逕點名組員發言以貢獻共同討論之結論的小組主持人偶爾使人氣悶，然而飯桌和長途車程上不拘小節的談天說地，倒也能在討論桌上不及深入處，另開出充份對話和相互理解的空間。唯其是如此精心策畫而又充份人性的研習營，能給予這樣適足的養料與空間。衷心感謝。

## No. 20 王紹欣（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博士後）

二零一二年八月的中下旬，在臺灣中研院史語所、蔣經國基金會、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宋慶齡基金會的支持下，數位怀揣著弘道理想的師長，和一群虛心向學的年輕人，因為各種機緣匯聚到一起，組成了「第二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徽州」營隊。我十分幸運地成為這個營隊中的一名學員，與來自五湖四海、有著多樣知識背景的同學們，一起度過了一段難忘的學習時光。十天的營期緊張而充實，在復旦大學上課階段，大家每天早起晚睡，重復著卿雲樓、光華樓、且苑餐廳三點一線的生活，白天聚精會神聽課，晚間暢所欲言討論，深夜回到住處仍要與室友交流一天的收穫；待營隊開赴徽州之後，師生們每天仍是連軸運轉，日間奔波於各個考察地點，觀覽山川風貌，體察風土人情，踏訪歷史遺蹟，夜晚沉浸在各類文獻之中，努力將田野所得與文獻記述相結合，以期深刻理解或是重新解讀文獻，獲取新知。當初，每位學員大概帶著不同的問題與心境加入到徽州營隊中來，在大家揮手相別、互道珍重時，相信我們每個人的心中都應是有了自己的答案與體悟。

作為一名徽學研究的初學者，對我來說，此次參加徽州營隊是一次難得的學術體驗。在這次研習活動中，我所收穫的不僅是知識、方法與田野經歷，還有與師長、同學建立起來的深厚友誼。這些都是我學術生涯中彌足珍貴的財富，值得我一生去珍惜。

感謝主持研習營的黃進興、葛兆光、李孝悌、王振忠幾位師長，他們為我們精心設計了研習課程，課程內容不僅涵蓋徽州社會史的不同面向，而且納入了徽州的宗教、戲曲、建築、藝術與文學，讓學員們可以體味徽州社會與文化原有的複雜面貌。他們邀請到海內外徽學研究領域的多位優秀學者，為我們傳道、授業、解惑，使大家在短暫的時間內享受到一場別開生面的學術盛宴。徽州商人、徽州宗族與徽州文書是徽學研究的三個主要領域，課程中有關它們的內容比重較大。在徽商研究領域躬耕多年的唐力行、范金民老師，分別向大家介紹了近代徽商的

同鄉組織以及明清徽商投資藝術品的情況，使徽商群體的形象在我腦海中變得更為立體。對徽州宗族研究精深的常建華老師，在演講中闡述了他宗族鄉約化的觀點，並提及近年來徽州宗族研究的新動向，于我目前正在進行的明代祁門宗族研究啓示良多。王振忠老師把大家引領入徽州文書的繽紛世界，他在課件中展示的多樣文書令我生髮不少感慨，一是敬佩其在民間文獻收集方面堅持不懈的精神，同時也深感徽州民間仍有大量遺存文獻等待我們去找尋。阿風老師「從徽州訴訟文書看明代審判制度」的演講令眾人有如沐春風之感，他從古文書學及制度史的視角來解讀徽州文書，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卞利老師則給我們展示了種類繁多的徽州村規民約，這些文獻不僅讓同學們大開眼界，也引發了晚間熱烈的討論。另外，鄭培凱、徐澄琪、龔書章、祝平一、勞格文幾位老師，分別以「湯顯祖與徽州」「黃山與新安畫派」「徽州的聚落與民居」「江永、戴震與西學」「齊雲山與道教」為主題發表演講，他們深入淺出的精彩講述，仿佛在我眼前次第開啓一扇扇奇異的窗，讓我對徽州的文學、藝術、建築、思想與宗教有所瞭解，深切感受徽州歷史內涵之博大豐富。與前面這些課程相比，鄭振滿老師的演講帶有濃鬱的方法論色彩，他與我們分享了自己幾十年來在福建進行田野考察與民間文獻收集、整理、研究的學術經歷，透過他充滿智慧的話語，我對於田野考察與民間文獻，都有了更深一層的認知。為了讓學員更好地理解課程內容，在研習營開班之前，各位授課老師就已經把與課程相關的閱讀材料上傳至網絡，供大家下載學習，入營之後，助理老師又將這些材料的紙本分發給我們，厚厚的三大冊有七百頁之多。另外，李孝悌老師反複叮囑大家，每天晚間的小組討論與綜合討論，一定要圍繞白天的課程與相關閱讀材料來展開。得益於各位授課老師的悉心講解，以及李孝悌老師的嚴格要求，在復旦大學聽課的每一天，我都是收穫滿滿，于知識結構與研究方法層面均有所提升。在多樣知識的激盪下，對於徽州研究，我生髮出一些感悟，深切體會到若要理解徽州，必須要有一種整體史的視野，但是鑒於徽州社會的複雜度，這種整體史的研究並非易事，大概需要幾代學人堅持不懈的努力。

在田野考察環節，主持研習營的幾位師長為我們設計的體驗內容同樣十分精

彩。從田野考察涉及的地域範圍來說，徽州包括「一府六縣」，我們到過其中的「一府四縣」，在有限的時間內，觀覽了盡可能多的區域。而我們田野考察的地點，既有承載着徽商輝煌過去的歙縣魚樑古鎮、休寧萬安老街，也包括宗族聚居的古老村落黟縣宏村、婺源汪口、歙縣棠樾，此外還有古稱「白岳」的道教聖地齊雲山，以及藏品豐富的徽州文化博物館與婺源縣博物館。自二零零五年夏天開始，在老師們的引領下，我開始走進歷史田野。近年來，在華北幾個地方，我斷斷續續進行過一些田野工作。因此，田野考察的研究方式，對我來說不算陌生。不過，此次徽州的田野經歷，還是給我帶來了不小的震撼。雖然專心徽州研究已有一段時間，但我到徽州進行田野考察的想法一直未能成行，這次研習營活動，是我第一次踏上徽州土地。猶記營隊乘坐的大巴車駛入徽州境內時，望著車窗外連綿高聳的群山，以及青山綠水間灰瓦白牆的聚落，我的興奮之情溢於言表。彼時浮想聯翩，腦海中仿如電影片斷般閃過一些畫面：北方民眾的蜂擁而至，鄉民因山林糾紛曠日持久的爭訟，甚至還有土地清丈人員在山間丈量登冊的身影。到達徽州的當日，我們造訪了歙縣魚樑古鎮，古鎮旁靜靜流淌的是新安江的支流練江，當年徽州商人就是沿著這條江水順流而下去往杭州等地。站在江畔，望著寬闊的江面，一時間感覺自己此前讀過的徽州文獻，在這青山綠水間突然都變得無比鮮活。這種書齋苦讀無法獲得的「現場感」，或許正是田野考察的魅力所在。對我而言，這次田野考察收穫最多的地點是在齊雲山。鄭振滿老師將他「民間文獻與田野考察」的課堂延續到了歷史現場，在齊雲山考察過程中，他一路帶領大家認真閱讀碑記與各種匾額。當我們幾位一直跟隨鄭老師訪碑的「落後分子」，饑腸轆轆的歸隊就餐時，齊雲山的興衰歷史以及它與週邊村落的關係，已是瞭然於胸。此外，因為目前正在進行徽州宗族研究的緣故，這次徽州之行，我最想看到的是徽州的祠堂，在黟縣宏村、婺源汪口、歙縣棠樾，我如願以償地觀覽了汪氏宗祠、俞氏宗祠以及鮑氏的男祠與女祠。這些祠堂比我在華北見到的大多數祠堂，外形上要宏闊氣派。或許因為有實體建築的存在，在華北比較常見的一種具有虛擬祠堂功能的神主圖，在我們造訪的幾個村落中了無蹤跡。五天的徽州之行雖然短暫，但我從中收穫良多，也開始思考徽州的田野經歷與我此前在華北的田

野經歷有何差異。在北方進行田野考察，收集資料的比重會多一些，那麼，在徽州這樣一個文獻淵藪，其田野的意義又何在？答案或許正如鄭振滿老師在課堂上所講，在田野中為我們示範的那樣，徽州田野的意義更多的是在文獻被創作的現場來解讀文獻，以及從當地人的立場去理解文獻。

通過研習營的活動，促進兩岸青年學人深入而密集的知識交流與激盪，也是這次徽州營隊的宗旨之一。為了讓大家有更多思想碰撞的機會，主持研習營的師長們為我們設計了課程及文獻的討論環節。於是，每天晚間，結束一天課程或考察的學員們，匯聚到一起，分為四個小組，圍繞厚厚的文獻資料與一天所得，暢言所思所感。原本陌生的我們，正是在多次思想交鋒中，逐漸熟悉起來，並建立起珍貴的友誼。待相互熟識後，大家的交流也便超越了討論課的限制，隨時隨地，無處不在。來自四面八方的我們，有著多樣的學術背景，關注的問題也各不相同，但這並不妨礙大家交流，反而正是這種差異，讓我們可以相互啟發，產生靈感。下到田野之後，大家的交流機會更多了起來。不得不說，田野是個很神奇的地方，它讓沉浸其中的人們忽略了師長、學員的區隔，行走在鄉間的路上，每個人都變成了學術的「朝聖者」。在田野中，每當有一處新發現，老師們與我們一樣欣喜，而師長向學員「討教」的場景，也時常會出現。學術的道路本來辛苦，求知的路上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師友相伴，夫復何求？

伴隨著黃進興老師精彩的總結發言，以及王璦玲老師一曲婉轉的「遊園驚夢」，徽州營徐徐落幕。十天的時間過於短暫，當大家剛剛熟識起來的時候，就要揮手道別了。或許在每位學員的人生軌跡上，徽州營的意義會有所不同，但是我相信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我們每個人都會因為它而發生某些改變。

此刻，感恩之情不僅再次從心底湧起，感謝傳授給我們知識、陪伴我們行走田野的諸位師長，感謝引導我們思想碰撞的助教們，感謝前前後後為我們辛苦奔忙的金秀英、張雅芳老師，感謝營隊中每一位可愛的同學，這個夏天，與您們在一起，我感覺很溫暖。

最后，爲了讓「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永葆活力，我從一個學員的角度貢獻自己的兩點建議：一是如果有可能得話，希望在課程規劃中加入某一區域歷史地理方面的內容，這樣有助於學員們瞭解這一區域的背景性知識，對於其閱讀地方文獻與田野考察都有所助益；再者，是否可以在研習營開班伊始增加一個「學員自我介紹」的環節，使學員之間盡快熟悉起來，以便更好地進行交流。上述建議，是否妥當，還請老師們斟酌取捨。總之，祝願「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活動越辦越好！

No. 21 张湖东（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博士生）

## 事实与价值：田野调查的两个面向

——“徽州营”研习心得之一

近日，有幸受蒋经国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的资助，参加了“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的学习和实践。在饱览田园山水、人文景观之余，有些许心得体会，拿出来与诸位分享。再次感谢资助和组织单位并各位老师！

在下去做田野调查后，田野工作者往往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受：在“田野”中了解到的情况和直觉感受，与之前阅读史料或相关专著之所得，会有出入，甚至迥然不同。同样是做田野，不同的调查者所得也不是完全一样的。有时，先前做田野的老师给你介绍田野点的情况，与你下去之后获悉的也存在不一致。这样，田野工作的实践者不免会问：到底什么才是“真实”的？田野调查能够达至“真实”吗？

在课堂和私下讨论，也有不少同学困惑：历史学（或人类学）是一门科学吗？它做出来的东西，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靠”的？如果我们不是追求“真实”，那我们努力的目标是什么？

这些问题，社会科学工作者或者准备从事学术事业的研究人员，深入进去，都会遇到。它关系作为一门学科以及学术研究者的定位问题。这些问题不考虑清楚，很难支撑一名研究人员“诚恳”地走下去。。。。。。

对这一问题，我的思考是——

田野调查有两个面向：一个是价值，一个是事实。它让人类学和历史学介于“人文”和“社科”之间。面向“价值”的时候，它旨在构建一个“有意义”的文本；面向“事实”的时候，它试图提供“可资参考”的材料。

严格来说，在“事实”和“价值”之间很难做纯粹的区分。但，通过把握不同的目的和读者群（服务对象），我们能够较为清晰地理解这一点。

在知识社会学看来，学术研究者和田野工作者，都是知识生产者——承担着知识信息的发现、发掘、整理、加工、搬运、传递的角色。他们的服务对象（或曰受众）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个人，一类是社会组织。

由此，我们站在被服务者的角度考虑：

作为个人，我为什么要去看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著作？我为什么要了解田野工作者提供的情况呢？发生在太平洋上某个岛屿部落的事情与我何干？西南边陲某处高山上少数民族的故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想去了解他们，因为我对自己当下的生活有种“观照”，我希望跳出现有的“圈子”——时间、空间和具体的环境氛围，重新打量和思考自身的处境与状况，至少期望能够从别的地方学到点什么，获得某种借鉴与启发。。。。。。<sup>1</sup>

作为组织，支持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的研究，了解田野调查者获取的情况，是准备运用于社会行动，服务于公共政策。。。。。。

针对不同的需求，调查研究者提供不同类型的知识：一类满足私人生活需要，侧重价值方面；一类满足公共活动需求，着重事实方面。前者多属于“意义”文本，后者主要为“参考”材料。尽管二者都以某种程度的“事实”为基础，但前者更强调“片面”的意义，后者更关注“全面”的情况。

为了更好地满足这两类需求，提供更为丰富的知识，田野调查的作用不仅在于寻找“事实”，更在于让研究者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找到“实体感”，找到“历

---

<sup>1</sup> 我们承认，有专门为知识而知识的田野工作者，也有只为“猎奇”或消闲一瞥的读者。但这种“装满”历史，“填充”着他者生活的“人”，某种意义上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是早已为尼采所批判的“行走着的‘百科全书’”（《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

史感”，找到“生活的质感”。在找到了种种“感觉”之后，意义类作品变得富有生命力，事实类材料显得更加鲜活。

有人说，历史事实只有一个，调查者如“盲人摸象”，只能获取片面的知识，永远不可能“准确”反映全部情况。

这不仅是历史研究者、田野调查者面临的难题，也是所有试图“掌握事实”的人感到焦虑甚至沮丧的地方。

澄清疑惑、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从认识论的高度去梳理，而需要对“研究”本身做合理的定位：符合“事实”并不等于完全“准确”，“研究”的目的并非简单复原“真实”，对于私人生活来说，它追寻的是其中的价值和当下的意义；对于公共活动而言，它试图把握的是基本状况与趋势。历史事实和真实情况很重要，是田野调查的努力方向；但不是田野调查的唯一追求，更不是否定田野调查的理由。

## No. 22 張學謙（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此次「徽州」研習營的考察地點，現時名為黃山市，位於長江三角洲經濟中心的腹地，是一個依賴旅遊業為經濟支柱的城市。而我們所涉足的具體地點，同時幾乎也是著名的旅遊景點，比如宏村，2001 年被評為世界文化遺產，有專門的旅遊網站，門票、導遊、旅遊商品販賣成為村民的生財之道，旅遊旺季甚至會組織村民表演傳統民俗活動，如中秋節「民俗花轎遊」。在這樣一個過度商業旅遊開發的地方，歷史、文化、民俗都是拉動 GDP 的超級火車頭，年輕的導遊無時不刻吹噓、推銷屯溪區最高最豪華的房地產，這反映了當下中國普羅大眾追求財富的夢想與焦慮。

這個過度旅遊開發的「歷史現場」雖然令好古者失望，但並不意味著實地考察沒有意義。明清的徽州從來都不是一個封閉的山村，無論是精緻的徽派建築還是巍峨的牌坊群，背後都是以徽商在外商業積累的財富為基礎。近代徽州商人的事業雖然走向衰落，但是商人為核心的流動人口，依然充任徽州地方與外界交流的主要津梁。換言之，徽州一直與外界保持互動，正如當下全球化旅遊經濟影響下的黃山市。

唐力行教授所提供「歙縣旅滬同鄉會」1947 年組織「撲滅家鄉瘧疾時疫運動會」的資料，顯示了徽州地區的公共衛生建設，與旅滬徽商同鄉會之間的密切關聯。在「衛生現代性」的背景之下，1947 年的這場運動會亦是生物醫學之衛生、疾病知識從通商口岸大都市傳往內陸的寫照。據 Chieko Nakajima 的研究，從 YMCA 至國民黨所建立的市政府，1920-1945 年之間上海的公共衛生以「運動」為主，即宣傳生醫細菌知識，規範個人的清潔衛生，令公共衛生成為動員教育大眾的運動。<sup>1</sup> 1947 年旅滬同鄉會將這種衛生運動會的宣傳模式應用於位於內陸的家鄉徽州。唐教授指出以這場撲滅時疫的運動會，從上海的同鄉會至徽州地方的

---

<sup>1</sup> Chieko Nakajima, "Health and Hygiene in Mass Mobilization: Hygiene Campaigns in Shanghai, 1920-1945", *Twentieth-Century China*, 34:1, 2008, pp.42-72.

鄉董，層層聯繫，反映了居住通商口岸城市的鄉紳對農村的控制。但是，同鄉會究竟對 1947 年徽州的「時疫」有多大程度的影響，我們並不能只依據同鄉會的資料來論斷。所以，參考唐教授的研究，本文試圖進一步提出幾個問題，1947 年左右的徽州地域，究竟有什麼流行病？歙縣旅滬同鄉會組織這場「運動會」，究竟要撲滅何種「時疫」？同鄉會具體使用何種手段來撲滅疾病？當地鄉民又如何看待、接受這場運動會？

據歙縣旅滬同鄉會的資料，「家鄉疫瘧，每年夏秋，尤見盛行」，故而組織撲滅疫瘧的運動會。<sup>2</sup>同鄉會資料中所謂「疫瘧」、「時疫」究竟所指為何種疾病？〈歙縣旅滬同鄉會為家鄉瘧疫流行敬告家鄉父老兄弟啓〉至少提到霍亂和瘧疾兩種流行病。而據《休寧縣誌》載，民國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七、三十、三十三年，屯溪鎮均發現霍亂病。<sup>3</sup>霍亂是由霍亂弧菌引起的消化系統急性傳染病，原發於印度，1820 年由海路傳至中國，從通商口岸城市傳至內地。自 19 世紀末以後，霍亂在中國華中、華西、華南常廣泛流行，上海每年約千名病人。霍亂流行期間，若無適當治療，死亡率常有 40%-60% 之間。飲用水以是霍亂菌傳染的主要媒介，所以霍亂與近代城市公共衛生工程的興起有非常重要的關聯。<sup>4</sup>瘧疾沒有霍亂對公共衛生的影響重要，它是由瘧原蟲引起的寄生蟲傳染病，傳染媒介是瘧蚊。

民國時期瘧疾的治療，通常以奎寧、阿的平來殺死瘧菌。相比瘧疾，霍亂是一種死亡率更高且更可怕的疾病。但霍亂病並沒有特效藥，只是補充液體及對症治療，或者注射霍亂疫苗。1930 年代，在租界及國民政府衛生署等機關的合作下產生的中央霍亂局，實行大規模預防注射，定期檢查飲用水，流行時提供清潔用水等措施，有效控制了霍亂流行。日據上海期間，日軍透過保甲制度和分配食物制度，將霍亂預防注射與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發放結合，普及至大部份上海市民。<sup>5</sup>也就是說，無論是戰前抑或戰爭期間，抑制霍亂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對疫區

<sup>2</sup> 《第二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閱讀材料（上冊）》，2012 年復旦大學、徽州，頁 16。

<sup>3</sup> 休寧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休寧縣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頁 447。

<sup>4</sup> 《霍亂》，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1950 年印行。頁 5-6。

<sup>5</sup> （日）福士由紀，〈戰時上海的霍亂預防運動〉，收入《清以來的疾病、醫療和衛生——以社會文化史為視

人民注射疫苗。這種方式的前提是有足夠的權力來控制疫區的人力和物力。

在此背景之下，我們看到歙縣同鄉會「運動會」，只是局限於發放藥品和宣傳衛生知識，並沒有強制性的動作，譬如疫苗注射或清潔水源的工程。宣傳的重點是規範個人的清潔衛生，勸告父老鄉親消滅瘧疾傳播媒介瘧蚊，撲滅蚊蟲蒼蠅、清除清水、毛廁內的孑孓、不要喝生冷的水或未煮沸的水等等。在這些規範中，除了飲水、消滅蚊蠅與霍亂、瘧疾有關以外，更多的是泛泛而論的個人清潔衛生，譬如不要隨地吐痰、每日刷牙以及常常洗澡洗手等等。<sup>6</sup>在「衛生現代性」的背景之下，這些關於個人清潔的規訓並不是針對某種特定的疾病，而是將精英試圖在日常生活中落實「現代性」的追求。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同鄉會向歙縣村民發放的藥單上，「瘧疾丸、奎寧丸、阿地平」等藥物只是抗瘧藥物。對於霍亂，同鄉會的公告只是勸告鄉民「如患時疫霍亂等症，速送城裡醫院或請醫師診治，「要注射防疫針，可以防止霍亂厲疫」，並沒有實質的行動。這是因為霍亂並沒有特效藥，換言之同鄉會並不具有動員村民注射防疫針的資源。但是，同鄉會的藥單中並不只是西藥，亦有一種叫「痧藥水」的藥物。與奎寧、阿地平不同，「痧藥水」是中藥，清末的醫家通常提到名為「吊腳痧」的瘟疫，「痧藥水」即為治療「痧」的藥物。1951年編纂的霍亂防疫手冊中，提到「我國的痧藥水或十滴水，內含有鴉片酊和樟腦、氯仿、辣椒等，有止吐瀉之功」。<sup>7</sup>清代醫家之「吊腳痧」被現代醫家認為是霍亂，而「痧藥水」在民間社會一直是受歡迎的良藥。在1947年的這場運動會中，「痧藥水」比奎寧、米尼斯更受歡迎。據鄉紳的意見，奎寧、米尼斯等針劑，「治瘧殊有特效，然於診斷用量、消毒等等，護看差誤，反應頗大」，所以鄉紳決定暫緩發放，直至有熟練的診治負責人，再對村民進行注射。<sup>8</sup>所以在同鄉會的藥單上，痧藥水的數量以千計，而奎寧、阿地平只是以百、十計。<sup>9</sup>據此，本文推測，西藥需要有訓

---

角的探索》，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139-156。

<sup>6</sup> 《徽州營閱讀資料》，頁13-15。

<sup>7</sup> 張明編著，《霍亂及其防治》，《防疫手冊》第一輯，北京：健康書店，1951，頁89。

<sup>8</sup> 《徽州營閱讀資料》，頁27-28。

<sup>9</sup> 《徽州營閱讀資料》，頁20。

練的醫生指導用藥，相比之下，痧藥水是村民所熟知的對抗「吊腳痧」的傳統藥物，又有止嘔吐瀉的效果，故而需求最大。這也說明，雖然這場運動會的發動者，上海的歙縣籍人士，試圖向家鄉父老宣傳生物醫學的細菌、衛生、清潔的知識，但是接受方，歙縣的村民，極有可能依然將吐瀉之病視作「發痧」、「吊腳痧」來處理。

總而言之，旅滬歙縣同鄉會「撲滅家鄉瘧疾時疫運動會」體現了「衛生現代性」的複雜面相，我們既看到居住於上海的歙縣人士，將細菌、個人衛生等這些「現代性」的知識輸送至家鄉，又看到晚清以來醫學傳統中應對「吊腳痧」的「痧藥水」在「運動會」中最受歡迎。對於徽州鄉村的村民而言，發生於 1947 年的厲疫，以及隨後而來的宣傳、藥物究竟意味著什麼，並不是接受「現代性」生物醫學的知識這麼簡單。如果要深入探討徽州與外界的互動，譬如討論生物醫學的進入，抑或討論當下被旅遊業改寫的地方社會，這些都需要更加細緻的田野調查和文獻搜索。

## No. 23 段志强（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歷史研習營與真實的田野調查之間的相對關係，就如同照片之於風景本身：照片是表面的、靜止的、驚鴻一瞥的，風景則是立體的、流動的、常看常新的。

對於如我這樣幾乎沒有參加過任何田野研究的人來說，本次徽州研習營提供了一個接觸新的研究手段的機會與管道——不僅親身進入若干研究場域之中，而且同從事相關研究的老師和同學朝夕相處十多天，這其中所獲的教益是很寶貴的。不過在田野手段風頭日盛、其對於歷史學的價值日益得到肯定的今天，我想亦應對田野調查的局限性保持清醒，因為只有意識到它的不足，才有可能推動它繼續前進。

我們所面對的世界，是一個加速改變的時代，而且這種改變，并不呈單一的線性方向。儘管有變化才有歷史學的用武之地，但對傳統的歷史學研究來說，它所處理的往往是已經過去了的事實、已經完成了的故事、以及已經寫定了的材料。假如我們習慣了這樣的研究對象，而對田野調查的內容產生同樣的預期，那就可能會有圓鑿方柄的危險。

即如此次研習營所到的地方，已成世界文化遺產的宏村當然早已經過重重整修，就是看上去面貌較為原始的萬安老街和汪口，其實也同樣是新舊雜陳、莫可辨識。雖然我們所看到的真實古物也確實不少，但古物、古跡本是互相關聯的整體，格局的改變、位置的移動、與之相關的其他古物的消失或變化，都足以使古物的意涵產生巨大的不同。倘若以為這就是真實的歷史，尤其是因為材料由田野調查而來就對之具有堅強的學術自信，很可能會掉進歷史本身布下的陷阱。

上述淺顯的道理，從事田野工作的史學同仁當然認識更深刻、體會更親切。這是此次研習營給我的觀感。在這種情勢下從事田野，就如同在佈滿地雷的曠野尋覓寶藏，既需要大膽探索，又必須小心求證，所要做的史料批評與考證，恐怕比依賴文獻資料的歷史學要來得更繁重、更複雜。

談到田野方法，不免會讓人想起中國史學的宗師司馬遷，他的史學記述中有很大的比重就來源於採訪與調查。儘管與今日的史學眼光相較，司馬遷較少關注社會下層與實際生活狀況，但他的例子至少說明，田野調查本身就是史學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司馬遷所調查的，有古史，也有近史，但以近史為多，這也是田野方法的天然適用性所在：從中可得的對現代社會的認識，總會多於對久遠歷史的瞭解。可是隨著當代史在史學領域中的式微，史學工作者開始變得“厚古薄今”，即使是在最適於研究現代的田野領域，也未例外。

徽州的輝煌時代是在明清，所以徽州學學者的研究領域也大多集中于明清，下及民國時代的人已經不多，研究 1949 年以後歷史的就更少。因為關注的目光多在古代，自然會對於現代化進程加之於古物古跡的破壞痛心疾首，至少也是徒喚奈何，而那些發生在近些年的變化、消亡或新生，往往會被史學研究者視作干擾，判定為負面的、需要剝離的因素。

問題在於，歷史是連續的，並不存在一個定型的「傳統」，同樣也不存在專事破壞傳統的「現代」。從歷史出發，可以深化對於現代的認識，而對現代的觀察，又可以增進我們對過去的理解。近幾十年來徽州歷史進程中所發生種種故事，同樣也可以是歷史研究的絕好材料。

對這種材料視而不見乃至去之唯恐不快，在我看來，是歷史學的自我設限所致。大部份的歷史學者樂於處理已經過去了的歷史，不大願意觸碰正在發生的歷史，認為那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領域，而將這塊資源拱手讓人。西方的同行似乎就做的更好一些，經常會有研究近代乃至研究明清的學者，將研究的範圍拓展到共產中國，這固然由西方中國學的特殊學術背景所造成，但也說明歷史學要想達致說明歷史如何變成今天的樣子這個目標，就必須認真面對最近才發生的故事。

今日徽州與明清徽州大大不同，這種今昔之異的差距之大，並不輸于上海、廣州乃至香港這種聲名顯赫的地區。如果徽州學研究的主要精力仍放在古徽州為何如此精彩，而不是今天的徽州從何而來又如何而來上面，那麼這種史學研究就很可能變成歷史學家對過去的追慕與慨歎，變成日漸氾濫的對歷史的鄉愁，而喪

失掉它對現實的意義和價值。

其實田野調查的本身，也在改變著田野調查的對象。最明顯的例子是，徽州古村落的發現，就是古建築學者田野調查的結果，而後面所有的開發、發展，當然都必須以古村落的發現為前提。若干年後的學術史，一定會把今天的田野調查與徽州當地社會變遷當作一個好題目，那麼我們作為身在其中的人反而不此之圖，只把徽州看成是歷史的化石，就像入了寶山卻只撿回一些可疑的石頭，不是有點太可惜了嗎？

## No. 24 李仁淵（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研究所博士生）

本次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對我而言最大的衝擊是在各位導師的引介之下首次見識了徽州文書的豐富多樣，並且得有機會親到徽州現場考察。為集中焦點，此簡短心得僅集中在本次研習營對徽州文書的體驗，其他恕略。

歷史研究的課題與深度常跟隨著新史料的發掘運用，就中國明清史來說，清宮檔案與徽州文書或可視作二十世紀中以來開啓官方檔案與民間文獻兩條路徑的關鍵，從而更深入地發掘各種檔案與文獻以為歷史研究的基礎，展開對明清政治組織、社會結構與經濟發展的探索。徽州文書從二十世紀中葉就開始受到注目，持續地有學者投入收集、出版與研究，在各種民間文獻中發掘最早、數量也最多。從七八零年代對社會經濟史的興趣開始，徽州文書便被用來研究中國商業發展與地主制度等主流課題，隨後又用以探究如宗族組織、鄉規民約、賦役里甲等諸多地域社會的相關問題，而近來則更加入了從法律文化、宗教信仰、日常生活等新興文化史方向的探索。

這一系列發展一方面是由於歷來史學研究走向的變化，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徽州文書豐富多樣的特色，隨著研究視野的轉換，不同類型的文獻受到重視，文獻的不同面相也被挖掘出來。在方志與文集的基礎之外，從早期最受注目的契約文書，到族譜、碑刻與官方簿冊執照，乃至近來逐漸受到更多重視的訴訟文書、宗教文書、日用類書、個人日記與書信等等。而對文獻的運用也從最初用來歸結出普遍性的通則、到重視與地方社會脈絡與歷史時段的連結，而最近亦有對文書性質與文書製作的初步探索。對不同類型文書的運用、與對文書不同的運用方式層累交疊，讓這些基於來自同樣地域而被集結的文書得以展現不同的歷史面相。

本次的課程安排集結了對不同主題專精的學者，而也依其主題帶來不同類型的文書。唐力行教授以檔案文書討論徽商同鄉組織，范金民教授主要則以文集介紹徽商與江南文化。常建華教授討論徽州宗族組織運用了文集與族譜，卞利教授

討論的徽州村規民約主要則來自族譜、契約與碑刻資料。阿風教授以徽州訴訟文書討論明代審判制度，勞格文教授則介紹了田野中收集的宗教科儀文書。王振忠教授對徽州文書的整體性介紹除上述種類外又補充了包括帳冊、個人日記與記事等不同文書。藉由諸位教授的引介，徽州文書之豐富種類與各文書相關的研究成果得以在幾天的課程內呈現。

種類如此豐富、數量如此旁大的徽州文書給了歷史學者很好的機會，同時也賦予強大的挑戰，其構成的世界可能是寶窟，亦有可能是迷宮。對一個民間文書的入門者來說，我所體會到的第一個挑戰是對於「精讀」的回歸。囿於文書數量之龐大，容易將文書視為是擷取片面資訊的材料，而忽略了對個別文書的深入閱讀。個別文書在其時空背景下所包含的資訊可能涉及特定的典章制度、習俗成規、組織結構與文化概念，需要著力探究解讀，以瞭解此文書的歷史意義。這樣的工作不僅需要各種一般性與地方性的知識，也需要對文書類型與文書的製作構成有一定之瞭解。雖然花費甚多心力，但也可藉由解讀過程增進對歷史之瞭解。

其次是不同民間文書之整合研究。文書作為研究的材料，但不是研究的目的。深入探索特定文書可以反映部份歷史樣貌，然而進一步的研究則需要回歸到文書製作與使用的社群，從具體的人群、地域與時間出發，探索整體的歷史問題。然而這樣的方向首先遭受到的問題是許多徽州文書在收集的過程中已被拆散，而同地同戶的文書可能分別收藏在不同單位。近來各單位對所藏文書的出版公開（特別是歸戶文書的出版）可解決部份問題，但仍需各收藏單位的進一步交流合作，以建制總體目錄或資料庫的方式來連結文書與所屬社群。

與之同樣重要的是以人群為中心，整合不同類型的文書。以往對單一類型文書的深入研究分別梳理地域社會的不同層面，亦加深我們對各種文書類型的理解。但隨著各種文書類型的發掘與利用，或者下一步可做的是從文書涉及的人群出發，從不同類型之文書的交會參照、互為補充，找尋更具整體性的觀點。畢竟同一群人在面對社會不同問題、為了不同目的使用各種文書，但生活在特定的

時空與社會結構之下，這些文書所反映的歷史情境必然有所連續。例如以地域社會中各群體之結合為焦點，官方賦役簿冊、宗族內部的族譜與祭祀文書、涉及公眾事務協商規範的碑刻、約定財產交換的契約、形構儀式聯盟或信仰圈的宗教文書等等，都展現不同層次、不同情境下的群體結合。各文書反映之各層面的交疊或矛盾之處，或許可以成為連結同一群體之不同層面的關鍵，讓我們對地域社會可有更全面的觀察。

最後一項挑戰則是跨區域的比較。在徽州文書之後，在其他地域亦有對民間文書的發掘與研究，其盛者如江南、珠江三角洲、福建沿海與山區等等。這些地方民間文書的豐富程度雖仍不足與徽州相比，但亦也累積相當的成果。以往許多對地域社會與文化的研究常常在強調該地的獨特性，然而跨區域比較的要點之一則在發掘不同地域之間的共性。類屬同樣範疇的現象在不同地域之內如何具體的實踐、如何透過相同或相異的文書表達。從這樣的比較研究當中找尋維繫社會運作的通則，以及其因地制宜的變異，方望能將斷片的地域研究提升到整體性的概念與模式。當然，可以想見的難處是從眾多且常不連續的地方文獻中梳理出一地社會結構已至為困難，進一步的比較研究需要更長時間的努力。

本次研習營在徽州文書部份給我的收穫之一是更清楚體會到來自民間文獻三個層次的挑戰：文書本身的深入解讀、地域文書的連結整合與跨地域的文書比較。這些挑戰或許十分艱鉅，但也為如我之明清史的入門者樹立了目標。

## No. 25 李义琼（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成爲博士生這兩年以來，我一直被田野「誘惑」著。一是因爲身邊的同學都深受「歷史人類學」的影響，經常去做田野。而我，竟是很明白和讚賞他們的初衷，方法和旨趣的。二是因爲我做明代財政制度研究（雖然老師一再告誡我不要畫地爲牢，把自己的視野和研究搞得僵化，但目前我確實是以此爲切口，去看整個經濟、社會的），不能說它跟田野無關，但目前它確實更依賴於已有的出版物。於是，圖書館成了我經常駐足之地，而田野成了一個在我心中的東西。

終於有了機會親近歷史現場。因爲我想做明代中央的庫藏研究，而有個叫承運庫的，它貯藏絲絹，而這個絲絹稅，不管是何種名目，如人丁絲絹、夏稅絲絹、農桑絲絹、租絲等，大宗的供應地主要是浙江和南直隸。於是就想知道這些地方產不產蠶絲，產多少，交多少，以什麼形式（絲、絹、銀）、方式（民解、官解）繳納？有沒有出現過於此相關的人物、事件？因爲只有這樣，我的中央庫藏的研究才不會局限在所謂的中央，也不只跟庫藏有關，也不會是靜態的制度研究。我很開心地追到了記載隆萬時期徽州府發生的，涉及到朝廷和地方，有各個階層參與的，與絲絹稅收有關的大事件——《絲絹全書》。爲了更好地理解文本，我覺得去一趟徽州很有必要。於是，帶著這樣的發點和動機，我來到了「徽州研習營」。

在研習班上，勞格文教授做了一個關於婺源的道士如何做儀式的報告，終了他說我不輕易下結論，我主要是做田野和把這個過程講出來，日積月累，自然會有結論出來的（這是我的理解，如果有偏差，自然由我負責）。鄭振滿教授講了他的歷史人類學研究緣起，過程，成果，學術理念等。他的研究令我們看到了福建進入「中國」的時代是在宋代，這與廣東在明代進入「中國」是不一致的。這樣的研究是有結論的，這與人類學家勞格文教授的研究似乎不同。這樣的不同的，在我身邊的學長身上也有發生。同是歷史人類學方向的博士生，都要做田野，一位是學人類學出身的，另一位是學歷史學出身的，他們的研究也呈現出過程敘述和問題研究的不同，然而，他們都得到認可，完成學業。

當我以一個他者的身份出現在復旦大學光華樓時，我好奇地把班上的學員和老師都當成了田野的對象。然而，不懂田野，也不怎麼具備技巧的我，充其量只是一個觀察者，而且，是相對安靜的那種。我比較安靜的原因，除了性格因素外，還有知識儲備和發言習慣的不同。說實話，這次我想走出書齋，多方位瞭解徽州的目的，基本達到了。因為領域各異的老師們的講授、和同學們的討論確實讓我學到很多，尤其是小組討論時，李仁淵學長淵博的知識，解讀史料的能力和出眾的口才讓我十分佩服，同時也感歎自己要努力的還很多。通過王鴻泰老師，游逸飛學長的介紹，我找到了目前台灣做明代財政史的兩位年輕的同行。見到王紹欣學姐，趙思淵、黃忠鑫學長，也讓我覺得明清財政賦役的研究道路上，我並不孤單。我想我也成了他人的田野調查對象。台灣學員李天祥老師對我的「土家族」身份挺感興趣的，於是有了有一次相約飯堂的訪談。

在復旦大學集中上完課之後，我們前往徽州地區考察。白天考察，晚上討論。在時間極為有限的田野體驗中，印象深刻的便是鄭振滿老師指著休寧萬安老街上嘉慶二十一年的修建船埠路亭的捐資碑刻，以及大清光緒二年復辦水龍碑志，告訴我們要注意自發的民間力量在地方社會的重要性。而碑刻上的民間力量，有商號，祠堂名，個人姓名等，由此大概可知當時活躍在地方社會的組織形式。

去參加研習班之前，我本打算自己多讀點跟徽州研究相關的論著，有備而去。怎知研究生院弄了一個為期一月的服務基層社會的服務型學習課程，我受到系裡老師的邀請，本著想去粵東北鄉下看圍龍屋，住老鄉家裡，做口述史，一圓自己的田野夢，就答應了。那的確是農業社會的條件，我無法上網，也不知道網上已經傳了各位老師的授課資料。準備不充分是我在田野里有點迷失，不能當即發現問題的主要原因，這點以後要特別注意。

好在我拍了照片，可以細細回味，但也只是看完照片，發表一下感想，未能深入思考和研究。在黟縣宏村的祠堂樂敘堂里，其正面掛的是顯祖、一世祖和宏村雷崗始遷祖的畫像和傳記，讓人奇怪的是側面並排懸掛著一位充滿傳奇色彩的

女性胡重的畫像和文字介紹，畫像上方還有一塊書有「大明永樂山西運量主簿汪公思齊夫人胡重 巾幗丈夫 皇明萬曆拾年己酉立」(從右至左)，同時其夫汪辛(即汪思齊)的牌位也在祠堂，但沒有這樣的殊榮。畫像上的文字介紹為「七十六世汪辛公子思齊夫人胡重傳略 胡重又稱胡重娘黟邑新政鄉西遞朝禮公第三女明洪武己未(1379)年九月二十四日午時生景泰甲戌(1454)歿享年七十有五因辛以頃稅征才驛書召其山西糧道任職二十餘年一切家政族政由夫人董理孺人携家房弟兄同心協力遵祖志籌集各方資財展開引水進村工程掘開水圳月沼建造广裡門家祠樂敘堂辛公卸任返里嘆服稱重娘為巾幗丈夫除此族政撫育兩個幼子同時照管叔家六個子女成家立業實屬難得」(從右至左)。祠堂兩邊分別懸掛著本祠名人的傳略，包括胡重和汪辛在內。不過，關於汪辛的傳略，「便大胆將宗族、家族一应事務，交予德才兼备的妻子胡重酌情处理。这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确实需要具备一定的胆识方能有此作为…」顯然，這段用簡體寫的，還用了「封建社會」這個概念的傳略，應該是很晚近的事情。那麼問題就出來了，如果胡重是洪武到景泰時期的人，褒揚她為巾幗丈夫的牌匾是萬曆時期出現的，祠堂上的傳略又是晚近才製作的，那麼跨越了那麼多而長的時段的這些信息共時性地呈現在現在所見的汪氏祠堂里時，我們如何去分辨背後的信息呢？比對地方志的記載應該不失為尋找信息的一個路徑。查閱「中國方志庫」，光緒《重修安徽通志》卷一百五十二和二百六十二分別記載了汪辛和胡重的信息。稍有出入的是，胡重的姓名並未正式出現，而且其父之名為胡朝禮而非胡禮朝。

夜深人靜，埋首論文的時候，又想起研習班上的史甄陶老師，她不僅關心我的學業，還關心我的生活。我一定會跟她分享我畢業和工作的喜訊的。還有一直聯絡著的李侃，一起加油哦！

感謝徽州研習營，讓我成為它的觀察者和參與者，有了一次印象深刻的田野體驗。

## No. 26 史甄陶（中研院文哲所博士後）

### 土地與思想——參與「徽州文化研習營」有感

此次的徽州文化研習營，的確是一趟豐盛之旅，讓我對於研究的材料和研究的方法，都有一種不同與以往的看法。我的研究方向是朱子學和經學，具體的研究主題是元代徽州朱子學，常置於手邊的書籍，主要是經典文獻以及作者文集，關注的問題也大多集中於儒家思想內部的討論，以及社會菁英階層的活動。但是此次的徽州文化研習營，將我的視角拉向社會文化史，聆聽到許多老師對於徽州民間社會的觀察和探討，同時也接觸到更多的民間文書等資料，真是大開眼界，體會到不同與以往所理解的「徽州」。

這樣「徽州」與過去有何不同？首先是對「徽州」的範圍。以往我關注的地域，就只是徽州當地的情形。但是研習營一開始，葛兆光教授就提到，不能只把「徽州」當成一個地方，徽州人跑到上海、北京等地，要去思考徽州與超出徽州的聯繫。也就是說，不能把區域當成區域，而是從宗教、商業、婚姻等問題入手，探討超越區域的區域史，要想到更大的問題。而這樣的討論，也就在唐力行教授的演講中，充分展現。唐教授提出大徽州與小徽州的概念，主要思考徽州地區與徽州人的移民地區之關聯性。他具體地從上海的徽州同鄉會著手，考察近代所興起的同鄉會組織的歷史演變，不僅展現了徽州人在上海的活動方式，同時也藉由同鄉會的興衰，反映出整個大時代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等變化。雖然唐教授對於同鄉會的建構，會出現把規章資料當成歷史實際情況的混淆，但在演講中，可以聽見唐教授將個人對時局的感慨，寄寓於研究對象中的低音，實在令人動容。

其次，研習營給我的另一種見識，就是文書資料的部分。雖然所謂「文書」的範圍到底該如何界定，仍然有討論的空間，但是在上課時，教授們所提供的訊息，真是讓人大開眼界。王振忠教授的演講，正是最重要的展現。他首先說明為什麼徽州出現大量文書資料？我以前始終感到困惑，這次在王教授的講說中，得

到了一個可以接受的說法。同時他也提到近代徽州文書之所以能被發現的歷史，這點相當重要，不僅看見資料進入學者的思考世界的原因，同時也看見大陸學界研究方向的特色。此外，王教授也向學員們展示了各種琳琅滿目的文書，涉及地方事務範圍之廣，超過我的想像。這些文書正說明了民間社會豐富的歷史面貌，凸顯社會文化史研究主題的多元性。與此同時，阿風教授對於明代訴訟的研究，就是對於文書資料最具體、最精彩的利用。從楊干寺的產權爭議中，可以看見徽州地方社會從宋到明的風俗文化、宗教思維以至到經濟活動的轉變。這些文書資料的價值，實在不容小覷。

第三，關於研究方法，鄭振滿教授所提出的民間歷史文獻學，就更加的有趣。對我而言，最關鍵的問題不僅在於如何發現新的史料，並且，新史料的出現，也正預示著新的思考脈絡的提出。鄭教授從自己的學思歷程開始談起，首先是如何找研究題目的問題。他說：「老百姓現在還在用的，就是重要的歷史問題。」這對於長期在故紙堆裡打轉的我而言，真不啻為一個當頭棒喝。同時他也告訴我們，要回現場去讀文獻，而且要從當地人的立場去理解。這充分說明了田野考察的必要性，讓我對研習營後段的田野活動，抓到了具體的觀察焦點。

然而，回到自己的研究方向上，這次的研習營對於我長期關注思想文化史的研究，究竟有什麼幫助？祝平一教授的演講，激發我更多的思考。祝教授提出一個重要的議題：「省思新安思想史的可能性」。「可能性」這三個字，除了說出「可能」之外，也說出了「不可能」。所以這句話變成問句，應該是說「有沒有可能建構出新安思想史？」雖然祝教授認為，新安思想史在近代之所以被提出，是因為受到明末《學案》體例，以及梁啟超的影響。然而，我們也不可忽視，除了上述具有普遍影響力的著作以及學者之外，歷代地方文人為了建構地方認同，自然也會提出地方思想傳統的脈絡，例如元代就出現的「金華四先生」的說法、明代程瞳所著的《新安學繫錄》、清代李清馥纂寫的《閩中理學淵源錄》等等，與其質疑地方思想史成立的條件，不如正視這個問題，其實是各代學者反省過的歷史事實，然而要問的是，為什麼我們在這個時候，仍然需要討論「地方思想史」？

我認爲這個議題之所以必要，是因爲可以解消哲學討論的盲點，如果要打破過去從普遍性與超越性看待「思想」的角度，除了由歷史的視野探討思想演變的歷程，同時也該關注空間差異，以呈現各地風土對思想所造成的影響，才能更貼近思想產生的歷史脈絡。說得更偏激一點，台灣文學家葉石濤先生曾說：「沒有土地，哪有文學？」置換到思想史的研究上，這樣的反省也是不可或缺。

此次研習營除了在復旦大學上課之外，到徽州地區的田野考察，也讓我感受深刻。特別是到婺源清華，那是我主要研究對象—胡一桂—的家鄉。在那裏，我看見山勢，看見水路，看見小鎮風光，才了解爲什麼胡一桂在宋末元初之際，仍然有條件繼續發揚朱子學，能三次到武夷山拜訪熊禾。反覆咀嚼過去讀過的的文字，過去想過多少次的問題，彷彿一齣又一齣的戲，在我心中上演。

總之，這次的徽州文化研習營，帶給我許多新的觸發。然而這一切都是眾人全心付出的成果。感謝主辦單位中研院史語所、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蔣經國基金會和宋慶齡基金會所提供的資源和經費，感謝授課教授們精彩的演講，感謝同行的學員們彼此的腦力激盪，感謝工作人員的辛勞。這次的研習營帶給我新的視角，相信會伴隨著我的思考，在適當的時候跳出來，成爲我研究的重要資源。

## No. 27 涂豐恩（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博士生）

十多天的營隊，有講座，有小組討論，也有實地考察，值得記錄之處甚多。過程中所接觸的許多想法、材料，也都讓人咀嚼再三，一時之間亦難以說盡。在此我想集中在印象特別深刻的幾個部份。

首先是演講。鄭振滿老師富有感染力的演講，雖然並未鎖定在徽州一地，但卻以個人的經驗和視野，為整個營隊的主題－田野與文獻的結合－提供了極佳的說明，同時也提供了一條線索，串起其他精采的專題。他提到的一個概念，對我尤有啟發。他說，他想觀察一個社會中，怎麼樣的行動不會引人側目，換言之，哪些事情是被當成理所當然。這個說法看似直白，一點也不花俏，但正因為如此，幫助了我重新思考自己的研究課題和取徑。我向對不同文化的差異及其歷史意義感到好奇，但對於什麼是「文化」，又該如何研究，卻也時常感到困惑。上述以微觀人際互動出發的視角，似乎可以成為極佳的思考基點。鄭老師另外也提到，他研究的是人群如何組織起來做事情。關於這一點，唐力行老師關於近代徽商同鄉組織的綿密研究，卞利教授對於村規民約的介紹，以及常建華對宗族組織形成的考察，似乎都不約而同地呼應著。或許這也是當前地域社會史的核心課題。

其次是資料。本次營隊在閱讀材料外，還準備了三冊的資料集。其中所包含的材料，雖然主題各不相同，性質也迭有差異，但是都極為有趣。在資料集的第三冊中，我們不僅讀到族譜、地方志等地方研究中經常用的材料，同時也見到諸如武術抄本、進香謄清、簽書等珍貴的資料，可謂大開眼界。我由於曾接觸過一小部分徽州研究，稍知該地蘊藏民間文獻之多樣與豐富，但看了本次的資料及，加上王振忠老師演講中全面性地介紹，仍不免要感到驚訝。材料是歷史研究的根本，而數量如此龐大的徽州文獻，無疑會讓徽州研究充滿著生命力。

卞利教授所提供的鄉規民約等資料，更是有意思。鄉規民約看似規範性的文獻，卻在無意中讓我們窺見許多社會生活的情貌。如萬曆休寧茗州吳氏宗族家規，其中活靈活現地描述著：「吾族自條約不明，諸坐立趨蹌之節置之不講，有

父立而子坐、兄后而弟先、伯叔疾而侄隨相與狎，習以為恆常，以為當然，頗不知怪。……諸垂髫幼者，見一事則攘臂越前，坦裼環視，雖賓客在前，按臂拍肩，不知趨揖，不知讓避，不依不袴，不鞋不襪，露體環擁，豈成冠冕之族？」另外又提到當時的族婦「往往有不肯整飾裳裙，閑嬉堂前、沿坐間路，以致男尊長不能取道來往者，甚至以狂言牴觸族之尊長者。」這些記載容或有誇大之處，但借用攝影的術語，他們宛如一張張的負片，我們從中可以看到的，不是宗族家規企圖描繪的規範井然，卻是個秩序撩亂的世界。

關於實地考察，首先值得一提的，或許不是到了哪裡看了什麼，而是在不同地點移動的經驗本身。在二十一世紀的我們，有著公路，有遊覽車。即便如此，要從這個村落到那個村落，仍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不免要想，過去的徽商與徽人如何移動，他們在移動中感受到了什麼。徽州據說有「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的諺語。可是往外一丟豈是簡單之事，移動從來就不是容易的事情，其中應該有著更多複雜的曲折和迷人的細節。由此而來的問題，是在這樣一個交通相對不便的時代，訊息，包括思想與知識，如何流通，這或多或少指向祝平一老師的提問：地域思想史該如何書寫？我在綜合討論時想到「在村蘭學」的取徑，或許可以成為參照的對象。從地方出發，但不限於地方，或有可能描繪不同的思想史或知識史的圖景。同時，我們也可以探問政府權力，無論是有形的機構組織，或是無形的意識型態、符號象徵，如何進入（或無法進入）這塊土地。

實地考察中所見到的許多景象，難以一一細數。我個人最興奮的是得以一探齊雲山。這座道教聖山繁複的宗教傳統及其近代變遷，似乎還有待書寫。齊雲山上有孫思邈的像，也有皇帝求子的傳說，宗教的底蘊似乎人們對生老病死的認知有著即為深刻的聯繫。另一方面，我們在地方上也見到專治蛇毒的診所（其中還有不少病患，可見這是個活著的傳統，可惜當時未能見到醫生），賣草藥的小販，如果再結合唐力行老師講義所附的防瘡運動會與衛生宣傳等材料，從這些文獻與田野的結合，是不是有可能開始譜寫一段從地方出發的醫療史？

## No. 28 王士銘（新竹清華大學歷史所博士生）

去年盛夏，聽聞參與「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學員們豐碩的學習成果，促成我報名這次研習活動之動機。我很幸運地被錄取參加為期十日的行程，行程中認識了新朋友，也開啓了新視野。

這次研習活動最大的特色是白日上課考察，晚上討論功課。參與研習過程中，主辦單位之一，上海復旦大學邀請唐力行、王振忠、卞利、阿風、范金民、常建華、鄭培凱、徐澄淇、龔書章、祝平一、勞格文等老師講授徽州宗族、商業、文化、建築、藝術、思想、宗教等課題，引領我們從不同角度觀察徽州。徽州，山多田少，人群多往外謀生；明清食鹽專賣制度，造就徽商致富，加諸在糧食、布匹、茶葉、木材、絲綢、紙、墨、瓷器等方面的經營，成為當代最有勢力的商人團體。徽商求富之外也求貴，文化方面著力甚深。例如：《揚州畫舫錄》記載，徽商在私家園林內舉辦詩社，以文會友盛況。徽商以雄厚財力，贊助揚州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蓬勃發展。

除此之外，課程亦涉及戲曲、圖像等課題，引起學友們熱烈討論。戲曲，可說是古代的文化創業產業。事業有成的徽商大多會在家中聘請戲班，表演與創作戲劇。湯顯祖是江西臨川人，雖不為徽州人，但他創作戲曲是徽商有關係。例如：湯顯祖最著名的劇本《牡丹亭》在晚明時代蔚為風潮。我們在鄭培凱老師解說下閱讀《邯鄲記》、《紫釵記》劇本選文，細細品味湯氏刻畫女性堅貞情意的形象。經過討論，我們重新詮釋這些故事，屏除學術分析不談，這些故事猶如現代電視連續劇，男女交織的愛恨情仇，例如：《牡丹亭》、《邯鄲記》等故事比擬「現代穿越劇」精彩絕倫，有神怪，有獵奇，縱使橋段誇張，仍廣受人們喜愛。

在上海復旦大學學習五天，後五日再到徽州考察，腦海中不時回想我認識徽州，到底是文本的徽州，還是實地的徽州。現在的徽州已不像是過去那樣交通困難，觀光產業很發達，例如：我們駐足五日的黃山市，古稱徽州府，匯聚了許多

觀光飯店、特色餐館，即可知曉一二。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在徽州考察期間，我們品嚐許多醃菜類的徽州菜餚，風味獨特，從飲食中約略領會了古代徽州缺乏資源的處境。從道教名山：齊雲山往下一望，徽州的地形地貌一覽無遺，雲彩婆娑，山麓河流與山底下的徽派建築聚落，融為一體，好似一幅山水畫。山水畫，畫家一步一腳印望山觀水，在腦海中構築出奇艷怪麗，人與自然融為一體，讓觀畫者猶如身歷其境一般，著實有趣。

宗教信仰是代表背後人群的行為模式、社會網絡、經濟關係，例如：閱讀研習教材：齊雲山作醮科儀文本，稍微了解齊雲山道教與民眾的關係。但除齊雲山外，或許行程安排考量之故，在既有的考察地點，少見社稷厲壇之類的民間信仰。聽隨行學友說，徽州地區因理學教化興盛濃厚，民間信仰難有立足之地，但我認為它可能被包裝、改變融入當地社會，而我們這些外人不自知，留待來日再探訪了。

山多田少是徽州的特色，親身實地考察，不難體會這裡的人群需往外謀生，例如：將茶葉、木材往外輸出，賺取財富。徽商在外地事業有成，回到故里，建築家廟、宗祠，光耀門楣。大多數的族譜均強調我族與在地關係淵遠流長，追溯至唐宋時代；但與諸多師友、學友討論，認為大多數宗族編修族譜、收族活動是自明代中期開始，正好也是傳統中國經濟發展較活躍時期，符合徽商發跡之後，回到家鄉，興修祖墳、宗祠的活動有關。光耀門楣，不只是榮耀祖先，更重要的是榮耀自己。位在歙縣鄭村鎮的棠樾牌坊群亦是代表之一，由於徽州年輕男性多出外經商，女性在家侍奉公婆教育子女，成為支撐家庭的半邊天角色，這些牌坊大多是家族子孫功臣名就之後替母親、祖母修建的。母以子貴，朝廷表揚貞潔烈婦行狀，並不表示得替該名命婦出錢立牌坊；牌坊，是家族獲得朝廷准予，自行興修的。因此，立牌坊不止是塑造女性貞潔形象，也是象徵家族人望與財富。

我們在徽州看見非常多的徽派建築，例如：宏村是徽派建築典型，村落的親水特質在我們走過的巷道內表露無遺，水是清澈的，在溝渠中持續流動；溝渠

截水，流貫村落大大小小街坊，無疑表達中國人認為水是財富的象徵，黟縣宏村的汪氏宗祠，著實震撼，由此得知徽商雄厚的財富。水起風生，柳樹成蔭，宏村與遠處山景相映，讓人宛如置身於夢境之中。宏村經拍攝《臥虎藏龍》、申請世界文化遺產之後已成觀光據點，古樸面貌逐漸流失了，非常可惜。宏村內仍住著許多當地人，開設民宿、餐廳、藝品店謀生，到底是他們看中我們的口袋，還是我們羨慕他們祖先身家殷實與留存豐富的文化遺產呢？反倒是考察婺源縣汪口村，那裡還保留一些古意；不經意地，瞧見一行樂師吹奏器樂正在行進某種信仰儀式，著實有趣。

這次行程，白日上課，晚上討論，著實對徽州、徽學又有更多的認識。又，行程之間拍攝不下百張照片，收穫滿滿。行文至此，腦海中仍不斷湧現這趟行程中許多有趣、豐富的故事，期待被寫出來，但礙於篇幅限制，只能作罷。旅程最後一站，杭州，眾人在此拜別；傍晚，一望西湖景色，宜人愜意，夕陽撒在湖面上，美麗地無法言語；乘坐在船夫搖曳船舶上，細細回味這趟豐富的旅程……。

No. 29 吴佩林（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

## 体验徽州文化 做好《南部档案》

### ——徽州学习总结

如今，区域史研究方兴未艾，大陆地区，就有“关中模式”、“华南模式”、“华北模式”之分，“巴蜀文化”、“岭南文化”、“长江文化”之别，但在区域研究中如何不在某一区域画地为牢，却是摆在学界长期思考而终未能得其解的问题。

我所在的地区偏居四川一隅，近十年来以《南部档案》的整理与研究为要务，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如著作2次入选《国家社科成果文库》，并被国家社科规划办列为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等。但常常为跨区域的努力而困扰。而此时由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蒋经国基金会主办，并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承办的“第二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徽州”正在招募学员。徽州学，与敦煌学、藏学，被称为区域研究的三大显学，吸引了一大批海内外学者并做出了一系列不同凡响的成就，若能被吸收，当是今年暑期最大的收获。

幸得王振忠老师以及贵所恩准，我得以参加，收获甚大，列举如下：

一、**所学内容丰富**。徽州作为当年的富庶之地，孕育了徽州文化，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无尽的研究对象。仅就此次授课内容而言，内容涵盖徽学的各个方面，唐力行老师的同乡组织，王振忠老师的徽州文书，卞利老师的乡规民约，常建华老师的宗族，阿风老师的诉讼文书，范金民老师的江南文化，郑培凯老师的“无梦到徽州”，龚书章老师的徽派建筑，祝平一老师的新安思想，劳格文老师的齐云山道教，徐澄琪老师的新安画派，更有郑振满老师的民间文献田野考察所得，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幅徽州文化的盛宴。

除此之外，还有实地体验，如此多的交织，如此多的综合体验，在如此短的时间都得以呈现，怎能不是一场享受？

**二、老师尽心尽职让人感动。**这次活动，最让我感动是每位授课老师，特别是李孝悌、龚书章、王振忠老师，每次都要亲临授课地听课，而且还参加与指导每晚的讨论——这是我以前从未看到过的场景。

更让人感叹的是工作人员金老师他们对每一件事情的处理都尽心尽力。听课期间，还时常看到一位永远充满笑容，时不时坐在门口点名画押，举止文雅的，能让人感到她是在享受这个过程的老师，后来才知道她是张雅芳老师。回到四川后，我经常用这样的例子教育我的学生，让他们乐意与真诚地做好眼前的事情。

黄山期间，我还到高尔夫酒店开了一个“历史人类学的视野、方法”的会议。会议期间，李孝悌老师给我说了一句“会开完后，回到徽州营，参加晚上的讨论”，我也实实在在的体验到他们对工作的尽职。这于我是一个非常值得学习的例子。

**三、师生交流融洽。**时间虽然只有十天，两岸师生却在交流中建立了友谊。回来了，我还得到游逸飞同学的帮助，得到了我需要的资料。我也珍惜着学术过程中建立的友谊。

特别要道歉的是，回到四川后，我都一直忙于《南部档案》的各项工作，以致于张老师三番五次的催促，迟到今天才得以提交心得。

现将我这段时间的工作汇成工作简报，也算是给老师的一个交待。

### No. 30 楊正顯（中研院文哲所院級博士後）

田野與文獻是這次研習營的的兩大重點，從課程內容、師資乃至於田野考察地點，莫不是環繞著這兩個重點設計。因此，在上海的課堂內容，舉凡與徽州歷史、地理與人文相關的文獻，都壓縮在短短五天之內來說明，一方面希望學員們能在短時間內就可以大致瞭解徽州地區的歷史發展，另一方面，也展示現今研究區域史的條件與限制。而大多數的限制，則有賴於田野工作的成果來突破，這也是安排往後五天徽州當地考察的立意之處。

就我參加此研習營的感想來說，大致可分成三部分：

1. 上課的內容十分豐富與實在。原本的所認知的研讀材料是網路上所載的文章，但實際上，授課的師長們個個可說是絕學盡出，使出看家本領，希望學員們能在一兩個鐘頭內，領略徽州地區的文書、宗族、戲曲、繪畫、建築等等的豐富內涵。對於研究明代思想的往來說，無疑地，拓展了廣闊的視野，也加深對這目不暇給的材料背後，事實上，都蘊含豐富多元的歷史脈絡，值得花更多的氣力來深究之。
2. 田野的課程，不同於教室內的講授，主要是學員們試著用自己的五官及手腳，親自浸淫在徽州當地的風土之中，將課堂上的知識與所見、所聞、所問相印證，明瞭相同之處何在？差異又是什麼？又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印象深刻的是徽州地區多山與水道的自然環境，對於曾經通讀過《徽州府志》及其所轄各縣的《縣志》的我來說，跳過或是忽略地方志一開頭〈山川地理志〉，實在是入寶山而空手回的具體表現，因為這地理環境實際上深刻地影響徽州文化的形成。
3. 由於我個性疏懶的關係，平日即很少與學術圈的老師同學交往，拜這次研習營的舉辦，才有機會跟平日仰慕已久或是不太有機會接觸的老師

們交談，親聆教訓，對於理解書本上的知識，有著莫大的助益。而跟幾乎年輕我一輪的學員們交流，也是獲益良多，年輕人畢竟不同，他們見多識廣又主動積極，讓我這個步入中年之人，自嘆弗如。這也是我應該努力效法的。

總的說來，參加研習營的收穫是相當大的。除了以上三點外，別的不說，光是如何形塑問題？解決問題？乃至於引出更重要的問題，是我在這十一天之中，很有感觸的心情。文獻所載的內容，沒有田野工作的配合，常常流於重述某一種固定的說法，但一旦與田野配合來看，往往有出人意表的成果產生，這不僅對徽州研究有用，對於任何一種歷史的探究，都深具實用性與啟發性。職此，在書齋中的讀書人，仍然很需要親自走一遭研究的現地，一定有很多的啟發的。

## 第二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徽州

### 个人总结报告

已故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在《史料论略》第一章讨论“史料之相对的价值”时提到：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官家的记载对民间的记载，本国的记载对外国的记载，近人的记载对远人的记载，不经意的记载对经意的记载，本事对旁涉，直说与隐喻，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料。

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傅斯年又声称：“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在参加“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徽州”的十天时间里，从理论到实践的学习过程，让我对这些问题都有了新的认识（除了“我们不是读书的人”之外）。

### 研习营印象

作为一位普通学员，徽州学研习营丰富的教学和实践活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五天的理论学习，来自两岸三地各位徽学名师的专题讲座，内容涵盖徽学研究的各个方面，比如王振忠老师讲徽州文书，卞利老师讲乡规民约，常建华老师讲宗族的乡约化。每晚 19:00-21:30 的文献精读与讨论，包括师生互动与答疑，讨论气氛之热烈，每每超时到晚十点。所有这些，都让我摒除浮躁的心态，重新回到久违的学习氛围中。训练营负责人王振忠老师还专门邀请“华南学派”的代表学者郑振满教授谈了田野考察的与处理材料的方法。他们“进村找庙，进庙找碑”的操作方式，在华南区域研究方面，成果斐然。在五天的徽州实地考察过程中，老师们身体力行，解读碑刻，介绍地方习俗，这些言传身教，尤为我开拓了学术视野，感受到了古代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而这些，是在个人书斋中无从梦见的。考察所见，有些是书中读到过的，第一次现场见到，得到印证或纠正。

毕竟有些地方性知识，是只有在现场考察中才能发现的。

训练营所发的三大本厚厚的阅读材料，内容丰富，包罗广泛，商业文书、诉讼文书、乡规民约、齐云山道教文献等等。文献精读与讨论，让我们的讨论在老师们的指导下能有的放矢，不至于流于空谈。

印象最深的是，在黄山市住宿宾馆的会议室的分组讨论中，我们小组对于齐云山文献民国二十六年《齐云进香誊清》稿本的解读，展现了多学科多专业结合的优势。以研究经济史的王士铭、研究地方文书的李仁渊为主，大家集思广益，梳理这个齐云山进香的账本的内在线索，理清了“己醮”和“众醮”的区别与不同价格，并在进香者名单中发现了一些女子的名字，这也可说明民国时女子的社会地位。

## 考察收获

作为美术史研究者，经过本次徽州考察，我的关注点有如下几点：

### 一、巴慰祖故居博物馆。

在歙县渔梁古镇老街上发现了巴慰祖故居博物馆。巴慰祖，乾隆时期著名书画篆刻家，长住扬州。如今他的故居被其经商的后人投资建成了故居博物馆。房舍俨然，花园仍在。然展览陈设毫无特色，令人失望。此类故居博物馆的展示与管理问题，似乎是个普遍的问题。但一个地方性的名人，社会影响有限，如何做得有特色的确也是个难题，需要专业策划人士参与包装与策划。

### 二、徽州文书用纸

此行见到徽州文书甚多，徽州艺术博物馆一楼的“徽州与韩国文书交流展”，尤其让人大开眼界。除了文书内容外，我对文书的格式与用纸也很感兴趣。除了一般的白纸或色纸外，有些文书写在特别印制的带有印有图案的纸上。图案内容以戏剧人物为主，偶有花鸟。这些专门印制的带图案的书写纸（时间应属清代），属于徽派版画的研究范围，惜尚未见到过相关研究。以后可多注意搜集这方面的

资料。

### 三、宏村所见门、窗、床木雕板

宏村民居的木雕板，多为清末民初作品，刻工应为来自东阳的刻工，为当时刻工最好的工人。木雕板的艺术手法包括浮雕和透雕，水平参差不齐，题材以戏剧人物最多，借此传达忠孝仁义之类的思想观念。此外包括博古图、花卉图等。博古图最早源自北宋，当时编纂过《宣和博古图》之类的考古著作。至明代中期后更成为文人的一时好尚，出现了很多著作，包括曹昭《格古要录》、文震亨《长物志》等。此种风气，在苏州画家的绘画作品中也有反映，比如《玩古图》、《竹院品古图》等一大批作品。直到晚清，海上画派的画家，如吴昌硕等，仍然有在青铜器拓片上绘图的博古题材。至于博古图题材何时自精英阶层传入民间，从雅到俗，尚待进一步探究。而且此类题材自绘画到木雕的材质转换，也是个有意思的话题。

又，宏村之类古村落的过度开发，恶果已初步显现，不可能逆转。

### 四、歙砚

歙砚唐代就开始出现，用材出自婺源龙尾山，故又名龙尾砚。北宋苏轼有《龙尾砚歌》，明代沈周有《谢程篁墩赠龙尾砚》诗。婺源博物馆有专门的歙砚展示厅，展示的主要是明清砚。砚台的款式多样，样式与铭文都各有特色，尤其以刻有明清著名文人的铭文的砚台而珍贵。而黄山市屯溪老街歙砚商店出售的多为今人制作的歙砚，材质有好坏，手艺有高低，稍好一些的歙砚，其价格已非一般人所敢问津。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作为曾经的四大名砚之一，今日之歙砚作品，是否能脱离简单的旅游商品的特色，使其整体质量更上一层楼，并打造著名品牌呢？不过这需要行业协会出面组织研讨，共同商讨对策了。

### 五、碑刻书法问题

万安老街的墙界、清代消防碑，散落在徽州各处的断碑，齐云山上的各种碑刻、摩崖石刻等。除了碑文内容外，这些明清至民国的碑刻书法，也是值得注意

的专题。当然，这些民间碑刻，多数偏于实用，并非出自名家之手，书法水平自然算不得高超。但碑刻书法是与手写文书不同的另一种实用书体，借此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地方性文化的一个侧面。

## 老师与同行

训练营主持人王振忠老师和李孝悌老师称得上是训练营最辛苦的人，他们安排各项工作议程，并身体力行，自始至终参加了训练营所有活动。有的老师已年近花甲，每天晚上讨论课也坚持到最后，所有这些，都体现出老师们严谨的态度与踏实的学风，令我们深深感动。无论在做人还是在学术上，这些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学习。

金秀英老师和几名工作人员，也体现出了高度的敬业精神。

在提问和讨论环节，很多学员体现出较高的学术素养，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 一点小建议

由于组织的问题，来自海峡两岸不同学校的学员在报到后，互相之间不熟悉，直接影响到了交流效果。直到第5天理论课结束，在晚宴上互相敬酒，才算真正熟悉起来。所以有学员开玩笑地说，如果第一天欢迎宴就提供酒的话，肯定一下子就拉近了距离，交流就顺畅多了。这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但是怎样让学员们报到后尽快地熟悉起来，增进交流，更好地融进讨论团队，这些应该是下一届训练营组织者需要考虑的问题。

## 阅读文献 穿梭田野

有时候，虽然只有短短一段时间的经历，但已足够令我们深深记忆并为之难以忘怀，每每想起亦是陶醉其中。2012年八月份，第二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开幕了，主题围绕美丽多彩的徽州展开，参与的学员是我们这群来自两岸各地的年轻学子们。

为期十几天的活动，却给了我太多冲击。在震撼于这些冲击的同时，我亦欣然接受。不是第一次参加类似的研讨班，但当早中晚都有着明确的行程而且需要大脑不断运转、需要高效阅读吸收大量的文献资料然后进行激烈讨论之时，我感慨于我们自身对于其研究领域的狂热，也感慨寻找到知音时的欣喜。那时候，身体或许是累的，但精神状态却出奇的好，心灵也感到无比的充实。这样的交流学习讨论方式，每一次都让我感受到了其魅力的新奇之处，每一次都是一种学术的洗礼与心灵的盛宴。与大家一起讨论，或许各自所受的学科训练有所差异，因为来自不同的高校甚至是不同的专业，但因为有了丰富的材料，讨论有了平台，思想的火花从此开始碰撞激发出来，且由于不同的训练背景而碰撞得愈加绚烂。

当文献的阅读与讨论暂告一段落后，我们踏入了徽州，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大放异彩的地方。曾经从这里出去的商人、曾经生活在这里的妇女、现在被发现的文书、现在还保留的建筑，这些都是我们有关徽州历史文化印象的关键层面。在研习营的过程中，有时是在课堂听老师讲述的间歇，有时是身处道教名山齐云山之上，有时是到了闻名已久的宏村，我都曾问过自己，我眼中的徽州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与现场体验，我是否能够把握徽州历史文化的脉搏是如何跳动的？当我认真地问着自己并努力尝试去寻找答案时，我被徽州异常丰富的历史文化震撼住了，更徜徉于它的多面性。我反省着自己词汇的缺乏，但聆听了老师们来自各个方面的徽州文化的熏陶，阅读了相关的材料以及参与了

精彩的讨论，甚至是之后的身临其境，包括到达几个典型的徽州聚落，我仍然想到的是厚重感与沧桑感，也有种时间与历史一去不复返之沉重感。愈置身其中，愈发现其奥秘无穷。

那些牌坊，巍然屹立，你见或不见，它们都在那里。去棠樾牌坊群的那天，天气晴朗，太阳普照，光线对比非常强烈，天空的蔚蓝色与稻田的青绿色交相辉映，吸引了我们的同伴驻足留影，也凸现了牌坊的灰色之重。每一座牌坊都蕴含着一个长长的故事。牌坊愈是宏伟壮阔，我内心愈发沉重，其规模或许与牌坊主人的贡献甚至是“牺牲”有着直接的关系。历史的厚重感在这里得到了另一种体现。到达齐云山，看着留在那里的许多碑刻，有的是几个字，有的是长长的一段叙述，我感受到的是人们来此之后的虔诚与对未知的祈祷与祝福。不论是小人物还是精英们，甚至包括明世宗，当面对无法把握的局面时，都向宗教伸出了祈求之手。来到宏村，我曾向往过的地方，虽然人头攒动，但看到月湖，看到村落里留下的水系，还是敬佩人类的生存智慧，在这里自然地理与人类生活得到了有机的融合。每到一地，都有着极大的收获。诸多感受，都刻在了我的脑海中，至今历历在目。

面对着这个世界，从学府里深深浸染的我们，有着太多的想象与揣测，也有着无比的宏图大志。隔着漫长的时间、独特的空间，怀揣着自己的想象，我们去看待生活在这里的人群以及他们创造出来的文化。也许加了很多浪漫的幻想，却是我们真实的表达。

### 錦帶環抱的徽州聚落

每一個文化對於住居形式及其環境的規劃的確各有藍圖。原本單純地出於對徽州建築的好奇而參與，但經過為期兩周的研習，學者們連番精彩的講演編織出了徽州人文山水，讓我開始對徽州民居的好奇也悄悄轉了向，體認到在建築形體論證上打轉的狹義看法，反而失去放諸整體環境與歷史脈絡的視野中。「山峭厲而水清澈，有佳山水在萬山間」，新安江之水帶出徽州青年、帶來杭州商業的餘裕和村里環境改造的機會，母親臍帶般的水文化，在此譜出了千年徽州的田園詩歌；明清以來的徽州聚落，水環境的營造有著獨到之處，它們之間有強烈的依存關係，群山匯流出的水體、聚落、民居之間的發展和交融關係，有如輕靈的詩畫捲軸般更加引人入勝。萬山間的水文這個普遍性特徵，即水環境景觀是如何在百年來逐步影響著徽州聚落和建築，遂成為我此次的觀察重點。

水作為一種運輸的載體，經過歷代營造的水環境以及其衍生出來的社會文化中，徽州先民對於「水」的運用有非常獨到之處。沿溪而建的村落、碼頭、商家與老街的擇址與發展，由課程間短暫地品讀了古今鄉野文獻和現地考察下，有著衝突與妥協歷程的佐證軌跡。走入魚梁村、休寧萬安老街周邊的壩堤、碼頭、橋梁與街道和住屋，甚至通往河灘地的巷道位置，這些水岸生活和介面分野還需透過鄉里的條件限制而分配，產生了形式與規範。歙縣城南的漁梁村，除了沿著水岸老街有機地生長，讓人驚艷者是漁梁壩的構造方法，走近看得青色條石壘砌，每一層運用石鎖（鳩尾樑）交互插入固定，使其成為堅固的整體，140公尺的壩堤橫互著練江，蔚為壯觀。

村落與水岸的關係十分密切，是由於水供給了萬物生息滋養。由於群山匯集的水量豐沛，灌溉工程還必須倚靠優良的水圳設計。首先是稻田灌溉活動能否得當，再者是水力運用考量；常見水流落差處常設有水車及水碓，這組機器需得力於水圳引道的地形設計，若水道淤積或水體力量不足時，水碓就不免有荒廢下場。

聚落水文的開創亦不乏有風水之說。如黟縣宏村之於傳世的牛形風水，先人的遠慮加上風水先生的保證一定主科甲，綿延萬億子孫，千家煙火，于茲肯構——自雷崗山、飲水進村、挖月沼、掘南湖以及鎮四方，均成就了一番風水佳話，但其作用實可以加深鄉民的集體認同，亦提供了重要的精神依據。四百年前溪的西溪洪水爆發的改道，使得雷崗山上的十三間房之下有了河灘地可供生產。七十六世思齊公及孺人胡重，主事引水入村的改造，處理村務和群眾力量，逐漸發展出依西北向東南發展的飲用水道和住居群落，入水口為喇叭狀，並有溢流口以防洪患，水流的速度可輕易帶走汙穢，保持水體淨潔。

宏村水圳精妙之處，在滿足家戶取水的日常便利性。引西溪之水入村、開鑿埤塘，使得幾乎七成以上的住家門前均可以有水圳使用，或近於百步之內便於取水，並早晨八點以前只得挑水飲用、不得清洗髒污的族規。日常飲用、洗滌、緊急時救火，正應了廳內案上「終身平靜」的擺設。至今仍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見到村婦拎著拖把自家門口走出，幾步來到小水圳前，悠然地拾級而下進行清洗，水圳就像是家中庭院的延伸；水圳內設有石步（向下的石階兩階踏步）可供入圳洗滌，甚為方便。我對於古徽派建築技術的高度欽佩，是來自於宗祠和住屋內部天井的地坪處理法均極為講究，四周簷廊下的石板帶有極為輕緩洩水坡度至中央，那代表著對實用和審美觀點的社會高度水平、工匠對排水處理上則有著自信。值得一提的是，宏村住宅多為二進院落，有些人家還將圳水引入宅內，開闢了魚池形成水院、築以庭院水榭；文人雅士之輩的住家期望營造出來的雅緻氣氛，可說是對高居住密度的舒緩，也是來自蘇杭庭園生活影響的投射。

「引水入室掘井家中，防祝融之肆虐，取汲浣之便利，求滾滾之財源，蕩里中之穢氣，灌村外之良田。」《汪公錫文運熙家抄》中表達的，除了儒賈傳世的村落環境營造和灌溉生息的百年大計，水環境與村里的交融產生了靈性，更造就了現今的經典中國聚落和世界文化遺產。有幸參與這次的徽州研習營，提昇了我對聚落水環境的認知，更透過實地參訪、課堂講述及多方討論，一個明清社會史下的水脈和聚落之間，有著更開闊的視野和深刻的感動。

### No. 34 郭忠豪（紐約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爲期十天左右的徽州營隊在學員與師長的道別聲中結束了！回首將近兩週的研習生活，帶給我相當豐富的知識討論與生動有趣的田野考察。我的報告分爲兩個部分，其中以講座內容爲主：第一部份討論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講座收穫，第二部份是徽州田野調查的心得。

在上海復旦大學講座中，第一天王振忠老師的「徽州文書世界」介紹近年來中國各地陸續有各類文書出現，但「徽州文書」內容尤其豐富，其內容包括「村落文書」、「家族文書」、「宗教科儀」、「商業文書」、「訴訟文書」以及「徽商尺牘」等，其中我對「商業文書」內容相當感興趣，特別是親自到過徽州休寧萬安老街與徽商故里後，對徽商在明清時期如何藉由研讀商業知識到江南各地經商尤其興趣。更確切地說：徽商團體內的茶商、墨商、典當商、木商等可能將商業活動的知識留在日記、帳冊或相關文書上，藉此可以進一步追問徽商在商業活動上有哪些資金通融的現象（例如日本學者藤井宏將徽商資本型態分成共同資本、委託資本、婚姻資本、遺產資本、援助資本、官僚資本、與勞動資本等七種），其雇用關係爲何？商人對自己族譜修纂過程中有哪些認同的變化？此外，明清時期徽商的興起帶動傳統中國「士農工商」四民階級的變動是另一項有趣的議題，特別是徽州文壇領袖汪道昆曾提到「良賈何負於鴻儒」此類名言，相當程度說明商人力量在明清時期已經強大，甚至挑戰傳統士大夫的社會地位。<sup>10</sup> 其次，唐立行老師討論「傳統徽商與近代同鄉組織」也頗具啓發性，特別強調徽商宗族研究要注意三點：宗族組織、文化科學與商業經營的良性互動，並提出「小徽州」與「大徽州」的相對概念。唐老師講述的雖然是二十世紀初上海的徽商同鄉會如何運作，例如紳董互動網絡、募捐、慈善事業等。然而事，就自己過去研讀過書籍，徽商在十七、十八世紀的江南城市已相當活躍，例如揚州鄭景廉家族與兒子鄭元

<sup>10</sup> 關於徽州文書相關書籍，可參考王振忠，《徽州社會文化史探微：新發現的 16-20 世紀民間檔案文書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卞利、胡中生主編，《民間文獻與地域中國研究》（合肥：黃山書社，2010）。

嗣、鄭元勛、鄭元化與鄭俠如等，陸續在揚州參與慈善活動、組織宗族、甚至參與政治活動。其實，若從近現代上海徽商組織往前推，我們可以看到徽商在明清時期的社會組織如何運作？以慈善事業為例，根據 Joanna Handlin Smith 與梁其姿兩位學者研究：從十八世紀左右揚州鹽商的慈善事業可以看出，原本在明代屬於個人積極性經營的慈善事業，包括育嬰堂、普濟堂、賑災義倉、義學與書院等，到清代之後逐漸走向「社團化」與「組織化」，其原因可能是雍正皇帝希望藉由收編民間力量來鞏固其政權穩定。

第二天卞利老師講授「明清時期徽州的村規民約與鄉村管理」，以及阿風老師講授「徽州訴訟文書看明代的審判制度」，特別是阿風檢視「訴訟文書」在中國歷史上的變遷過程，並強調明清徽州訴訟過程中地方官員的詳細背景：例如知府、同知、通判、推官與兵備道，上述官職可能隨著明代政治有所變動，但從中可以觀察出徽州里老與地方官職之間的互動關係。就自己讀書經驗：徽州訴訟文書可以與里贊老師研究「晚清四川南部縣」的訴訟文書進行比較，討論在今天被視為「刑法」與「民法」的案件，在清代中國可能僅僅是以「行政事件」方式處理。此外，曾經研讀美國學者 Matthew Sommer 的 *Sex, 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其中一項論點是十八世紀中國司法在性別議題(gender) 歷經從社會身份(social status)轉變到性別身份(gender)的審判方式。換言之，在十八世紀的清代中國，特別是雍正皇帝提倡「節婦觀念」與「家庭倫理」之際，以性別為處分方式的模式擴及到社會下層，許多僕人、寡婦、妓女等均納入審判行列，這些現象在偏遠的徽州山區是否出現？或者國家的行政力量僅止於城市。

第三天范金民、常建華與鄭振滿老師分別從「明清徽商與江南文化」、「徽州宗族」以及「田野與文獻的省思」等講授課程。范金民老師的授課內容相當程度與明清文化與藝術史關注的焦點類似，注意到士商社會界線的模糊、徽商與江南文人之間的互相利用與影響、以及徽商對藝術品的投資與鑑賞。常建華老師提到現在的宗族研究應該關注多面向，可能從思想文化上、可能從認同建構上、也可能從地方社會的秩序重整上著手。常老師的演講使我想起中山大學劉志偉教授曾

經講授如何「理解族譜」：它包括 (1) 家族成員資格的界定，(2) 個人與群體間現實關係的表述，(3) 締結宗族聯盟關係之手段，(4) 定義個人與群體的社會身份地位。換言之，要研究中國的家譜與宗族要注意到不同時代這些文獻反應出的歷史觀點、祖先故事中的敘事結構以及宗族語言的使用。鄭振滿老師以自己多年來的心路歷程反思如何在「歷史人類學」的研究上以靈活的方式處理三個問題：一、歷史學的社會科學化、二、民間文獻的收集與解讀、三、田野調查的經驗與體會。相較於過去歷史研究集中在帝王將相與知識份子，鄭老師的演講強調如何理解底層社會的歷史，並對文書文獻抱持戒心，重新思考國家與地方社會的關係。

第四天由鄭培凱老師與徐澄琪老師分別以「湯顯祖與徽州」與「徽商、徽墨、徽山水：黃山與新安畫派」授課。前者聚焦在明末清初的文人與徽州文人，例如湯顯祖、汪廷訥、潘之恆與公安三袁等之間的互動網絡，強調「情」在明末社會知識份子中的特殊角色。徐澄琪老師授課對我相當啟發，特別是新安畫派弘仁對元末明初文人倪瓚畫風的推崇，讓我想起中國歷史上不同朝代文人之間的相互模仿，例如文徵明學畫時受到蘇東坡影響，董其昌受到元代畫風影響，甚至在飲食文化上，明清文人也受到宋代蘇東坡的「江瑤柱傳」之影響。此外，徐老師提供的讀物中有學者周紹明(Joseph McDermott)的「一座中國山岳的創成」：作者利用「黃山」為主體討論黃山與道教以及黃山與四位畫家（二十世紀的張大千、黃賓虹以及十七世紀的丁雲鵬與弘仁）的複雜關係，尤以弘仁的畫風變遷並以此展現對明朝滅亡的忠誠特別有趣。事實上，從兩位老師的授課內容還可以引出更多有趣的研究議題：徽州商人可能藉由商業資本贊助藝術並利用蘇州文人的文化資本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與文化品味。例如台灣林麗江教授曾研究過新安商人汪廷訥以「環翠堂園景圖」的修建過程展示徽州商人在藝術創作與文化品味上的能動性與主動性。因此，如要理解明清時期的江南文化，我們有必要結合徽州商人（汪廷訥）、蘇州文人（文徵明家族）、南京文人（刻工吳勉學）與揚州鹽商（方士庶等人）等不同地域的文人社群進行研究，從中理解不同團體在文化鑑賞與商業力量上的此消彼長。

最後一天講座由龔書章老師、祝平一老師與勞格文老師分別以「文化地理聚落與合院地景原型」、「江永、戴震與西學」以及「齊雲山與道教」講授精彩課程。龔老師從建築學的角度理解皖南古徽州在「山逼水激的自然環境影響下如何造就出徽派建築，並從中國人在生活形態上原則如「順應自然」、「講究風水」與「空間結構完整」等面向理解徽州建築物，龔老師的授課有助於我們在徽州田野上理解古建築宏村的建築特色。祝老師的授課提出一個有趣的觀點：明清之際的皖南知識份子與當時耶穌會士的關係為何？以及當時天主教如何進到皖南徽州這樣的村落？當然，爲了理解江永何以支持西學，祝老師引導我們理解中國曆法的重要性、中國士人與歐洲傳教士在曆法上的爭議點、以及康熙皇帝提出的「西學中源論」，最後以江永爲例，討論皖南士人對西學的態度。勞格文老師的授課對我們在徽州田野中的齊雲山道教歷史甚有幫助。

當上海復旦大學的五天講座結束時，我們帶著收穫滿滿的知識前往徽州考察。第一站考察「許國牌坊」時，我相當興奮地發現許國與我研究明清「鱗魚文化」有緊密關係，例如許國在明萬曆年間曾經與輔臣申時行、余有丁、王錫爵、王家屏趙志皋、張位等多位大學士獲賞鱗魚，讓我將文本上的人物與田野上的調查緊密結合。此外，宏村的考察反映了龔老師授課的內容，讓我理解皖南徽州在鄉村聚落上呈現的建築知識與生活型態。休寧的萬安老街將我拉回明清時期徽商如何以智慧與毅力前往江南不同地區經商。黃山徽文化博物館與婺源博物館提供相當豐富的地理知識、新安商人研究、徽墨知識、新安畫派畫風、徽州文書等，實實在在地與復旦大學授課的知識相互結合。

曲終人散之際，我要特別感謝中研院史語所、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蔣基金會、宋慶齡基金會以及所有授課老師爲我們帶來的豐富徽州文化之旅。

### No. 35 黃庭頌（臺灣大學中文所博士生）

2012年夏天，是意外更是榮幸，我參加了由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復旦文史學院以及蔣經國基金會合辦的第二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一腳踏入為期十天的悠悠古徽州之旅。我本中文系出身，亦非明清研究者，原本對於徽州的印象，比起各式文書、宗族、民約鄉規，更多的是小橋流水人家，以及如詩如畫的山巒層疊，然而經過為期十天的研習，這幅恍如文人山水的鄉村風景，有了更多屬於人們生活的影子。

研習共計十日，前後分為兩部，前半部在復旦文史學院接受課程指導，負責講演的老師們皆為頂尖學者。通過唐力行老師的講演，了解到徽州宗族及同鄉會的緊密關係；王振忠老師的講演，則讓我們見識許多未曾公開的徽州文書，可謂大飽眼福；卞利老師介紹的鄉約民規，說明徽州宗族與鄉村的制度與自律；阿風老師則從龐大的徽州文書中，檢出訴訟文書部分，梳理一條詳實又嚴密的脈絡，凡此種種，皆令我這個徽州外行大開眼界。原來，詩畫般的鄉村風景背後，有著如此緊密嚴實的人際關係。

此外，徽州文化不僅僅限制於這些依山傍水的小村莊裡，徐澄琪老師介紹的徽山水、徽墨與新安畫派；鄭培凱老師藉由湯顯祖說明徽商與文人之間的交流；龔書章老師提供了看待徽州建築的專業觀點；勞格文老師利用照片，展現仍舊存在於徽州的道教文化。即便授課日程只有五天，但我們仍看到了葛兆光院長開幕致詞所說「大徽州」與「小徽州」的展現。

其後五天，研習營轉移陣地至徽州，使我們有機會親自踏查傳說中的古徽州。從許國牌坊、漁梁霸、齊云山到宏村、萬安老街，此間所踏查之處全是仍在生活的村莊。猶記走訪萬安老街時，在狹小的巷弄內認識了杜騰燕小弟弟，杜小弟全家居住在萬安老街口，下了課後便沿著巷弄找同學玩樂，頓時間，那些印刷於白紙上既陌生又遙遠的鉛字筆墨，終於活生生地展現在眼前，原來，前五日我

們耗費日夜精力談論的徽州，不僅僅是歷史痕跡，而是正在進行的生活。

最後，既然此研習營名爲兩岸交流，必然要談談與大陸同學的交流心得。

分組討論時有幸被編至D組，本組的兩岸學員大概除了自己以外，全爲徽學專家，要不也是對某些課題特別有深入研究的學者，因此每晚的分組討論，對我而言，不如說是多一堂課程的洗禮，來得更加恰當。通過學員之間的討論，也令我認識到一件驚訝的事情，即便兩岸的歷史研究也許各有不同關注焦點，但思考方式與邏輯多半仍是相符；然而中文與歷史之間的相隔，或許比起兩岸更加遙遠、模糊。過去常言「文史不分家」，但是在接受各式西方理論後的歷史與中文系，已擁有了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至於該如何更順利地融合兩者，正是我參加此研習營所面臨的最大課題，也將會是未來恆常至於心中的疑問。

寥寥數語，難以訴盡心中的百感交集，僅能以感謝之心回顧此次研習。感謝李孝悌老師、王鴻泰老師以及祝平一老師一路隨隊照顧學員們，亦感謝王瓊玲老師給予我們這個機會踏查古徽州，更感謝所有參予此行的朋友，因爲有大家，才有此番美好的回憶。

## No. 36 李佩蓁（臺灣大學歷史所博士生）

### 統宗收族——以黟縣弘村汪氏為中心的觀察

本屆研習營考察地為徽州，在課程中得以接觸五花八門的徽州文書，有一般較常見的契約文書、族譜之外，還有日記、帳簿、門簿、訴訟案卷等等，這些文獻提供研究者相當豐富的地方社會生活實況。除了大量的出土文書，徽州各聚落的物質遺存也大致保留下來，如此次考察的休寧萬安老街、黟縣宏村、婺源汪口村，使我們得以觀察明清以降的徽州建築特色和聚落結構。就個人而言，我特別關注徽州的宗族活動。一方面是徽州聚落中保存多個規模極大的宗祠，如本次考察的弘村汪氏宗祠、汪口村俞氏宗祠、棠樾村鮑氏支祠等，是在其他地區較為少見的；另一方面，就閱讀資料來看，徽州留下的族譜相當多，甚至族譜的編纂體例仿照國史有紀、傳。築祠堂、修宗譜在徽州如此盛行，又反映何種地方社會文化？

此次活動考察黟縣弘村，以及閱讀《弘村汪氏家譜》就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個案。我們所見的《弘村汪氏家譜》是乾隆十三年（1748）重修本，從其中收錄的舊譜序，推估汪氏曾有六次修譜行動：宋天禧元年（1021）、宋紹興廿年（1150）、明萬曆卅五年（1607）、清康熙十七年（1678）、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乾隆十三年（1748）。由上述譜序撰作時間來看，弘村汪氏修譜時間上推至北宋天禧年間，更加強我們對弘村汪氏乃千年宗族之印象。

不過，細察諸篇舊譜序，特別是宋天禧元年的仁雅公序，紹興廿年的彥濟公序又存在不少疑點。由於宋代到明萬曆之間的修譜間隔甚久，本身已啓人疑竇，就序文內容來看，又有幾處問題：首先，在仁雅公序文中，提到汪氏為「承黃帝之後，玄囂之苗裔，周文王子，武王弟，周公旦，魯伯禽之後」，但是將族系上推至黃帝，是明中葉以後編修族譜常見的特徵。其次，仁雅公序文又以「越國公汪華」為汪氏顯祖，但「越國公汪華」的說法是元泰定三年（1326）汪松壽編《汪氏淵源錄》時才確立，故北宋天禧年間的序文出現越國公之說便有矛盾。再者，

若以該文中遣詞用字來看，如「螽斯衍慶」此一吉祥話，是明代以後才出現的用語。而紹興年間的彥濟公序也存在類似問題。故宋代的兩篇族譜序文應是由後人撰作，託名宋代而成。

不過，研究民間文獻的學者早已指出明代以來建構族譜世系是常見現象，因此重點除了建構什麼，也在於為何要建構？鄭振滿老師在「民間文獻與田野考察」的演講中提到：為什麼需要建構族譜？很可能出於生存的需要；因為他們必須證明自己在這裡存在的合理性，證明自己有權利在這裡生活。因此，即便證明《弘村汪氏家譜》並非始修於宋代，而是明萬曆年間才修纂，也不代表其建構的宋代序文毫無價值。事實上，這一建構的行動帶來更多值得研究的議題，萬曆年間弘村汪氏修譜之時，究竟面臨哪些問題，使他們必須建構一個上至宋代的族譜來回應此問題？

由於掌握材料有限，本文僅能就研習營中發給的史料做初步分析。必須提醒的是，《弘村汪氏家譜》的宋代序文並非全係憑空捏造，其中仍反應相當的事實基礎，而最重要的就是弘村汪氏的來源。從譜序當中可知，弘村汪氏追溯宋代的仁雅公出身歙縣唐模，遷居黟北祁墅，為遷黟北祖；歷六世後，因遭建炎之亂，居所被焚，故彥濟公又從祁墅遷居雷岡山下的弘村，是為遷弘村祖。另對照我們參觀的弘村「樂敘堂」，即汪氏宗祠，位在弘村月沼北面的正中央，建於明永樂年間。董理建造樂敘堂的汪思齊曾任山西運粟主簿，在其所撰〈樂敘堂記〉，提到弘村汪氏來源：「仁雅公由歙唐模遷黟之北鄉，署名祁墅，居六世，至我彥濟公……宋高宗時，遭張寇兵燹，所居宅三百餘間盡成焦土，始紛紛議遷徙，而我公遂來居此土，僅父子數人耳」。此篇做於永樂年間的序文，也清楚表明汪氏遷黟北、遷弘村的始末，這應是弘村汪氏經口傳數百年之久的說法。有趣的是，為何汪氏在萬曆年間修譜時，企圖建構兩篇宋代的譜序，再將家族譜系推至仁雅公之前？

值得注意的是，具有汪氏譜系「正典」地位的元代汪松壽《汪氏淵源錄》中

並未記載弘村汪氏一系。到了明正德年間，汪奎《重修汪氏家乘》就註明收族的標準為：家有唐宋以來舊譜、共業、先墓，並以汪松壽的《汪氏淵源錄》為依據。細查《重修汪氏家乘》，謹記載六十五世汪仁雅遷黟北，但未提及弘村汪氏，可見弘村汪氏不符合其收族標準。直到嘉靖時，戴廷明、程尚寬等編纂專門記錄徽州大族的《新安名族志》，仍未將弘村汪氏列入。也就是說，自元到明中葉，弘村汪氏都不被視為新安大族汪氏之一脈。萬曆卅一年（1603），弘村的汪邦瑞著手修譜，其為外出至杭州經商（應是鹽業）的汪氏子弟，事業有成後返鄉從事宗族組織活動。從他的修譜行動中，可發現其極力欲將弘村汪氏與新安汪氏拉上關係。第一，在兩篇託名宋代的譜序中，一再強調弘村汪氏有唐代舊譜，但毀於火災，只剩殘篇，表明修譜都是「取舊譜續而輯之」。第二，仿效《汪氏淵源錄》，追認越國公汪華為始祖。汪邦瑞在外地經商，可能對徽商重視宗族網絡的文化有所體認，而且新安汪氏在明代官商界的勢力相當強大，所謂「大江以南，巨族相望，而新安汪氏為冠冕」，故汪邦瑞試圖藉修譜之舉歸入新安汪氏支派。清康熙六年（1667），程以通輯補《新安大族志》為《新安六縣大族志》時，已經黟縣汪氏列於其中，至此弘村汪氏才成功躋身為新安大族汪氏的支脈。

由於徽州留存的豐富民間文獻、物質遺存，讓我們得以藉由弘村汪氏觀察明代以來統宗收族的宗族活動過程。本文只有初步探討，但尚有相關議題值得進一步分析，例如原鄉的宗族活動是否與外地的商業網絡有關等。也感謝營會當中李仁淵、趙思淵、朱開宇等諸位學長提供的意見、論點。通過研習營幫助我學習解讀過去較少接觸的民間文獻，並與其他學友交流，確實是此行最大的收穫。

### No. 37 李天祥（臺灣大學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

這次參加「第二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徽州」，出發前，住在上海的大陸友人在知道我研習營的行程後，笑稱：「不可能這麼緊的啦！」告訴我要找時間出來會面，結果證明在精實的按表操課後，實在難以外出，友人爲之不可思議，但我卻從心底產生了對主辦單位的敬意，這才是面對學術實事求是的精神！

傳統上有「文史不分家」的說法，但其實到了今天的教育與學術環境，文史其實是分了家的，只是文與史之間，還存在著許多重疊與聯繫。由於我的專業是中國文學，對於徽學全然外行，因此對這次研習營的課程其實是相當陌生的，不過，能離開自己一向習慣了的文學領域，進入史學領域涵泳一番，其實是一種醍醐灌頂的享受。首先，史學領域所使用的材料與方法，著實令我大開眼界，以材料而言，以前在研究時所使用的相關史料，其實主要是史書與筆記，故這次研習時，看到研究者對於族譜、村規民約等材料的搜集與使用，都是我從前未曾接觸，令我眼睛爲之一亮的，至於碑刻，在我之前的學術研究中，常只是將碑刻放在文體學的脈絡來看，至於碑刻所具有的史料意義，雖然之前也素知「金石證史」的說法，但也僅只於「聽過」，直到這次活動中，在徽州現場看著史學界的老師們相關講解與演示，真的使這種學術研究方式鮮活地在眼前展現出來。

這次研習營前半段時間在上海復旦大學聽徽學相關演講，後半段時間直接到了徽州現場，這是最真實而直接地體會到學理與現場的結合，當然，後半段在徽州的行程，實在說不上是真正的從事田野調查，但我覺得在短暫的研習營中，這種安排無疑使我眼界大開，認知到親臨現場所能得到新材料及新感受的歷程，而這種學習方式，更激發了我的一種強烈的熱情，有朝一日真應到我海峽兩岸的故鄉——鹿港和石獅市，仔細查訪兩地在宗教、民俗活動等各種同異的承傳關係。

在這次研習營中，所獲得的文化衝擊尤其是我永銘於心的收穫，這除了感受與體會到不同的研究方法與研究材料，還由於兩岸研究人員成長於不同的背

景，在在可以感受到雙方不只有太多不同的誤解，對問題更有不同的看法，而所遇到的對岸少數民族，舉凡滿族、回族，甚至土家族，都可在彼此的交流中，看到了不同族群的處境與際遇。

由於近來對道教漸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而這次研習營有一些關於道教的學習活動，所以對我而言，這是此行極為關注的部分。但是，在參訪道教四大名山——齊雲山之後，對於九華山與齊雲山兩座佛道名山一冷一熱的狀態，不免尤其心驚。這不僅反映在遊客的數量，而是整個道教的文化資產似乎已幾乎喪失殆盡。就宗教自身而言，宗教場所應對一切最苦難而沒有資源的人開放，但這些本應是撫慰人心的宮廟，幾乎已淪為必須收取門票的旅遊地點，然後伴隨著道教精神的喪失，是其中所含藏的禮制已蕩然無存，例如人們本應由龍邊入虎邊出，而中門由神明出入，但是我卻常看到龍邊及虎邊之門皆被關閉，留中門讓人們進入的情形，這種細節表面上微不足道，可是實質上是其中的宗教精神已全然喪失。道教的處境不只影響到信仰而已，而是傳統的中華文化中，道教所曾經造就的影響太大了，這種忽視對於學術研究而言，將是一種潛在而可怕的傷害。

## 徽州營彙報書

### 徽州夢、夢徽州

說起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我與其也有一份淵源。就在第一屆“巴蜀營”招募學員的時候，北京的同學曾特意將這個消息告知我，於是便興衝衝的填報了申請書。為什麼會有這種意願呢？首先中央研究院優越的研究平臺本身就對我們這些史學系學生有莫大的吸引力；其次，我雖然對“巴蜀”文化不甚瞭解，但研習營所強調的“田野”研究方法同樣讓我著迷。只可惜，我未能如願進入第一屆名單，雖然有遺憾，但是更加期待，因為既然有第一屆，就一定會有第二屆，於是我耐心等待著。當看到“徽州營”的招募書，特別是詳細閱讀了計劃書，再次讓我熱情澎湃。我的專業即是以徽州為主題的地域社會經濟研究，而且我當時已經順利入職黃山學院，成為“新徽州人”。因此我更加夢想著能成為“徽州營”的一員，希望和學界同道一同閱讀“徽州”，非常幸運我如願了。

光陰飛逝，距“徽州營”結束恰已經一月有餘，但和眾位老師、學友朝夕相處的日子仍歷歷在目。演習營主辦方邀請了歷史學界，特別是社會史、徽學方面的頂尖學者為學員授課。除了能領略到前輩學者們精湛的研究成果外，更能貼切的感知他們的治學理路。讓我由衷佩服的是前輩們對理論的把握、運用和對資料細膩的分析和解讀，這也正是我望塵不及、孜孜以求的。各位前輩都是鼎鼎大名，能親眼見到他們便是我莫大的榮幸。這裡格外值得一提的是阿風老師，他是我敬仰已久的學者，研究徽州是繞不過他的；未曾想他如此的年輕，如此的平易近人，對我們的問題，即使再幼稚，他總是給予細緻的解答。李孝悌老師幽默、嚴謹，出口成章，作為組織人之一，他對徽州營有自己的要求，對學員們也有要求，每每步入我們討論小組總讓學員們緊張不小，但我們曉得他嚴肅的背後，是無盡的期待，希望我們從中有所學，有所得。五十餘位學員的學科背景極為豐富，每每在問答及討論時總會有異彩紛呈的火花，格外炫目，給我啓發不少。

經過五天的集中講座之後，大家開始步入歷史現場，感受徽州，相信這是大多數學員最為期待的部份。王振忠教授安排的考察地點應該說都是徽州最具代表性的，學員中研究徽州的不少，但很多聚落都還是第一次親身體驗。我個人印象最深的是萬安古街，這是一處未被開發，保存完好的商業街。古舊的店面、曾經繁忙的碼頭……歷史遺跡清晰可見。我個人是做教育史的，當看到“陶行知啓蒙館”更是我讓我興奮不已，可惜不能進入，在門前我徘徊了許久，希望打開這扇歷史之門。

總結十數天的學習，唯有“收穫”二字可以概括。如果對後續的演習營提點建議的話，說兩點不成熟的想法。第一，我非常同意李孝悌老師的意見，大家討論的時候以資料為依據，結合自身的研究，才會有發現。我認為主講老師如果可以的話，也可以參與到一同閱讀史料的環節，老師們高屋建瓴，他們的想法對大家有更大的啓發，因此對資料的選擇就需要有考慮；第二，考察地點可多選擇未被開發，相對完好的聚落進行田野，這樣可以讓我們避免過多的陷阱，還原歷史的現場。

最後，我要感謝主辦方、感謝各位老師、學員十數天的陪伴，希望大家再次來徽州，我，一個來自山東的，新徽州人，將拿出山東人的熱情、徽州人的質樸，款待大家。

### No. 39 张小坡（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于我个人的体验而言，结识徽州，结缘徽学研究，实际上也暗合了十余年来学习工作的轨迹，特别是2008年7月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任教职以来，徽学更是成为工作生活的主题词，每年也都会或长或短地到徽州待上几天，感受那里的山山水水。但是接触的多，并不代表感触的深。这几年，我陆陆续续地积累了一些资料，收集了近代徽州报刊、徽州族谱、徽州文书等各类文献，也尝试着写了一点文章，但就像散碎的珠子，串不成项链，显得有些凌乱。如何找到能够可持续发展的一块自留地就成为我日夜辗转思索的问题，所谓研究的再出发也就不仅仅是一句可有可无的口号。因此，参加第二届“徽州”研习营就显得恰逢其时，能再当一回学生，心无旁骛地聆听海内外徽学研究知名学者的报告，真的是种幸福，尤其是当领取到三大册阅读材料，看着丰富的珍稀徽州文献，突然发现研究徽学虽然路途漫漫，并时常为此起彼伏的文书资料而头疼，但自己早已沉潜其中不能自拔，那种久违的欣喜感油然而生。5天课堂学习的生活很有规律也很紧张，白天上课，晚上讨论，回到房间后阅读材料，有一点累，但很充实。

此次研习营邀请到12位学者为学员做报告，大陆的学者都是长期躬耕徽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名闻学界，并且态度谦和，道德文章一流。唐力行先生的《传统徽商与近代同乡组织》，让我们在深入了解徽州旅沪同乡会运作实态的基础上思考近代社会转型的问题。王振忠先生的《徽州文书的世界》，利用丰富直观的文书资料，向我们展示了生动的传统徽州民间生活图景。卞利先生的《明清徽州的村规民约与乡村治理》，对村规民约做了深刻分析，并考察了其乡村治理之间的关系。阿风先生的《从徽州诉讼文书看明代的审判制度》，既让我们了解了诉讼文书的种类，并让我们看到诉讼是如何展开的，以后再接触诉讼文书就不会再为其繁复的程序而一筹莫展了。范金民先生的《明清徽商与江南文化》，利用丰富的文献记载，梳理了徽商对江南文化的营造，林林总总的材料，在其他人看来可能有些繁琐，但是如果知道这是从浩繁的文集笔记中爬梳整理的，或许就不会轻易地下结论了，一定程度上，严谨踏实的考证比那空疏时髦的理论建构

更弥足珍贵。常建华先生长期致力于宗族研究，对徽州宗族有着独特的看法，他的报告让我们体会到如何从国家的层面、从政治制度的角度去考察宗族，而不是就宗族谈宗族。郑振满先生一直坚持田野调查，有着丰富的田野经验，他向我们讲授了田野调查的经验与体会，而他的研究课题让我们看到了宏大的历史关怀，开阔的研究视野。港台学者的报告让我们更多的体验到徽州文化的博大。因为接触较多的缘故，听劳格文先生的报告感觉非常熟悉，让我更深刻的体会到近年来他在徽州所做工作的关注重点。

走向田野无疑也是组织者精心筹划的，是为了让我们对田野调查有更为直观的感受。虽然在徽州无法做到完全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而更多的带有体验性质，但是当在齐云山上看到那么多的碑刻仍然无法遏制一睹为快的冲动。之前曾到过齐云山，但限于行程安排来去匆匆，而此次考察则跟随王振忠老师和郑振满老师一通通读碑，最后沿着一处45度以上的斜坡爬上方腊寨。无限风光在险峰，置身山顶，目力所及之处，苍翠欲滴，云散云舒，远望群山峰岭飘渺，若隐若现，苍茫云烟中青黛如墨；眼下横江如练，随风漫卷，逶迤东去。既欣赏到美丽的自然风光，更感受到齐云山浓厚的道教文化氛围，这也许是田野考察额外的赏赐吧。数天的田野考察很快过去，但是在老师的带领下，探寻历史的线索，让我对到历史现场去解读史料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也许现在的徽州失去了太多传统的东西，没有办法去复原历史场景，但是行走在渔梁的街巷深处，徜徉在汪口清澈见底的流水旁，对那些文献上的记载还是多了一些生动的体会，那些已经消失在历史深处的人和事仿佛不再遥远，不再面目可憎，也诚如学者所言：“置身于历史人物活动和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的自然和人文场景之中，切身感受地方的民俗民情，了解传统社会生活中种种复杂的关系，在这样的场景和记忆中阅读文献，自然而然地就加深和改变了对历史记载的理解。”当然，现在的徽州社会犹如树木年轮，是层累叠加而保存下来的，我们在当代剖面去观察体验的时候，还应保持一种必要的警惕，不是所有视力所及的事项就是原封不动的，发挥现象的空间不是无限制的，只能是适度的田野。

为了密切学员间的关系，组织者也颇费思量。经过安排，分为四组的成员成为暂时性的共同体。小组讨论时，大家以组长为核心，根据个人的学养积累和特长，排定发言顺序，每次轮到发言的学员，都会认真准备，而大家也都纷纷为其出谋划策，通过仔细阅读材料，深入讨论，最后形成发言要点，所以在综合讨论时，派出发言的学员不是个人在孤军奋战，而是凝结着组内成员的集体智慧。如果说大家分组讨论时还无法充分密集交流，那么在田野调查时，大家分桌吃饭，则为充分展示个人性情提供了一个平台，大快朵颐之余的交流更能激发出学员的思想火花，当然交流美食经验也为了解徽州的民俗民情打开了一扇窗口。而通过课余饭后的密切交流，大家也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我想，其他勿论，能够认识志同道合的朋友，已是此次学习最大的收获。

#### No. 40 赵思渊（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博士生）

8月16日至8月21日，在复旦大学聆听了徽州研究诸位专家的讲座报告，收获颇丰。唐力行老师报告徽州旅沪同乡会，资料丰富。王振忠老师对各类徽州文书进行总括性介绍。卞利老师在讲座中展示了丰富的乡约文献。阿风老师以严谨的学理逻辑阐释了徽州诉讼中的诸问题点。范金民老师秉持其商业研究学养，讨论徽商与苏州的关系。常建华老师梳理徽州宗族研究之脉络，习得很多门径。祝平一老师对徽州算学的研究则相当开阔视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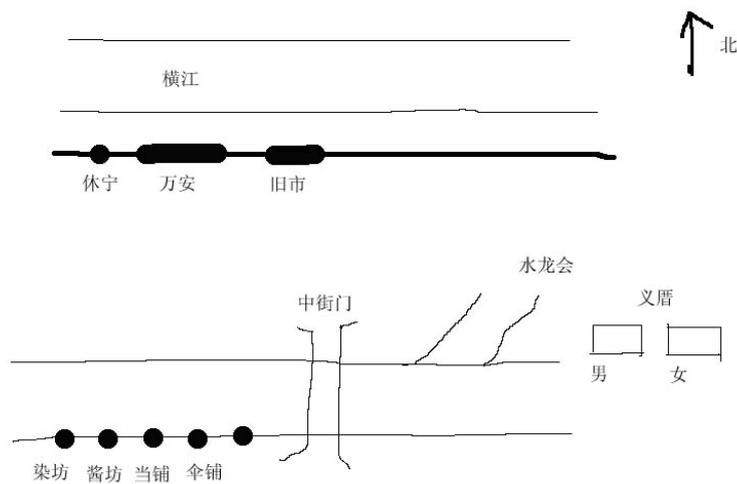
自8月22日开始，至8月25日，我和“徽州营”的各位学员一同考察了古徽州的若干代表性村落。

8.22，至歙县鱼梁坝，这里是出入徽州的重要商路，亦是徽州最典型的水利设施，在考察中注意到徽州特别重视修坝，几乎每河必有坝，尚须一水利史的解释。由于目前出入黄山市主要靠陆路交通，渔梁坝镇已随徽州交通格局转变而衰落。发见有碑刻，有禁约碑和关于脚行的碑刻。渔梁坝镇本来的格局，应当是依凭渡口而形成的带状市镇，市镇主要的功能，是物流的中转。渔梁坝既保障的水运的水量充沛，同时也迫使所有行商必须在这里转换货船，因此船运业以及由此带来的船舶修造、货栈等功能在空间上有鲜明的反映。

8.23，至黟县宏村与万安老街。两处此前均去过，宏村是徽州古村落的典型代表，其村落空间结构是人工规划的典范。由于之前已经考察过宏村的核心区，这次宏村重点考察边缘地带，汪姓是宏村主姓，宏西为汪氏聚落，宏东则为杂姓。在雷岗山下有汪姓社屋，由于时间原因，没有来得及去看。万安，有火龙会碑刻，与江南所见的各种火龙会、火政会的形态没有太大区别，主要是由坐商支持，他们是火灾的最大受害者。另，此是首次见义厝实物，两间，一间停男棺，一间停女棺，义厝后农田原为义冢。义冢也即村落的尽头，这与科大卫老师经常提及的田野考察中要问“抬棺材抬到哪里放下”来确认村落边界的道理是一样的。



依据冯建辉等说法，绘万安老街简图。



### 8.24, 齐云山&徽州文化博物馆

随老郑读碑，提示题诗碑，“八景”等的出现与一个地方文化构建的关系，是之前未考虑到的。齐云山核心人物：素养道人汪泰元，弟子道会方琼真。三元宫发展脉络：正德9年，建洞（三元宫）——嘉靖2年（唐寅题碑）——嘉靖中叶——万历初（刻石大量出现，说明齐云山/白岳进入文人传统）——嘉庆（道

房的出现)——宣统(重修石栏,道房兴起,典型的是丁复先道房,说明其影响力的辐射)。

当晚讨论,本组重点讨论宏村与汪氏家谱,重点落在汪氏谱宋序之真伪。佩蓁提出的问题是鲁侯直至汪华这样的汪氏谱系何时普遍地出现于汪氏家谱当中。在综合讨论时间,本组以四人进行长时间报告,同另一组的李仁渊兄有颇多对话。我阐述了汪氏应当是从雷岗山自西北向东南发展成至今的宏村空间形态。

#### 8.25, 婺源汪口&清华街

婺源县城在婺水与武溪水交汇处,清华街和江湾则分别在婺水与武溪水上游,是为婺源两大重要市镇。在汪口及清华街均见到水碓实物,颇有启发。





水碓是从主河中引一水渠，蓄积在一池塘中，从这一池塘引水，转动水轮，带动舂米。所以这一池塘在枯水期就可以用于其他水利用途，形成一个小型的水利调节设施。这种水利调节设施对周边社区的水资源进行调节，就可以形成一个松散的水利共同体。

清华街有廊桥，比唐模大很多，名彩虹桥，颇可观。汪口有碑刻两通，在山林入口处，另有野庙，在山林的另一入口。两碑刻为乾隆 51 年山林伐木示禁碑，似提示这一地区棚民及木材业的矛盾。庙名石佛庵，内供石佛、佛祖、华佗、财神，此石佛似为地方特色信仰。庵内有红榜，香火颇盛。

## No. 41 朱開宇（臺灣大學歷史所博士生）

### 復旦、徽州行記有感

徽州是一個獨特的地方，不僅山川秀麗，人文歷史也極有特色，而且也深遠地影響中國近世的歷史。徽州的建築、祠堂、牌坊、繪畫、茶館都極有特色。徽商、徽州流寓學者與皖派漢學都曾深深地影響了明清的文化與歷史。新安理學與徽州宗族制度不僅極有特色，也是探討中國近世史的重要議題。一直以來，徽州的歷史與風俗文化深深地吸引著我，在歷史研究中與徽州結緣亦甚早，自大學時代即被此地的宗族（家族）議題所吸引，自研究所後，又漸漸觸及理學、徽商、佃僕制，然而，對徽州的風土與祠堂、徽派建築、牌坊乃至自己研究曾經觸及的齊雲山道教聖地卻無緣一睹，只能憑藉書籍及其照片來瞭解，缺少親臨感受的體會。這次，能有幸參與第二屆徽州歷史研習營，收穫豐富，不僅能使我親臨徽州田野考察，見到我那魂牽夢縈的徽州山光水色與文物遺跡，更為重要的是，(復旦)課程安排甚好，請來諸多與徽州研究面相相關的學者，深入且涵蓋面廣，教材編纂與搭配亦甚為精細妥切，使我們對徽州與明清社會史的研究，在議題與方法、資料的掌握，都甚有幫助。而此次的助教，亦精挑細選，實力深厚，對於演講的主持、晚間討論的帶領，都能恰到好處，既見功力，亦甚為負責。在授課方面，范金民老師對於明清徽商與江南文化的影響，有著資料豐富且多面的論述；唐力行老師對於傳統徽商與近代同鄉組織，讓人見識到即使在徽商已經衰落的近代，其同鄉組織與網絡亦似如明清時一般，實可見徽人的傳統，且擅於運用地緣與血緣組織；常建華教授對於徽州宗族組織形成，在歷史脈絡下的內、外關鍵原因有著深入淺出地說明；阿風先生對於明清徽州訴訟的探討，令人感到徽州文書的運用可以建構更為寬廣的明清歷史，對於明清的司法制度乃至政治特色，亦能見微知著。王振忠老師分享著其蒐集的徽州民間文書，內容豐富且有趣，對於如何運用文書來探討徽州民俗與日常生活史，有了更深地體會。祝平一先生對於江永與梅文鼎間的學術關聯、對於西學的吸納，楊光先對於西學的反對態度，同樣出身於徽州的兩位天文學者，對於西學卻有著不同的態度。鄭培凱教授講述一生

從未到過徽州的湯顯祖與徽州文人之間的交往，由中可以看出明代徽州文人與徽商間附庸風雅的風尚。許澄琪教授討論明清新安畫派的形成與發展，其中黃山成爲繪畫取材的情境對象，分量日益重要。可以說，在課程上，以徽州爲焦點，廣泛地將明清許多重要議題帶進來，面相廣泛而有深度意義。

在徽州的田野考察部分，我對齊雲山和黟縣宏村這個世界文化遺產的皖南古村落，印象最爲深刻。在齊雲山，我看到了一個道教聖地的佈置，所謂的洞天福地，果然有著仙氣般的意境，原來齊雲山曾是求子的香火聖地，也是百姓與官府求雨的信仰所在。雖然以前就知道明世宗爲求子而屢屢派遣道士祭祀齊雲山真武大帝，卻不知後來此處成爲民間求子的信仰中心；此外，亦看到了民間祈雨的龍王神，明白了此處也是祈求風調雨順之地。在上纜車時便請教王振忠老師關於齊雲山道士的來歷，王老師如數家珍般說出了道士由婺源遷入的故事，也談及了清代曾經有著大香火遶境的事跡，香火遶境行經佛教聖地九華山與道教聖地齊雲山，令人感到中國信仰能夠巧妙地結合了佛、道。在齊雲山上，我們也跟著鄭振滿教授一起學讀碑刻，議論著成化、弘治時的一位道士與齊雲山信仰的關聯，同時也想起於復旦課堂上勞格文教授對於齊雲山道士傳承所作的田野調查，彼此呼應，正可讓我們感受文獻、碑刻、田野相互爲用，既各有所長，隨其研究取徑所取，亦可相輔相成。

而在黟縣宏村，我深深爲其秀美所吸引，精巧的水利設施也代表了這個村落與宗族的興起與凝聚，我凝神端詳了其建築造型，仔細考察了其村落佈局，整個村落以水塘爲核心營造出來的美，更深深爲其祠堂內的肅穆樸雅所吸引，讀著祠堂內的碑文與簡介，不斷地拍攝著祠堂內建築的造型。其他行程也收穫豐碩，在黃山徽文化博物館中，看到了對於徽州地形、徽商文化、徽州茶葉與木材等的行銷交通網絡與範圍的圖示與簡介，尤其是看到了徽州文書與韓國文書的合展，當即如喜獲寶物般拍攝下來。在婺源汪口，我同樣被祠堂所吸引，也注意到仍有人在河邊洗衣(如同在漁梁壩我看到仍有燒材煮水)，感受到即使到了現代，徽州的地形仍牽制著其發展，較爲純樸的保留了古風。而許國牌坊與棠樾牌坊群，使我

見識了其牌坊之美與徽州曾有的文化與歷史的光榮，萬安老街讓我能夠想像徽州舊有村落的形貌與一般百姓的生活環境，魚梁壩也讓我親自體會徽州人如何在僻處山區的環境裡，運用水利技術來改善河流水淺的侷限，促進航運。這些都讓我對徽人的文化與日常生活史，有更深地體會。

最後，我想表達的是，感謝眾多老師與助教的精彩付出，讓我們學員們收穫豐富，這樣的歷史研習營使我們與老師和學員間能夠密切交流，我尤其感謝常建華教授與阿風研究員在研習營其間的多次指導與交流，讓我感受共鳴的澎湃與學習的熱忱，也感謝我同組學員間相互的照顧與討論，這些歷程，都實實在在地豐富了我的生命，讓我感受到學術之路的精彩。